

炎黄春秋



1977年11月叶剑英、邓小平在广州

“跨过鸭绿江”的决策过程
邓小平与叶剑英
在“文革”中的生死交
李宗仁、白崇禧“和共”内幕

劳动英雄吴满有
真的叛变投敌了吗

一个“延安的养蚕
姑娘”的人生际遇

揭开诸葛亮神的面纱



甘露

4
95

本期导读

“跨过鸭绿江”的决策过程

国内初定，朝鲜半岛又燃起战火，共和国面临帝国主义入侵。毛泽东决然出兵御敌于国门外，这一英明决策震撼了世界，也影响了半个世纪。

李宗仁、白崇禧“和共”内幕

三年内战，蒋介石损兵折将八百万，还有点实力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借机倒蒋，并策动社会贤达与中共重开谈判，想划江而治留下座青山……

“文革”中叶剑英与邓小平的生死交

在“文革”的政治浩劫中，两位革命家持正相倚，生死与共。粉碎“四人帮”后，又携手治党、治军、治国，挽救了濒临危亡的共和国。

劳动英雄吴满有真的叛变投敌了吗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出了个劳动英雄吴满有。解放战争中吴满有被俘，被“定性”为叛变投敌，为此，延安时代的老人至今仍在关注。原中组部副部长李锐，经多方查证，翔实地记叙了这一冤假错案的始末。

他们从深圳杀出了一条血路

一支工程兵部队，以无产阶级军队的战斗精神，同人民一起把小镇深圳建成了一座伟大的城市。如今他们中有人当上经理、董事长，血管里流动着市场经济的血液。在他们眼前，是新的历史，新的世纪。

丁玲和沈从文的恩恩怨怨

两位文豪，是同乡，是战友，又有过许多的爱慕，还经历了人世间的荣与辱。可叹的是，年轻时那纯真的情结，到老时却变成了不解的怨尤。

日寇杀光北疃村纪实

1942年，日寇对冀中进行大扫荡，在仅有二百户人家的村子里一次就屠杀了千余人。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作家解力夫来到现场，目睹了这一惨绝人寰的景象。

一个“延安的养蚕姑娘”的人生际遇

她满腔热情地走向革命圣地延安，却一头跌进了苦涩的爱河。她美丽、热情，像她的名字甘露一样，既维系她爱的世界，又努力地为党工作。十年含辛，她终于从不幸婚姻痛苦的折磨中，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归宿。

下期要目

- △瞿秋白狱中遗言：“日后自有定论”
- △杨西光与第一篇“真理标准”文章的发表
- △张学思与张学良的手足情
- △芦沟桥事变时的守桥排长李文成
- △长江大火及其引发的一场笔墨官司
- △民告官，人天相助讨回公道
- △丁肇中的科学之路
- △康熙和平统一台湾

顾问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朝闻 冯文彬 伍修权 杨静仁
赵朴初 胡絮青 费孝通 谢冰心

特邀编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刘颖南
李 庄 李 普 李学勤 吴 象
苏双碧 张 锲 张国琦 凌 云
常 征 温济泽 韩劲草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 巍 魏久明

社长 (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 (常务)

丁洪章

总 编 辑: 洪 炉

总 经 理: 徐 孔

副总编辑: 刘家驹 王 恂 杜卫东

理 事 长: 杜导正

名誉理事 (单位):

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

副理事长: 贝兆汉 李广尧

理 事: 白亚南 蔡道峰

林春露

秘 书 长: 徐 孔

版式设计: 木子

责任校对: 秋实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 址: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邮 编: 100802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 (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出版日期: 每月 15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杂志社电话: 6016633-227 6076801

定 价: 3.20 元

专稿

④ ⑤ 祖国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弘扬中华文化 促进祖国统一大业

程思远
周谷城

春秋笔

⑥ ②⑧ ⑥② 跨过鸭绿江的决策过程
李宗仁、白崇禧「和共」内幕
日寇杀光北碚村纪实

解力夫
奎 松
金 牛

英杰谱

②⑦ ①⑩ ⑦⑨ 义勇军攻打沈阳城
「文革」中邓小平与叶剑英的生死交
周恩来与西哈努克亲王

王忠瑜
石 文
周 哲

殒星篇

①⑦ 罗瑞卿与赵一曼

刘德鑫

目 录

时代风	人海浪	赤子心	同心结	轶闻录	古镜台	古今谈	他山石	求实篇	文荟园	编读窗
⑦④ 他们在深圳杀出了一条血路.....张正隆 ⑤⑦ 四十三届世乒赛中国队如何搏.....张继华	⑤⑩ 一个「延安的养蚕姑娘」的人生际遇.....田方 ⑧② 朱德的大哥朱代历之死.....陈兆平	⑥⑩ 爱国侨领吴桂显家乡倾资办学记.....陈迪秋 张兴汉	④③ 台湾塑料大王——王永庆.....纪流	⑧⑥ 中日孔林之争.....孔维克	⑦① 揭开诸葛亮神的面纱.....徐庆全	④② 马屁术高手徐达.....竟陵子 ④② 不仅仅是血证——再现「南京大屠杀」记.....云阳	⑧④ 一位理性的哲人.....王基高	⑥⑥ 劳动英雄吴满有真的叛变投敌了吗.....李锐	②⑦ 贾兰坡和长阳人.....覃世清 ④⑥ 丁玲和沈从文的恩恩怨怨.....许正雄	⑤⑨ 于右任和西安碑林.....华夫 ⑧⑧ 读者的希冀.....本刊编辑部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座谈江泽民讲话 两岸同胞为共同弘扬中华文化而努力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部分在京顾问、理事，2月28日聚首一堂，座谈学习江泽民《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重要讲话。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程思远致开会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从上海寓所寄来了书面发言。

与会的有关方面专家、学者纷纷谈到了他们对江泽民讲话的认识和体会。一致认为：五千年灿烂文化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的纽带，是两岸和平统一的重要基础。为推动和平统一的进程，一切有识之士要正确认识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两岸同胞要将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切实担当起来。

主持这次座谈会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李宝光在座谈会结束前讲话，她感谢大家出席会议，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对于今后如何贯彻和落实江泽民同志讲话精神，研究会还将作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

祖国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在部分在京顾问理事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 周谷城

年年春节，岁岁迎新。

在今年春节前夕，中共中央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关于台湾问题的重要讲话，令人十分振奋，给海峡两岸和海内外炎黄子孙带来了温暖的春风。根据当前的新形势，讲话进一步阐明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并提出了许多新的建议，情真意切，明确具体，意义深远。这个讲话，在海峡两岸和广大海外侨胞中，已经引起很大的反响。由此可见，祖国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江泽民总书记在八点看法和主张中专门提出，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为世人所共认，每个炎黄子孙都引以为荣。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虽曾经过某些变化，而始终能够维护着民族的大团结，国家的大统一。这种巨大的凝聚力，正是来源于同宗同祖同文同根。这个历史潮流是谁也阻挡不了的，顺者昌，逆者亡，已经为历史所一再验证。

近年来，两岸经济快速发展，进一步说明我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具有无限的生命力，一旦它与市场经济和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即可结出现代化的硕果。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将会大大推进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两千万台湾同胞将会同享我们伟大祖国在国际上



刘兵摄影

的尊严和荣誉。

我们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是由爱国的热心于传统文化的学者、专家及各界人士所组成的民间团体，愿与台湾同胞和海外炎黄子孙携手合作，共同努力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促进祖国统一大业

——在部分在京顾问理事座谈会上的开会词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程思远

今天,我们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举行部分在京顾问、理事座谈会,学习江泽民总书记1月30日《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重要讲话,并结合本会的情况,讨论如何开展工作。我先谈一谈个人的体会。

江泽民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发表半个多月以来,在海峡两岸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以及所有关心中国统一的人们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不是偶然的。我想,首先是因为,这个重要讲话进一步精辟地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思想,提出了许多新的创见,更加表明了中共中央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和一片诚意;其次,这个重要讲话的针对性很强,坚决反对近年来“台独”势力制造的“分裂分治”、“阶段性两个中国”和以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为目的的所谓“扩大国际生存空间”的活动;第三,这个重要讲话就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和平统一进程提出的八项看法和主张,是实事求是、切实可行的,也是十分全面的。既欢迎台湾当局领导人前来参观访问,也欢迎岛内各党派和各界人士与我们相互往来和交流。既提出了政治谈判、经济合作的建议,也包括文化交流的设想。我们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从成立开始,就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为宗旨,因而我们衷心地拥护江泽民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并愿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做出新的努力。

江泽民总书记重要讲话中第六项看法和主张说:“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也是对两岸文化交流在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中重要作用的充分肯定。

中华文化既源远流长,又博大精深。中华五千年灿烂文化就其总体来说,是中华各族儿女不分党派、地域的共同财富。文化上的认同是坚不可摧的伟大力量和



王 绘摄影

牢固纽带,它把人们紧紧地联系和凝结起来。文化归根到底是受经济、政治所决定和制约的。但文化又对政治、经济发生反作用。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分裂的时候,但终归又重新走向统一,文化的认同和交流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今天,为了推动和平统一的进程,就要正确认识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切实把两岸同胞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更加自觉地积极地担当起来。

近几年来,两岸文化交流有了可喜的进展。我们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也做了一些事情。例如,我们与有关单位共同举办或参加了有两岸学者与会的闽台文化学术讨论会、《周易》学术讨论会,协助陕西省、湖南省举行有两岸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参加的祭黄帝陵、炎帝陵活动,以及河南省修建炎黄二帝巨型塑像工程等。此外,许多顾问、理事还参加有关团体访问了台湾。这些活动,增进了两岸同胞特别是文化界人士的相互了解、思想沟通和学术交流。今后,我们要更加有步骤地举办有两岸同胞参加的学术文化活动,并同台湾有关团体建立经常联系和相互访问。借以共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

“跨过鸭绿江”的决策过程



中国人民志
愿军跨过鸭
绿江

●金牛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朝鲜人民军迅速打过三八线,3天后便解放了汉城,李承晚政权面临灭顶之灾,美国人坐不住了。6月27日,杜鲁门宣布美国海、空军立即参战,并派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随后美国陆军第八集团军直接参加了地面作战。

美国的军事干涉最初并没有能阻止朝鲜人民军的凌厉攻势。到8月初,朝鲜人民军已经解放了朝鲜90%以上的国土。很多人在为朝鲜人民军的胜利欢欣鼓舞之时,一直关注着这场战争的毛泽东,却摇着头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越是在这时候,越是要预防不测。现在需要休整一下,调整军队部署后再战。”

在美军参战后,毛泽东为了“预防不测”,决心将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兵团调到东北。7月上旬,毛泽东委托周恩来两次召开国防会议,决定由军委战略预备队的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和四十二军26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由粟裕任司令兼政委,萧劲光任副司令,萧华任副政委,同时还组成东北空军司令部,于7月底全部调往安东、辑安、本溪等地集结,屯兵鸭绿江畔。

李承晚军队残部在美军的支持下,收缩在洛东江三角洲正作拼死顽抗。一种直觉告诉毛泽东,战局的背后潜伏着危机。他再次要求东北边防军:“务于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

位于中南海居仁堂的人民解放军总参作战部里,已经是昼夜灯火通明了。那时的作战部长是李涛,聂荣臻代总长“坐镇”作战部,作战室参谋们经常是夜以继日全神贯注地在分析各方面的情况。一天,总理在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致联合国秘书长的电报时,忽然严肃地询问在场的几位外交官说:“你们看战争会在8月结束吗?”大家都知道,这是金日成宣布的,几位外交官对此表示了谨慎的乐观,都不太相信美国会轻易认输。当总理的目光转向作战部的雷英夫时,雷英夫回答说:“总参谋部的估计还要谨慎一些,不歼灭敌人的主力,不把敌人打得招架不住,它是不会罢休的。”总理既像是提醒、又像是启发地说:“这个战争将是持久和复杂的。我们宁可把情况估计得复杂一些。”

人们围着地图议论着:朝鲜的地形很像一个长长的冬瓜,这地形可潜伏着危险啊!何况据情报部门提供的资料说,杜鲁门的顾问哈里曼和他的军事助手已到达东京,美军很可能会有大动作。

总参谋部的参谋们分成两组对抗作业,并分析结果。这帮刚结束国内22年战争的参谋们,讨论从下午持续到夜晚,一切都变得那么清楚了:美军很可能要在仁川发动一次两栖登陆作战,时间将在9月15日,战役的目的是将朝鲜半岛拦腰截断。

8月23日午夜时分,周恩来带着雷英夫来到菊香书屋。他简要地向毛泽东介绍了作战参谋们的意见。雷英夫随即打开一幅军用地图,详细地向毛泽东汇报了当前朝鲜战场上双方的作战态势,然后列举了六个疑点。第一,美李军13个师集结在洛东江狭小的滩头阵地上,既不撤退,也不反攻,显然是在诱敌;第二,在日本的美军两个师正在突击训练,很可能是在准备开辟新的战场;第三,美海军舰队正在大规模向朝鲜海域集中;第四,朝鲜是一个狭长的半岛,中部有多处港口可供美军登陆,然后将朝鲜人民军分割包围;第五,美军指挥官均擅长两栖登陆作战,美军握有海空优势;第六,朝鲜人民军连续作战,已相当疲劳,在战略上已经处于被动。毛泽东一面仔细倾听,一面微微地点头,直到雷英夫汇报结束,才肯定地说了六个字:“有道理,很重要。”在听了周恩来的意见后,毛泽东站起身来,一边来回踱步、一边慢慢地说:“看来美军要有重大的行动了,很可能就在最近。”他的目光又一次转向雷英夫。雷英夫知道毛泽东是在向他征询进一步的答案。他如实地汇报了作战部对情况的分析:“美军很可能于9月15日在仁川登陆。”毛泽东立即对雷英夫汇报中的分析表示出极大关注,他追问到:“如此精确,说的再具体一些。”在听了雷英夫的陈述后,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手中的香烟,随着缓缓吐出的烟团,他发出了三道命令:“1、立即通知情报部门,严密监视朝鲜战场和美、英、日的动向。2、通知斯大林和金日成,希望人民军对美军在仁川登陆预作准备。3、我军第十三兵团加紧作战准备,一旦有事能立即行动。”

在连续发出三道命令后,毛泽东的思路似乎在向更深更远的地方延伸。他又提出了一些作战方面的具体问题。甚至问到麦克阿瑟的性格和指挥作战的特点等等。雷英夫说到麦克阿瑟是个“好战分子”、“倔老头”时,毛泽东若有所思地“哦”了一声,显然是在考虑着这个未来对手,他惯用的战术、他的弱点:“骄兵必败!他越好战、越倔,对我们越有利。”

……汇报快结束了,毛泽东满意地意味深长地对周恩来说:“不要什么都认为美国如何如何,美国人没啥了不起,我们作战部的小参谋也可以大有作为。这也是对少数犯‘恐美症’的人的最有力的教育。”周恩来会心地点了点头。此刻也许只有他知道,毛泽东终将作出一个历史性的决定。

一切都像总参作战部所预料的那样精确无误,9月15日拂晓5时,麦克阿瑟亲自指挥美海陆空7万余兵力,在200多只舰艇和500多架飞机的掩护下,开始在仁川登陆,16日下午占领了仁川。与此同时,沃克的

第八军在洛东江地区开始发动反攻。朝鲜人民军受到美军的南北夹攻,加之后方供应断绝,伤亡严重,被迫向北撤退。9月26日,美李军攻占汉城。9月27日,经杜鲁门亲自批准,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授权麦克阿瑟可以在三八线以北朝鲜境内采取军事行动,消灭“北朝鲜的武装力量。”

从8月下旬开始,中国政府越来越频繁地谴责美海空军侵犯中国的领海与领空。美军和李承晚军队进抵三八线后,中国政府向美国发出了明确的警告。9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庆祝新中国第一个国庆的大会上发表讲话说:“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意侵略置之不理。”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杜鲁门却认为新中国只是在进行“恫吓”。10月1日,朝鲜外相朴宪永携带金日成给毛泽东的亲笔信飞到北京,当面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恳请中国出兵朝鲜。同一天,李承晚军队越过三八线。第二天,麦克阿瑟向美第八集团军下达命令,指挥其越过三八线,占领平壤。正是在这种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毛泽东于国庆之夜主持召开了政治局紧急会议,向中央领导人通报朝鲜的形势。

周恩来介绍了形势以后,毛泽东向到会的领导人说:“今天大家要畅所欲言,摆一摆出兵到朝鲜与美国人的打仗的困难。”与会的多数人不赞成出兵。他们主要摆出了两种意见,一是国内刚打完仗,困难多;再就是我军装备与美军相比太悬殊。毛泽东直到大家差不多都说完了,他才缓缓地说:“你们讲的都有道理,可是人家有困难,我们在一旁看着心里不好受呀。”毛泽东习惯地摆了摆手说:“今天就开到这里,散会。”

人们散去后已是2日凌晨了,毛泽东仍然毫无睡意。他像往常一样躺靠在那张堆满了书的大床上,思考着,回忆着。



中国人民志愿军向敌人发起攻击

早在1940年夏,毛泽东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美国取代英国成为西方世界的领袖只是时间的问题了,我党早晚要同这个国家打交道,成为朋友的可能性小,成为对手的可能性大。从那以后,毛泽东便密切地注视着美国人在中国的一举一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成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盟友。1944年7月经罗斯福总统批准,驻华美军向延安派出了军事观察组。这是美国向我党根据地派出的第一个官方组织,当时毛泽东亲自在《解放日报》为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而发的社论上加上“欢迎美军战友们”几个字,美军观察组与八路军进行了密切的合作,与中共领导人作过多次谈话,他们的确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作出不少努力。后来来了赫尔利……一想到赫尔利,毛泽东立刻回想起重庆谈判期间发生的事情。抗战胜利前夕,美国和苏联为了划分势力范围,搞了个雅尔塔秘密协议。在这个协议中,美苏共同保证战后在中国支持蒋介石的统治地位。日本宣布投降后,美苏向中共施加压力,要毛泽东到重庆去,与蒋介石谈判,参加国民党政府。赫尔利亲自出马,向中共施加压力。他在一次与毛泽东的会谈中竟然逼着毛泽东立即对国民党的方案表态,声称如果中共不在军队问题上让步,中国就会发生内战,那时美国也将无能为力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在山东徐州附近的八路军部队,与美军发生了一次冲突,一名美军军官被打死,三名美军士兵被打伤。这一地区本来已经被八路军占领,日军在时美军不来,现在却打着协助受降的旗号来帮助国民党抢地盘。华北重要铁路沿线到处是日军站在星条旗下充当美军的警卫,使八路军的受降行动受到极大的限制。冲突的责任明显地是在美军方面,可驻华美军司令却猖狂地对毛泽东咆哮说,如果中共军队不停止对美军的袭击,他将要求美国总统授权采取报复行动。毛泽东看清了这位暴跳如雷的美国将军的

狰狞面目,回到延安他告诉干部们:“赫尔利、魏德迈很坏。早晚要同他们算帐!”

那时候美国人好狂啊,他们认为自己强大得很,骄横不可一世,可以到处发号施令,到处插手。在我们党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有人犯着严重的“恐美症”。他们怕美国人,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战。1946年春国民党在东北发动内战,党内有的同志提出要再作些让步,否则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就会来干涉。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那些患了“恐美症”的人们。他说我们同帝国主义打了一百多年,都打输了,结果在人民中产生了一种自卑感,一提外国人就怕。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首先就要改变这种精神状态。现在美国军队打到了我们家门口,还用舰队封锁了台湾海峡,这一仗是早晚要打了,我们决不能示弱。一个人要有一点精神,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要有一点精神,不彻底打掉“恐美症”,中国人民就永远站不起来!

想到这里,毛泽东立即翻身下床,坐到书桌旁,提笔起草了给高岗、邓华的电报,要高岗立刻赶到北京开会,令邓华指挥东北边防军提前结束作战的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

10月2日下午,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在颐年堂召开会议。毛泽东说:“出兵援助朝鲜人民已经刻不容缓,我们不能再议而不决。”常委们经讨论同意,由彭德怀挂帅,出兵日期定在10月15日。会议快要结束时,毛泽东提议将会议的决定以他的名义电告斯大林。另外对美国人也要先礼后兵,向他们打个招呼。这件事由周恩来去办。

3日凌晨1时,周恩来紧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印度政府转达中国对美国的警告:“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决不能不管!”印度政府当即将周恩来的谈话转告英国方面,英国当晚便通知美国政府。杜鲁门认为潘尼迦有“亲共”的嫌疑,他的话不可信。国务



板门店谈判双方代表在签字大厅签字时的全景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上将克拉克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卿艾奇逊声称：“周恩来是想用政治讹诈来阻止美军的进攻，我们不必在乎他们说些什么。”他随后授权驻印度大使格罗斯与中国方面联系，说明美国无意进攻中国，并愿为美机误炸给中国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但美国决不会放弃它的战争目标。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时授命麦克阿瑟指挥美军全力向北挺进，即使中国军队介入也要完成统一朝鲜的使命。

毛泽东从未相信过美国的保证。10月5日，中央政治局在颐年堂召开关键性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出最后决定：“现在是美国人逼我们打这一仗，我们面前只有一条路，不管冒多大的风险，有多大的困难，也要立刻出兵！”10月8日，毛泽东正式发布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进攻，藉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同一天，彭德怀飞赴沈阳部署第十三兵团入朝。周恩来乘飞机前往苏联会见斯大林，购买武器装备和争取苏联空军支援志愿军入朝作战。毛泽东很快接到周恩来从苏联发回的电报。周恩来报告说，经与斯大林会谈，苏方表示尽快向志愿军提供20个师的装备，但不能在朝鲜战场提供空中掩护，如中国出兵有困难，可让金日成到东北组织流亡政府。周恩来在电报中请中央根据这种情况对出兵问题再作考虑。毛泽东读着电报，立即明白了斯大林不肯提供空中支援就是怕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他既震惊又气愤。难道美国人就真的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怎么有的人总是不相信人民的力量呢？如果几十万志愿军战士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条件下入朝作战，中国人民要承受多大的牺牲啊！毛泽

东转向站在一旁的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要老彭立即回北京，令十三兵团就地训练，暂不出动。”

12日下午，毛泽东又一次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出兵问题。毛泽东在会议上全面分析了出兵的利弊得失。他说：“我们已经向美国发出警告，敌人也向我们发出了哀的美敦书。现在我们与美国已经是短兵相接，狭路相逢。如果让敌人压到鸭绿江边而我们表现的无能为力，软弱可欺，国内国际反动气焰高涨，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我的意见是即使没有苏联的空中支援，也要立即出兵。”到会的同志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分析，会议决定志愿军26万人马于10月19日开始进入朝鲜。会后毛泽东打电报坚定地告诉尚在苏联的周恩来：“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当周恩来将毛泽东的决定通知斯大林时，斯大林感到一阵巨大的震动，直到这时他似乎才真正理解了中国共产党人，理解了毛泽东。

18日下午，毛泽东首先听取了周恩来关于斯大林会谈的报告，然后又听取了彭德怀和高岗关于出兵准备工作的报告。直到这时他终于作出了最后的决断：“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也要按原计划渡江，时间决不能再推迟了。”晚9时，毛泽东发出特急绝密电报，命令志愿军自19日起渡过鸭绿江，新中国成立后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第一次军事较量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19日黄昏，如箭在弦上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夜暗中跨过了鸭绿江，发起了著名的第一次战役。

（金牛：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著有《从延安走向世界》、《从赫利到马歇尔》等）

（责任编辑：刘家驹）



在一场政治浩劫中，两位革命家持正相倚，堪为世人楷模

“文革”中叶剑英和邓小平的生死交

● 杨言东 石 文

—

1971年“九·一三”林彪“仓皇北窜埋沙磧”之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如何整饬军队，加强对军队的领导，叶剑英首先想到了已经被打倒六、七年之久的邓小平。他多次向周恩来、毛泽东建议，迅速解除邓小平的“流放”，恢复他的工作。

1973年春，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叶剑英当即亲自去看望，帮助解决生活方面的问题。同时，向他介绍了军队的情况，征求他对军委扩大会议筹备工作的意见。为了加强中央军委的领导，叶剑英当面向毛泽东建议说：“小平同志回来了，我提一个要求，让他来参加和主持军委工作。”毛泽东采纳了叶剑英建议，同周恩来商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并参加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工作。

这一年12月12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他提出：“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然后指着叶剑英说：“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讲话。”毛泽东让叶剑英召集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来参加会议，负责具体组织这项工作。

12月15日，毛泽东又一次同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几个大军区负

责人谈话,他介绍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12月22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八个大军区司令对调。在召集这些司令员开会宣布中央和军委的决定时,毛泽东指着邓小平说:“现在,我请来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给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参谋长吧。”在座的老同志听了毛泽东的话,都为请回邓小平欢欣鼓舞。

叶剑英更是高兴。他深知,“得贤则昌,失贤则亡。”张春桥等人觊觎军队要职已久,迫不及待的关键时刻,这个任命的意义有多么重大!他立即表态,要求大家认真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他到邓小平住处,同他商议军机大事,研究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措施,并组织总部领导和机关人员向他汇报军委工作和部队的情况。

二

邓小平复出后逐步接管了党政军的指挥权力,这对“四人帮”来说是个晴天霹雳,他们又怕又恨,阴谋再次打倒他。

1974年1月上旬,越南当局突然向我西沙群岛发起进攻。

1月1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成立由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中央军委五人小组,全权处理军委日常事务及紧急作战事项,得到毛泽东赞同。

这时邓小平虽然尚未正式任

命军委总参谋长职务,叶剑英对他很尊重。在紧张的几天几夜作战过程中,他和邓小平一起守候在总参谋部作战值班室里,研究敌情,调配兵力,发出一道道命令。

叶剑英一边指挥作战,一边还要抵御“四人帮”射来的“批林批孔”冷箭。他排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等人干扰,坚持与邓小平一起共同指挥,迅速击退了越南入侵军。

为了固守祖国海疆,叶剑英和邓小平研究,并请示周恩来总理同意,派出一支舰队南下,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

1月20日,经报告毛泽东主席批准,叶剑英向前线部队发出命令:坚决收复甘泉、珊瑚、金银三岛。经过激战,全部收回了越军占领的岛屿,西沙自卫反击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

三

“四人帮”插手西沙之战,捞取了政治资本,变本加厉地掀起批“宰相”的恶浪。江青点名批评叶剑英,勒令军队要进一步开展“批林

批孔”,要“放火烧荒”。

叶剑英于1月30日,写信给毛泽东,用“检讨”方法反击江青。周恩来也亲笔致信毛泽东,阐明自己的观点。2月15日,毛泽东在叶剑英的信上批复,对江青一伙提出了尖锐批评,制止他们的错误作法。毛泽东写道:“叶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江青、张春桥等对此怀恨在心。张春桥攻击说:“用检讨办法来告状,这也是一大发明。”

1974年7月,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江青不要开两个工厂,一个是钢铁工厂,一个是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戴大帽子。江青当着众人的面,表示工厂“不开”了,她故意把矛头引向邓小平,说:“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众人没有搭理她。毛泽东继续批评江青一伙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



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来到广州

派呢！……”他还严厉批评江青：“你也是难改呢。”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散会后，叶剑英一再问邓小平听清楚了没有？

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要他在周恩来生病期间，主持中央工作。这使“四人帮”更为不满，在10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一伙以所谓“风庆轮”事件，攻击国务院和交通部“崇洋媚外”、“搞卖国主义”。向邓小平发动突然袭击。邓小平义正词严，据理驳斥。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竟然辱骂他“又跳出来了”。邓小平愤然离开会场。在这场风波中，叶剑英完全站在邓小平一边，支持他同“四人帮”的斗争。

叶剑英得知这次谈话内容，欣喜异常，他相信中国的事情会有转机。

1974年11月，在江青阴谋“组阁”失败之后，邓小平陪同外宾到长沙去看望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汇报前一段工作。毛泽东主动提及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风波”，对邓小平公开抵制江青一事很欣赏，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我赞成你！”

邓小平坦率地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他们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毛泽东说：“我赞成你！他们强加于人，我也是不高兴的。”

“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后来我到江青同志那里去谈了一下。”邓小平风趣地说，“我这是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泽东连声说：“这个好。”

邓小平表示，一定挑起重担，把工作做好。

四

1975年1月5日，邓小平被正式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四届人大批准了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选出了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会后，周恩来总理病重住院，邓小平代总理主持中央的党政日常工作。叶剑英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继续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一个主政，一个主军，亲密配合，为挽救危局作出了巨大贡献。

4月间，邓小平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蓄意制造的以打击老干部为目的的所谓“反经验主义”问题，采取向毛泽东请教的方式，提出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同意邓小平的观点，认为“反经验主义”干扰了他倡导的学习理论运动。根据毛泽

东的意图，邓小平继4月27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之后，又于5月27日和6月3日主持政治局会议，集中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5月27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的会议上，邓小平针对江青等人搞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和“反经验主义”等三件事说：倒是要问一问，为什么？……你们批周总理、批叶帅，无限上纲，提到对马列主义的背叛，当面点了那么多人的名。来势相当猛。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这件事就那么雷厉风行！……

江青气急败坏地诬蔑说这是搞“围攻”和“突然袭击”。邓小平毫不退让，拍着桌子和她据理相争，并反复声明，这次会议是根据毛主席的批示和讲话精神召开的。要安定团结，要“三要三不要”，首先政治局的同志要做到。主席多次批评宗派主义、搞“四人帮”。他问我们讨论得怎么样，有没有结果？要我们好好讨论。邓小平针对“四人帮”



1985年，邓小平接见军委扩大会议代表

攻击他“4月27日会上的讲话过了头”，是“突然袭击、围攻”等，激动地说：“我看，连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谈不上突然袭击，过头了……”

6月3日继续开会。一向支持邓小平的叶剑英作了长篇发言。

他说，政治局讨论主席的批示和指示，是非常正确的。接着，他谈了三点体会：

第一点，要学马列。他说，3月1日出现“反经验主义”。全国报纸跟着来了，用“反经”代替“反修”。主席提出批评，不要只提一个（经验主义），放过另一个（教条主义）。我党真懂马列主义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主席批评的很尖锐。这个问题很重要，马列弄通可是难。一定要学习。不学好就没有武器。今后中央带头学。

第二点，要团结，不要分裂。他严厉批评，借口所谓“对付林彪”搞小宗派，而大搞“四人帮”。他说，团结的方法：一手是批评，一手是团结。如果保持非法的小组织存在，搞“四人帮”，就有害团结，分裂党。

第三点，要请示报告，严守纪律。他指名道姓地说，几乎重大问题都不请示。主席、小平同志的批评是完全对的。你们搞所谓“十一次路线斗争”，事先未请示；“批走后门”，也是事先未请示；“批经验主义”，又是不请示，要主席来纠正。以后凡是重大问题，都要政治局讨论。过去的错误，要引起严重注意。为什么不请示？使主席有感觉？他最后激动地说：“什么是背叛马列主义，搞得村村点火，处处冒烟！”

在叶剑英发言之后，王洪文顶不住邓小平、叶剑英的批评压力，被迫假惺惺地作了检讨。



△为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邓小平和叶剑英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

最后，江青也摆出“弱者”的姿态，承认自己在4月27日的会议上，“自我批评不够，表示再作进一步检讨。”事后她到处造谣说，邓小平开会斗争了她几个月。

不久，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开会批评“四人帮”的情况。

毛泽东说：“他们过去有功，现在就不行了，反总理、反邓小平、反叶帅……在政治局，风向快要转了。”他鼓励邓小平说：“没有大问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邓小平感到担子很重，说：“工作开始时，主席给我这个工作岗位，我说主席是把我放在刀尖上了。”

毛泽东再次说：“这是叶帅提议的，我赞成的。”

五

1975年6月24日至7月15日，叶剑英和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议开了22天，中心议题是整顿军队的思想作风和解决组织问题。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叶剑英作了会议总结讲话。

邓小平在会上切中时弊地指出：军队建设中要克服“肿、散、骄、奢、惰”，军队领导班子中要解决“软、懒、散”的问题。要自上而下调整好领导班子。他语重心长地说：“现在确实有些值得注意的现象，我们担忧啊！”

叶剑英在讲话中严厉地批判资产阶级派性，他要广大干部战士认识资产阶级派性的反动性和危害性，警惕阶级敌人混水摸鱼。他气愤地揭露江青等人插手军队、妄图搞乱军队的阴谋诡计，提醒大家注意。有人到处送材料、写信，要抵制。会上，徐向前和聂荣臻元帅也都作了重要讲话，一致赞同邓小平、叶剑英的意见。叶剑英还深入到小组听同志们发表意见，一个军区一个军区、一个军种一个军种，分别找人谈话，打“预防针”，把毛泽东批评“四人帮”的事透露给他们。他针对当时总部机关、军兵种和各大军区有些高级将领与“四人帮”关系密切，有些人对“四人帮”面目认识不清，若即若离的状况，打招呼说，有个别中央领导人不通过组织，擅自发指示搞运动，这是不正常的。不论是谁，未经军委直接向部队发指示，送材料，下

面有权抵制。决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他还十分关切地要求大家谨慎从事，少说话，不“授人以柄”。要注意形势，坚定立场，稳住部队，充分发挥骨干作用。这对到会同志是一付“清凉剂”，使大家心里有了底。

中共中央于7月25日发出通知，将这两个讲话转发全党。

紧接着，经毛泽东批准，征得邓小平同意，以叶剑英、聂荣臻等组成6人领导小组，对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北京卫戍区、国防科委等20几个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同时，对北京及附近战略要地的部队部署，也进行了调整。这对于抵制“四人帮”插手军队，巩固长城、稳定全国局势以至后来粉碎“四人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邓小平发起的在全国范围内各条战线的全面整顿，是党和人民反对“左”倾错误，同“四人帮”进行的一场重大斗争。从思想上唤起了全国人民的觉醒，从组织上清理了一大批坏人。

六

从1975年下半年起继“反经验主义”之后，“四人帮”别出心裁，又利用“评《水浒》”来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他们又写文章，又到毛泽东那里告“御状”，说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是不允许有人否定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

就这样，经过他默许，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对邓小平进行错误的批评。

“四人帮”摇身一变，成了批邓的急先锋。

在“四人帮”攻击下，在中央政治局内邓小平已经无法工作。

叶剑英毫不畏惧，他特意来到邓小平住处，气愤地对邓小平说：“这伙人欺人太甚，步步进逼，他们趁主席有病，越闹越厉害，下一步还不知道搞出什么鬼名堂，我们要赶快采取对策！”

“没有什么好怕的！我早就作了思想准备，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最坏是罗迈下场！，遗憾的是还有好多事没有作完，经济没有根本好转，许多老同志还没有解放。”邓小平不无遗憾地说。

叶剑英最担心的是邓小平下来以后，“四人帮”趁机篡夺国务院的大权。

邓小平告诉叶剑英：政治局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我的工作，我估计，主席的决心已经下定，就要“换马”了！

叶剑英心情变得沉重起来：“换马”也不是简单的事，要换的话，无非两个前途：一个是下台，另一个是‘一批二保’，至少还要继续留用一段，因为有些事情，主席不会全交给他们，他不会的！”

邓小平同意这种估计：“我作了最坏的准备，但我相信，我们的事业会后继有人。我们的党是有希望的。”他停下来，沉思一会儿，严肃地说，“我不在位了，不要紧，只要你老兄在，还有其他老同志在，就不怕那几个跳梁小丑闹事！”

叶剑英当即表示说：“看形势的发展吧，我也可能保不住了。但是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要斗下去！”

这年冬天，寒流袭来，冰封大地。“四人帮”在全国刮起了一股来势凶猛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全面整顿，半途而废。

七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

分，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

在举国悲痛的时刻，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却得意忘形，他们认为“批林批孔批周公”已经取得“彻底胜利”，妨碍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威胁已经消除。

1月15日下午3时，周恩来总理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由王洪文主持，邓小平致悼词。

江青等害怕邓小平亮相，于是举出种种“莫须有”的理由，极力排除邓小平。江青主张由王洪文或张春桥致悼词。

邓小平是党中央副主席，又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代替总理主持工作，应由他来作悼词。同时，考虑邓小平的困难处境，他极力主张由邓小平来作悼词，趁这个机会让他和广大人民群众见面。当人们从电视荧光屏上看到邓小平一出场，千万颗厌恶“批邓”、为邓小平命运担忧的心一下子都放下来了。

邓小平那严肃的表情，沉痛的声调，感染了会场内外的广大群众。叶剑英肃穆伫立在那里，和广大听众一样，止不住泪如雨下。他多么希望从此邓小平能接替总理，领导大家干下去啊！

“四人帮”按照预谋，在粗暴干预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的同时，他们在上海、辽宁等地召开各种会议，大肆煽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王洪文四处吹风说：“邓小平是还乡团长……”姚文元在亲自审发的新华社内参稿件中公开点名攻击叶剑英。

经过毛泽东提议，中央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理总理，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2月2日，发出中共中央一号文件，通知全党。邓小平被迫停止了中央领导工作，“专管外事”。此后，“四人帮”在中央连续召开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会议，即所谓“批邓打招呼会”，掀起一股

更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

更为严重的是，就在这个中央一号文件里，有另外一项重要通知：

“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以中央文件形式向全党通报共和国元帅“生病”挂职，这是破天荒第一次，来得非常突然。叶剑英早有思想准备，拒绝医生要他去外地休养的建议，继续留在北京。他对个人的荣辱升降早已置之度外，担心的只是国家和军队的命运。

“四人帮”迫使叶帅靠边站还不过瘾，2月6日，军委常委会，“四人帮”向毛主席、党中央提出1975年7月叶剑英、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两个讲话是错误的，建议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并且要求：“当前，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在深入发展，全军要积极参加这场伟大的斗争。”

于是，邓小平、叶剑英一时成了“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至今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黑干将”。

首都人民长期蕴藏在心底里愤怒的火山爆发了！人们走上街头，涌向天安门广场。上百万群众从四面八方汇拢来，排成阵势，庄严沉痛地悼念周恩来总理，愤怒声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

但是，这个具有伟大政治意义的大规模的群众活动，于4月5日，却遭到“四人帮”的镇压，成为震惊全国的天安门事件。

这场政治风暴，在阴霾笼罩的神州大地上播下了无数火种，点燃了亿万群众心底的愤怒火焰，化为巨大的震慑力量，使“四人帮”胆战心惊，惶恐万状。

江青一伙颠倒黑白，无中生有。造谣说：“到天安门广场闹事的

那些牛鬼蛇神、群魔百丑，都是按照邓小平的笛音跳舞的”，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最大的“风源”，“集中代表了党内外新生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和要求”，要打倒“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代表”、“黑后台”邓小平。出人意料的是，在重病中的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竟作出了错误决定，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四人帮”在疯狂地迫害邓小平的同时，把打击矛头进一步指向叶剑英。诬蔑他“保护邓小平”，“紧密配合了右倾翻案风”，逼他“靠边站”，妄图完全剥夺他对军队的领导权。

在“四人帮”肆虐的日子里，叶剑英还悄悄让子女们去问候邓小平，寄予安慰，沟通联系。在此期间，邓小平患前列腺炎，住进301医院，叶剑英给医院领导打招呼：一定要治好、一定要保护好。

八

面对“四人帮”的横行，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经过巨大创痛之后，更加觉醒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结束，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必须清除。人心思治，人心思定。人们一齐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党中央，希望有人站出来，振臂一呼，带动千军万马涤荡妖雾，重整乾坤。

仍保留着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的叶剑英，在国内享有重望，团结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运筹决策，粉碎“四人帮”的历史重任，理所当然地落在了他的肩上。

叶剑英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和充分准备，在华国锋的支持下于1976年10月6日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解决“四人帮”之后，中央召开

政治局会议，宣布处置“四人帮”的经过和商讨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大计。会议刚刚结束，叶剑英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粉碎“四人帮”的喜讯迅速透露给一直被“软禁”的邓小平和其他老同志。

粉碎“四人帮”不久，叶剑英立即考虑到请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了。他派他的孩子去把邓小平接到玉泉山，亲自向他传达政治局会议精神。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写道：“为了让父亲第三次复出，叶伯伯让他的小儿子亲自驾车，把还在软禁中的我的父亲偷偷接到他的住处。当时我还在场，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们两人见面之时，万分激动，父亲长叫了一声‘老兄’，两人的手便紧紧握在了一起。”

叶剑英和聂荣臻元帅商量，多次向华国锋提议，赶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恢复他原有的职务。他说：“小平同志具有治党治国的全面经验，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毛主席、周总理多次赞扬过他。现在，党内、军内的绝大多数同志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把小平同志请出来，恢复他原来的职务。”

紧接着，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排除阻力，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我建议让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他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

在当时中央还没有做出相应的正式决议时候，叶剑英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凡我看的文件，都要送给小平同志，让他看，熟悉情况。”他派自己的办公室主任和机要秘书亲自转送文件，汇报情况，后来，干脆派人把正在生病的邓小平请到西山疗养，离自己住的十五号楼不远的二十五号楼里住下，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叶剑英对中央的一份文件的修改稿提了两条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估价，应把提法改变一下，为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4月10日，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给中共中央写了封信，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含蓄地写道：“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5月3日，在陈云、叶剑英等一大批老同志的坚持下，中共中央转发了此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从此，一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在全国逐步开展起来。

7月16日至21日，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叶剑英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出席了这次会议。经过广大干部群众长达9个月的斗争，终于在这次全会上一致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叶剑英、华国锋、邓小平等人一起主持这次全会。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作出了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对经济问题特别是农业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并作出了相应的决策；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大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提出了健全党规党法和

民主集中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任务。全会在中央领导机构的人事安排上也作了重要变动。全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地恢复和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从此中国跨入了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新历程。

为了加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叶剑英，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不顾年迈体弱，风尘仆仆，奔走于全国各地，深入调查研究，指导经济建设。

1979年夏，叶剑英与邓小平在广州，听取广东省委负责人关于广东在对外开放实行特殊政策问题汇报，极感兴趣，当即与邓小平研究，表示大力支持，并要求他们尽快拟出经济特区条例，呈报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为了尽快解决特区问题，叶剑英于1980年特地到深圳、珠海经济特区视察，在那里召开座谈会，听取汇报。回北京以后，8月，他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叶剑英还和邓小平共同探讨香港、澳门、台湾回归祖国，统一大业问题。

1980年底，叶剑英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再次对邓小平的功绩作了高度评价。他说：“大家知道，小平同志在历史上对党作出过杰出的贡献。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每一个重要关头，他都敏锐、果敢地提出一些正确的决策和主张。在我看来，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他当全党的‘军师’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的。”

邓小平和叶剑英不仅重视培养选拔年富力强的革命接班人到中央领导岗位上，而且强调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有一次，他俩和王震交谈，说到荣毅仁等过去的实业人士，有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海外联系又十分广泛，应当积极发挥他们的作用。邓小平随即找荣毅仁征求意见。荣很高兴，表示愿意兴办国际信托投资事业。为了筹办这个工程，荣毅仁几次到叶剑英那里，听取他的意见。叶剑英对荣毅仁很器重，曾提议他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后来，中信公司成立，召开第一次董事会时，叶剑英亲自到会祝贺。

在广东梅县雁洋叶剑英元帅纪念馆里，有这样一张珍贵照片：邓小平和叶剑英子女们相聚在一起，他们互相交换抱着刚刚生下几个月的外孙女，笑容满面，其乐融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结束这篇两位伟人交往录的时候，让我们再摘录一段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说过的话吧：

“叶剑英，父亲解放前与他共事并不算多，但在解放后，特别‘文化大革命’以后，两人可真是肝胆相照，共解国难。”

这段话说得多么贴切啊！

（责任编辑：杜晋）





战斗在白山黑水间的赵一曼

罗瑞卿

与

赵一曼

● 刘德鑫

长江同嘉陵江，各伸出一只手臂，共同托起一座半岛。

半岛的大街上，车如流水，人似涨潮，林列的商场、宝号，显示出它的繁华。1926年，18岁的罗瑞卿离乡背井，来到山城重庆。

本来，他是可以在南充中学读完高中的，南充中学的校长张澜，国文教员周鸣柯，都是参加了革命党的。在他们教育影响下，罗瑞卿曾领头反对当地封建军阀“何大刀”，把个“何大刀”派出的“征捐委员”打得半死，然后才只身逃到重庆。

他已身无半文，肚子饿得咕咕叫，只好到一家“老虎灶”去讨口水喝。他刚走近“老虎灶”，忽觉天旋地转，眼前金星四溅，站立不稳，竟歪倒在地，一股滚烫的开水，灼伤了他的右手……

几天了，谁知创面越来越大，已受感染，他只好找家简易的医馆看病，医疗费嘛，只好用身上这件学生服抵押了。

“你叫什么名字？”

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模样的

人走过来问。

“我姓罗。”

“叫罗瑞卿，是吗？”

罗瑞卿惊奇的闪着不解的光波看着这位女医生。

“其实，我们早就认识了。”

少女粉嫩、红润的脸上流出一股亲切的笑意。

罗瑞卿开始打量这个少女，她身姿高挑，一头齐耳的短发，使她显得干练健美。

“不要傻想了，你没见过我，我可是见过你！”

罗瑞卿越发不解了。

“你反过‘佃当捐’吗？你打过涂团长吗？”

罗瑞卿没答话，却不断点头。

“这就对了。告诉你，你们南充中学，在张澜先生领导下，反‘佃当捐’的镜头，被重庆《新蜀报》的记者抢拍下来，登在这个报纸的头版上。我当时就那个领头的瘦高个学生印象很深。”少女说得很快，嗓音尖脆。

“啊——”

这时的罗瑞卿已不是那时的

罗瑞卿。那时，他是荣耀的勇敢者，胜利者。而眼下，是个逃亡者、叛逆者，腰无半文，潦倒街头的穷学生了。

她对罗瑞卿的创面首先做了清洗、消毒，然后上药、包扎，一切都那么轻巧，熟练。

“好了，回去吧！后天记着来换药。”

“这药费……”

“等换了药，一起结算。”

少女仍是先前那种爽朗、明丽的笑。接着又补了一句：“我相信反‘佃当捐’的勇士不会当逃兵吧！”

她清泉般的语音里，流淌着幽默。

来换药的时候，罗瑞卿把来重庆的处境，下步的打算。他都一一告诉了她。

少女听后，黑宝石般眸子转动了一下，神情变得严肃、郑重：“我现在告诉你，重庆的形势很好，进步势力发展很快，吴玉章和杨闇公他们，在莲花池设立了国民党（左派）省党部，你设法跟里面的人联系上，就好办了。”

说完，少女轻盈、敏捷地飘进医馆里间，不一会儿，她撩起桃花阴丹士林布门帘，拿出几块白花花的银元，递到罗瑞卿面前。罗瑞卿赶紧伸出双手，但不是去接，而是连连摇摆：“不行，不行，我的药费都还没付哩！”

少女仿佛像站在她面前的大姐姐，口气蓦地变得老成：“我们的经历，有些是相同的。你现在的处境，我不能袖手旁观。告诉你，这钱不是送给你的，而是借给你。等你将来有了职业，我不仅要收回本钱，还要利息哩！……至于这次的药费嘛，将来一并算总账！”话音刚落，她又咯咯地笑起来。

离开医馆好远了，罗瑞卿还在想：她会有什么样的经历？为什么对重庆的政治形势这么了解？她是什么人？

罗瑞卿终于来到莲花池省党部，找到了杨闇公。陪他去的，是他在南充中学的国文教员周鸣柯。

从莲花池省党部大门出来时，周先生还特地把他送了一程。

周先生紧紧握住罗瑞卿的手说：“本周星期日，上午11点，我们就在‘又一村’火锅店见面。”周先生顿了顿，露出一脸神秘，“到时候呀，我还要让你认识一个人哩！”周先生说完，挥了挥手：“好，星期日见面时再说。”

“又一村”火锅店，坐落在重庆会仙桥附近一条巷子里。罗瑞卿刚到“又一村”门口，周先生已紧跟而来，身后还跟了一位短头发、大眼睛的少女。那不是医馆的女护士吗？罗瑞卿一阵惊喜。

“贵客临门，楼上有请！”肩搭白毛巾，腰系白围裙的跑堂，笑眯眯地上前招呼。

由周先生领头，三个人噤噤地直奔楼堂。

“白汤？红汤？”店堂倌一抖白

毛巾，利索地擦完了临窗的桌椅，回头问。

“红汤！”周先生不假思索地答道。

“红轻？红重？”

“红重！”

“好哩，红汤要火红，生意才兴隆！”

店堂倌说完，向周先生略为颌首一笑，径直下楼张罗去了。

周先生这时才小声告诉他们，“又一村”火锅店，是莲花池省党部的联络站，国民党右派在重庆十分嚣张，他们在总土地也设立了个省党部，专门跟“莲花池省党部”对着干。

“呵，还忘了给你们相互介绍了。”

“不用介绍，我们已经认识了。”罗瑞卿这次显得既高兴，又主动。

少女立刻“接火”，“你说说，我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干什么的？”

罗瑞卿压根儿没有想到她会这样答话，他的尴尬劲儿，引得少女咯咯直笑。

“这是赵一曼，宜宾的学生，对封建家庭不满，才到重庆来学医的。”周先生说到这里飞快地瞥了眼罗瑞卿：“像你一样，也爱吃‘红’，算得上一员‘红色女将’！”

周先生介绍完，才追问了一句：“怎么？你们先就认识？”“不不，我前几天被开水烫伤了，到过她的医馆。”

原来，赵一曼是位追求进步的少女。这次离家来渝，也是为谋职业，找前途的。

“红汤”上来了，还浮了几个玛瑙般富有光泽的大红辣椒，这大概就是说的“红重”吧。

上菜了，什么毛肚，鱼片，蘑菇，豆芽，摆了一大桌。他们边吃，边烫，边说。菜是热的，话是热的，

心是热的。

周先生告诉罗瑞卿和赵一曼，广州的国民革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采取了武装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斗争形式。北伐军从广东出发后，所向披靡，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不到半年，便推进到长江流域，东征西扫，江南的半壁国土，已经掌握在革命军手中，北伐军占领了武汉以后，矛头直指军阀吴佩孚、孙传芳。

“就说我们四川吧，川军迫于形势，只好停止了多年的混战，纷纷挂起青天白日旗，改称国民革命军，杨森编为二十军，刘湘编为二十一军，赖心辉编为二十二军，刘禹九二十三军，刘文辉二十四军，邓锡侯二十八军，田頌尧二十九军。但是，话又得说回来，各地的封建军阀，都是十分顽固的地头蛇，番号改之容易，思想改过来就难。”

周先生用食指推了推自己的眼镜架，加重了语气：“国民革命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加强武装，扩充军队，而培养革命骨干，就成为当前急需的工作。北伐军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副主任郭沫若，已



1926年，重庆中共党组织的负责人杨闇公。

派人到武汉等地,让黄埔军校在各地招收一批进步青年。我按杨闇公主任的指示,已给二位办好手续,争取近日登船去武汉,考黄埔,您们看如何?”

“那太好了,我们盼的就是这一天啊!”

罗瑞卿和赵一曼不约而同地回答道。

“好。”接着三人端起酒杯,轻轻一碰都干了。透明的液体,像透明的友谊,滋润着三颗透明的心。

赵一曼白皙、端庄的脸也渐渐红了。

周先生看着正在锅里翻滚的红辣椒,沉吟片刻后说:“重庆火锅,素有‘百菜百味之说’。单讲辣,就有轻辣、重辣、微辣、甜辣、酸辣、麻辣、咸辣、苦辣。川菜要吃得酸辣、苦辣,你们二位要离乡远去,将来更要吃得人生中的酸辣苦辣呀!”

……

罗瑞卿从周先生那里,取来了去武汉报考黄埔军校的介绍信、轮船票和路费,便启程了。

罗瑞卿与赵一曼几乎同时来到朝天门码头,然后登上“希望”客轮。“希望”号是卢作孚先生经营的民生公司的一条大船。上船安顿好后,他同赵一曼来到客轮的甲板上,凭栏眺望。此时,朝霞已经升起,煞是好看,红的黄的,层次各异,红有血红,绯红,桃红,粉红。黄有金黄,绛黄,鹅黄,杏黄,还有蛋青、湖蓝。其状如带如盘,如花瓣,如鱼鳞,色泽纷呈,千姿百态。罗瑞卿看得出神,似在遐想,好久才对赵一曼说:

“一曼同学,你看朝霞多美,简直像一帧名贵的水粉画精品!”

“确实太美了!”

看吧,那从宜宾流来的扬子江,从南充流来的嘉陵江,你们都



1947年,罗瑞卿(右2)和晋察冀野战军领导人在一起

送出了用自己乳汁养育了十几个春秋的优秀儿女呵,现在他们正在“希望”号客轮上结伴而行,就像两条姊妹河挽臂在重庆朝天门交汇一样。长江,你是要流向大海的呀!雄伟的朝天门码头,你可知道,十几年后,他们都成为了声名赫赫的英雄人物。他们的青春和热血,都献给了中华民族最壮丽的事业。

“呜——”

汽笛长鸣,是旅人告别家乡,告别重庆的心音。客轮开始起锚、掉头,离港……

罗瑞卿静静地看着这一切,胸腔内感情的潮水,像长江一样奔涌着,盼了好久的离家出走,今天终于实现了!一旦离去,又依依不舍,是对生他养他的青枫坡的牵挂?是对牛头山下儿时嬉戏的怀念?是对

风云一度的南充中学的恋情?总之,随着这撕心裂肺的一声笛鸣,宣布了他的远行。此时,罗瑞卿在心底呼唤:南充呵,我多久才能回来?重庆呵,我多久才能再见?他凝望烟云缭绕的远方,眼圈一热,视线渐渐变得模糊……

一只江鸥,盘旋头顶。它正以深沉的目光,像位历尽沧桑的哲人,冷峻地审视大地,审视大江。“哦,哦……”热辣辣几声鸣叫,似在向罗瑞卿发问:“人生的长河里,你是平淡地流逝,还是掀起洪波巨浪?”

此刻,朝霞满天,“希望”号已全速前进,去追赶辉煌。

(责任编辑:刘文)

志在千里岂嗟呀!
吾今即令身残老,
戎马廿年耻矜夸。
革命一生未虚度,
烈士鲜血浇红花。
蒋匪屠杀犯众怒,
磨难虽多心无瑕。
少小叛逃封建家,

● 罗瑞卿

抒
怀

周恩来与西哈努克亲王

●周哲

柬埔寨王国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是一位为柬埔寨的国家独立、和平和进步而不懈奋斗的杰出的领导人，也是一位影响世界的风云人物。西哈努克曾多次说过：“中国是我的第二祖国。”我要向读者讲述的是他与周恩来的深厚友谊。

日内瓦会议，柬埔寨代表被周恩来“迷住了”，万隆会议，西哈努克初尝周恩来带去的茅台酒

诺罗敦·西哈努克，1922年10月31日生于柬埔寨金边，他出生之时，祖父诺罗敦·苏他罗亲王——著名的诺罗敦国王（1859—1904）之子，模仿着一位印度佛教传奇式的王子的名字，给他起了一个讨人喜欢的名字，叫“西哈”（巴利文意为“狮子”）。祖父认为“西哈努克”应该成为高棉的一位“狮心王理查”。他的外祖父——当时的国王西索瓦·莫尼旺则预言：“诺罗敦·西哈努克将有一天占据着柬埔寨最高的职位。他的一生将是非凡的……”

西哈努克的父亲诺罗敦·苏拉玛里特是一位音乐爱好者，做过萨克斯管和笛子演奏员。因此对幼年的西哈努克，父亲试图在艺术上培养他。这使得西哈努克对音乐、

电影、戏剧等的爱好“达到了着迷的程度”。有人说：“西哈努克是一个不称职的国家元首，但他是一个高棉音乐的好作曲家。”西哈努克则认为，人民对他作出的评价说明他是一个称职的国家元首；“至于好作曲家嘛，我想，是不坏。”后来，流落到国外的同胞们还广为传唱他写的歌曲，这令他格外的激动。西哈努克的经历和修养，决定了他是一个丰富多采的国家领导人。

1941年4月，国王西索瓦·莫尼旺驾崩，19岁的西哈努克，被扶上了王位。登基之始，西哈努克“非常恐惧”这个王位，他曾对父母说过：“我挑不了这么重的担子，我太年轻了。”考虑到家族的利益和法国当局的威严，他只好顺从地搬进了王宫——克马林宫。

年轻的西哈努克国王开始较多地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是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从4月至7月，周恩来为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的和平，在日内瓦会议上竭尽全力。而西哈努克也派出了以外交大臣狄普芬（也称狄潘）为首的代表团参加会议，他自己则“住在法国南方的一个偏僻的地方，通过电话和我的使者们始终保持不断的联系”。

西哈努克在遥控自己的代表团时，了解到：“周恩来是个老练的行家，他预料到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柬埔寨是属于西哈努克的，他邀请了我的代表们在他租赁

的日内瓦郊区的宅邸里共进午餐。招待是完美的，烹调是考究的。席间大家开怀畅饮，不断地举杯相互致意。周恩来请狄潘转达他对我的敬意和祝贺。”

不过，周恩来更关心的是促使印度支那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在恢复和平后成为自由、民主、统一和独立的国家，不参与任何军事同盟，也不容许任何外国在该国中建立军事基地，他呼吁与会各国共同承担保证柬埔寨等三国和平的义务。周恩来的智慧和风采，令与会各国代表倾倒，也使柬埔寨的代表着迷。西哈努克也感到惊奇，他说：“回到金边后，我的代表们向我称赞中国总理，他们被他迷住了……他们还对中国的美味佳肴大加赞赏。”

日内瓦会议以后，正当西哈努克认为自己“成功地实现了使国家获得完全的独立”的时候，1955年3月3日，西哈努克爆炸了一颗政治“原子弹”：放弃王位，让位给父亲苏拉马里特亲王。而他自己又变成了西哈努克亲王。同时西哈努克宣布他组织了“人民社会同盟”，并担任主席。

一个月以后，西哈努克亲王率领柬埔寨王国代表团出席了第一次亚非会议。令他终生难忘的是：“作为柬埔寨王国代表团团长，我在那里认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他那高超的智慧、渊博的学识和文雅的风度，一下子就

把我吸引住了。他向我介绍他的助手陈毅元帅，陈也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周恩来的主张和风度，极大地影响了会议的走势。最后，形成了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内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由此也产生了万隆精神。

4月20日，周恩来在中国代表团住的别墅里宴请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柬埔寨代表团。周恩来知道西哈努克在饮食方面极为讲究，因此让随团厨师做了最可口的中国菜肴。品尝以后，西哈努克才体会到1954年他的外交大臣狄普芬为何那样大加赞赏周恩来带去的中国厨师的烹调技术。

只是对周恩来带去的茅台酒，西哈努克有些难以胜任。用他的话来说：“我必须当中国人欣赏的用米酿制的茅台酒。周恩来在私生活上严肃刻苦而闻名的，但他又是一位喝了无数杯茅台酒以后仍保持头脑清醒的很能干的外交家。”

当时，新中国与柬埔寨王国并未建立外交关系，而柬埔寨却与台湾的蒋介石集团有着领事关系。周恩来仍以毛泽东和他个人的名义热情地邀请西哈努克访问中国。西哈努克愉快地接受了邀请，相应地，他也邀请中国总理对柬埔寨进行正式访问。两位领袖都预感到，两国间新型的关系，将要缔结；而从这时起，两人之间长久的友谊，也开始了。

西哈努克首次访华，周恩来答应无条件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机场送行，周恩来狠批擅自离开者

1955年10月，西哈努克担任柬埔寨王国政府首相兼外交大臣。1956年2月，应周恩来的邀请，西哈努克首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2月14日，当西哈努克率领的柬王国国家代表团抵达北京机场时，受到难以想象的“比在马尼拉时还要隆重得多”的欢迎。2月15日，周恩来与西哈努克开始正式会谈。对独立不久的柬埔寨王国能够奉行和平中立政策，周恩来大加称赞，认为这一政策使得柬埔寨在亚洲的地位升高了。西哈努克也明白，正是这一政策，使得他自己在在中国受到如此高的礼遇。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慷慨地表示：愿意无条件地对柬埔寨提供经济和技术上的援助。

中国的这一无条件的援助，使得西哈努克感激不已：“这一次中国之行，为我国奠定了真正的工业基础，因为我的朋友周恩来以他的政府的名义为我援建了三座大型工厂：即磅湛纺织厂、金边附近的岱埃胶合板厂和桔井省的川龙造纸厂。周和我都努力使柬埔寨实现在就地取材、加工和直接服务于人民群众（即收购棉花、木材和竹子，

提供棉布、普通胶合板、文化用纸等）的基础上的工业化。到1958年，中国又援建了三座工厂……”

西哈努克信奉佛教，他认为：“佛教是一个进步的、给人以希望和启迪的宗教。一个没有教条的，充满哲理、伦理、至善的，而又永葆青春活力……”他甚至说，要把“佛教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我的党和我的政府为祖国服务的伟大思想”。周恩来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但是，他很尊重别人信教的自由，2月16日晚，周恩来专门抽出时间陪同西哈努克亲王来到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阜内大街的广济寺，出席中国佛教协会为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的素宴。

西哈努克在北京期间的活动，周恩来几乎都全程陪同。周恩来还安排西哈努克与毛泽东进行了三次长时间的会谈。

为表示对中国的感激和敬意，西哈努克也带来了柬埔寨人民的心意。2月18日晚7时，西哈努克在中南海勤政殿，郑重地将父王诺罗敦·苏拉马里特赠予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柬埔寨王国最高勋章——大十字勋章，佩戴在毛



1956年11月，周恩来、贾龙在西哈努克陪同下乘船参观渔村

泽东和周恩来的胸前，并分别向毛泽东和周恩来转交了苏拉马里特国王的赠勋证书。

赠勋仪式结束后，周恩来和西哈努克分别在中柬联合声明上签字。当晚，毛泽东举行宴会，庆祝西哈努克亲王圆满地完成了对中国的首次访问。

2月19日清晨，周恩来率叶剑英元帅及几位部队和外事部门的高级干部前往北京西郊机场，欢送西哈努克一行。2月的北京，气候仍是天寒地冻，这天一早偏偏刮起了西北风，机场上的人站久了冻得直打颤。但见周总理自若地挺立在寒风中，其他送行的人们也不敢有丝毫懈怠，直到把西哈努克送上飞机。

按当时的礼仪，飞机离开时要在机场上空盘旋一周，以示告别和感谢；送行的人也应行注目礼、挥手示意。当西哈努克的专机起飞后往回转时，周恩来回身发现两位高级干部不见了。原来，天太冷，那两人见飞机已经起飞，就急着跑回了候机室。等飞机走远了，周恩来立即派人把跑回候机室的两个人叫了出来，很生气地批评道：

“人家飞机还没离开，你们就先走了，这是看不起人家，……你们这是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

挨批的干部，还没见过总理生这么大的气，心里很内疚、难过，赶紧跟总理认错。但周恩来仍严肃地批评下去。叶剑英见大家不好下台，况且怕总理站在寒风里太久了身体受不了，便出来解围说：“总理，他们已知道错了，就不要再说了吧。”这才算了结。

九个月以后，周恩来应西哈努克和柬埔寨王国政府的邀请，回访了柬埔寨。从他到达金边机场，到访问磅湛省、暹粒省、贝昂希腊累镇等地，直到离开金边机场，西哈

努克亲王都热情地陪同在左右。周恩来还两次拜会了西哈努克的父亲、母亲——苏拉马里特国王及王后。这时的柬埔寨，虽然首相一职暂时改由桑云担任，但是，周恩来与西哈努克的私交，却有增无减。

1958年7月19日，中柬正式建立外交关系。8月，西哈努克再次以首相身分率国家代表团来访。周恩来陪同西哈努克到东北、天津、河北等地参观访问，还带他参观了我国第一座实验性原子能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对这种保密性强的项目的参观，表明中国政府和周恩来对西哈努克的信任。就在这年，根据柬埔寨的实际情况，周恩来又指示援建了贡布省的乍格雷丁水泥厂、金边附近的斯栋棉吉玻璃器皿厂和马德望省的第二纺织厂。

西哈努克的父王驾崩，周恩来改素装前往吊唁。亲王以国家元首身份来访，把三个儿子交给周恩来

进入六十年代，西哈努克的人生又发生了一次转折，同时，他与周恩来的交往也进一步加深。

1960年4月，西哈努克的父亲苏拉马里特国王被糖尿病夺去了生命。这时的柬埔寨人民，又一次面临着对新国王的选择。由于西哈努克亲王早在1955年放弃王位时就曾宣布过“永远不重新登基”，因此他拒绝继任王位。柬议会只得接受了一个宪法修正案，规定在国王选出之前，可以选举国家元首。这样，西哈努克被国民议会和王国议会联合选举为国家元首。

这时正在印度、尼泊尔等国访

问的周恩来和陈毅等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也面临着一个选择。按原定计划，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将于5月上旬访问柬埔寨王国。但是国王苏拉马里特突然去世，使柬埔寨沉浸在悲哀中。柬方表示，如果周恩来总理按原定日期前往，由于正值柬国丧时期，可能会影响接待的规格；如延期到前国王火葬之后，将按原定计划受到隆重接待。

延期访柬，无可厚非，也符合国际惯例。但周恩来和陈毅经过慎重考虑，以中国人特有的体谅、谦逊和真诚作出决定：仍按原定日期前往金边，以便亲自吊唁苏拉马里特国王；请柬方在接待方面从简，中柬友谊是深远的，不在于接待的规格。为此，周恩来专门安排给代表团成员每个赶做了两套丧服。

5月5日上午9时，当一身素装的周恩来出现在金边机场时，前来迎接的西哈努克亲王百感交集，他立在舷梯旁，紧紧抓住走下来的周恩来的手，心中十分感激中国政府在他和他的国家沉浸悲哀之时所给予的最真诚的友谊。当周恩来和西哈努克亲王乘坐的汽车进入金边市区时，被欢迎的群众挤得寸步难行，他们只好下车步行，接受臂带黑纱的人们赠予的花环……

到宾馆稍事休息后，周恩来立即前往金边桑园别墅拜会了西哈努克亲王，一边表示慰问，一边恳望他节哀。在取得西哈努克等人的同意后，周恩来于下午前往灵堂，向诺罗敦·苏拉马里特国王的遗体致哀，他和陈毅在前国王的遗体脚下安放了两个巨大的花篮。随后，他又到国王御座宝殿拜会了西哈努克的母后和摄政委员会。当晚，柬埔寨摄政委员会主席西索瓦特·莫尼勒亲王（他是西哈努克的舅父，曾在西哈努克放弃王位时，投票赞成西哈努克的父亲担任国



1960年5月，周恩来访问柬埔寨，与西哈努克等在一起

王)在金边克玛林宫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招待周恩来一行。

5月6日，西哈努克安排了一个新“节目”，请周恩来主持柬埔寨皇家电台的开幕式。这个电台，是上次(即1956年)周恩来访问柬埔寨时亲自赠送给西哈努克亲王的礼物。电台的开播，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和领导人之间的友谊，而由周恩来以主人身份主持开幕式，更显出兄弟般的情感。在柬埔寨，像这种由中国赠送或援建的项目，正发挥着积极、有效的作用。这次来柬，西哈努克带着周恩来参观了几处由中国援建的工厂，在援建过程中，这些工厂从始至终都浸透了周恩来的心血。

这年12月，西哈努克亲王以柬埔寨国家元首的身份访问中国，他还带来了夫人莫尼克。这样，邓颖超也出面和周恩来举行宴会，为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接风洗尘。这次会面的最大成果，是双方签订了中柬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在条约签字的第二天，周恩来和陈毅陪同西哈努克和夫人乘专列到南方风景优美的城市南京、杭州等地参观访问。泛舟西湖，登上钱塘江边的

六和塔，观赏钱塘江大桥和渔舟江景，聚宴楼外楼……西哈努克深深地感受了中国河山的壮丽和人民的勤劳、热情。

这次来访，西哈努克也提出建议：召开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以解决老挝问题，并吸收老挝的邻国如缅甸、泰国、印度等国参加。这一建议，得到了周恩来的赞同和大力支持。几天以后，周恩来率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友好代表团出访缅甸时，立即向缅甸领导人吴努和奈温表示：“西哈努克亲王访问中国时对我表示他建议召开日内瓦扩大会议的建议很好。解决老挝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召开日内瓦会议，并吸收老挝的邻国参加。我们反对把老挝问题提交联合国，反对美国操纵联合国进行干涉。”由于周恩来在国际社会的呼吁、支持，西哈努克的建议得到了许多国家领导人的响应。

整个六十年代，周恩来与西哈努克的来往都比较频繁，西哈努克多次访华。有两次，周恩来还亲自从北京分别到昆明和重庆迎接来访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前一次他用专机把西哈努克接到北京；后

一次他陪同西哈努克乘船从重庆顺长江而下，过三峡，到武汉，后又在北京再次欢迎西哈努克一行。在西哈努克访华期间，他与邓颖超多次设家宴与西哈努克夫妇聚会，亲如一家。

正是这样的亲密关系，六十年代初，西哈努克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送到中国来学习，让柬埔寨驻华大使兰·涅特把他们交给周恩来和邓颖超。周恩来和邓颖超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亲自出面作三位王子的监护人。周恩来对有关部门交待：这是西哈努克亲王对中国的信任，要为三位王子找一个比较适合的学校，安排好他们的教育、管理以至生活。他还指示学校方面：对三位王子在汉语、英文、数学、纪律、品德和教育方面要求要严格，并指定专人予以帮助；但在意识形态、政治思想、劳动课等方面则不要像对中国学生那样要求。三位王子中除尤瓦纳王子因故中途退学外，其余两位一直到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还在学习，且成绩都很好。西哈努克对此很满意，并多次表示感谢。

柬埔寨发生政变，周恩来仍以国家元首的礼遇迎接西哈努克，西哈努克感慨：“中国是我的第二祖国”，“周恩来是我最近的朋友”

1970年春天，西哈努克的命运再一次发生重大的转变。3月18日，柬埔寨以朗诺、施里玛达为首的右派势力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了政变，议会在被坦克和全副武装

的士兵包围之下,通过了黜除西哈努克亲王职务的决议。

在这之前,西哈努克正在莫斯科访问。从西哈努克离开金边和柬埔寨局势混乱时起,周恩来就给予了极大的关注。3月13日以后,由政变分子策划的反对西哈努克的游行示威越来越严重。14日午夜12时,周恩来紧急召见柬埔寨驻华大使乃·瓦朗丹,对他说:

“西哈努克亲王到了莫斯科的消息知道了吧。听说准备16日离开莫斯科,17日到北京。我们政府听到在你们国内金边出现的情况感到不安,对于捣毁越南民主共和国驻金边大使馆和越南南方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驻金边大使馆的行动,我们感到遗憾,并且还有谣言说要捣毁中国驻金边大使馆。还有,在捣毁越南使馆的暴徒出现了反对中国的口号。”

周恩来还强调:“要防止有坏人在北京也挑拨,特别是在亲王已经宣布了要来北京的消息以后。因此我们更要采取措施注意亲王的安全。”

紧接着,周恩来布置了准备接待西哈努克亲王和保证亲王安全的工作。

18日,正当西哈努克准备从莫斯科登上飞机前往中国的时候,朗诺在国内篡夺了他的政权,并禁止他返回柬埔寨。各航空公司被威胁:如果西哈努克返回金边,将没收接他回到波成东机场或暹粒机场的飞机。据说朗诺下了一道军事命令,如果西哈努克不顾禁令飞抵金边,将立即给予绑架或暗杀。西哈努克只好暂时取消了回柬埔寨的念头,飞往中国。

3月19日上午,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上以国家元首的礼遇迎接了西哈努克。他与西哈努克同坐一辆汽车,一直把西哈努克送到钓鱼台

宾馆。在五号楼西哈努克的住处,周恩来专门作了精心安排:会客室里摆放了各种古董、字画,各种家具典雅、整洁;为西哈努克的夫人莫尼克公主挑选了一批可靠的工作人员。周恩来安慰西哈努克:“贵国一切恢复正常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请你暂时把中国当作你的第二个家吧。”

周恩来一直在钓鱼台宾馆,等西哈努克安顿妥当。上午11时,周恩来与西哈努克举行了第一次会谈,他说:“我已发表了亲王作为柬埔寨国家元首抵京的消息,并报道了到机场迎接亲王的外国使节的名单。事变发生后,你曾宣布马上回国。后来没有回去,我们觉得不回去更好。”中午,又设宴为西哈努克和夫人以及柬埔寨贵宾“压惊”。

为讨论柬埔寨和印支局势,几天里周恩来连续与西哈努克等人会谈。3月22日晚,在同西哈努克的第四次会谈中,周恩来就西哈努克将要对新闻界发表的讲话说:

“亲王向柬埔寨人民的讲话稿,有强大的号召力,相信柬埔寨人民听到亲王的声言一定会有反应,会受到很大鼓舞,……中国决心支持亲王直到亲王胜利回国。只要亲王有决心斗争到底,我们一定支持你。”

对周恩来的理解和支持,西哈努克深为感动和感谢,他也坚定地说:“有中国的支持,我一定要坚持斗争,长期斗争也好,有很多困难也好,我决不后退。”

次日,西哈努克在北京对新闻界发表了《告高棉同胞书》和庄严声明,宣布成立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自任主席。

3月28日,在同西哈努克的第五次会谈中,尽管西哈努克对苏联的谨慎态度感到不安,周恩来仍然鼓励他坚定信心,说:“朝鲜支持亲

王,阿拉伯国家中不少是支持亲王的。非洲也是同样的情况。将来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支持亲王的正义事业。”

5月20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著名的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称:“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热烈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毛泽东强调:“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这一声明,给西哈努克和柬埔寨人民以极大的鼓舞。

在以后的两年时间里,周恩来与西哈努克的正式会谈,就有三十多次。一些其他的会面、谈话、共同出席的活动就更多,可以说数不胜数。周恩来和中国政府不仅在政治上、外交上、道义上等方面大力支持西哈努克以及他所领导的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王国民族团结政府,而且在衣、食、住、行等物质和文化生活各方面,都全力地提供了优质的保证。周恩来多次陪同西哈努克参观、游览中国的许多城市;安排西哈努克到避暑胜地北戴河疗养,并专诚偕邓颖超到北戴河看望西哈努克夫妇;他无数次地到西哈努克的住地拜访,有时甚至刚刚从国外或外地回到北京,就赶紧去看望西哈努克。另外,周恩来还多次促成西哈努克从北京出访越南、朝鲜、罗马尼亚等等国家。西哈努克每次离京或回京,只要周恩来在北京,必定到机场或火车站去送行或迎接。尽管在“文革”中“左”的思潮冲击了中国的外交政策,两国领导之间也出现过一些意见分歧,但是,双方的友谊,尤其是周恩来与西哈努克的私交,却仍然很深。

1970年10月9日,金日成秘密来华,除与周恩来等人交换对一些国际问题的看法外,原来并未安排其他活动。周恩来主动提出,可以私下去见西哈努克亲王。金日成答应了。周恩来高兴地说:“首相同志既然愿意见我,我可以联系一下。西哈努克对上次访朝是很满意的。你见他时可以打招呼说这次访问是秘密的。你见他,他会很高兴,感到我们都很尊重他。”

在周恩来穿针引线下,当天金日成就去拜访了西哈努克。正如周恩来说的,西哈努克非常高兴,能在流亡的情况下会见他国领导人,这是西哈努克求之不得的事,第二天,金日成便与周恩来谈起了与西哈努克的见面:

“昨天见了西哈努克,他很高兴。也见了他的夫人、儿子。我表示欢迎他再去朝鲜访问,在北京时间长了,可以去朝鲜换换空气。”

周恩来接着说:“增加你们麻烦就是了。一个资产阶级的皇帝,这样也不容易了。列宁就说过,阿富汗国王比英国的工党政府好。但他究竟还是王室出身,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动摇性都存在。首相同志对他做工作,请他去朝鲜换换空气,我们很赞成。”

金日成补充道:“他很注意礼节,今天要回访,已经同意了。”

在北京期间,西哈努克常常能感受到周恩来对他的悉心关怀和尊重。

1971年,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华以后,周恩来很快向三个国家领导人通报了情况。7月13日到河内见越南领导人。7月15日,到平壤见朝鲜领导人。7月15日晚,刚从平壤回到北京的周恩来,又和叶剑英前往西哈努克的住处,向西哈努克亲王和宾努亲王通报了基辛格访华的情

况。这种礼遇和尊重,在国际上也是极少见的。

1972年10月31日,西哈努克亲王在北京愉快地度过了他的50岁生日。这天晚上7时30分开始,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西哈努克亲王举行了盛大的50寿辰庆祝宴会。金日成首相和夫人专程从平壤赶来参加。宴会上,周恩来真诚地祝愿西哈努克健康长寿,祝柬埔寨早日解放。周恩来还出席了宾努首相在北京为西哈努克举行的祝寿宴会。

1973年10月,经过中方的交涉,尼克松终于同意周恩来提出的“人道主义的要求”,让法国飞机去金边接出西哈努克的母亲——王后陛下。10月17日,周恩来亲自到东交民巷十五号宾馆,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住在那里的西哈努克亲王。西哈努克很爱他的母亲,这一消息又一次给了他极大的安慰,了却了他几年来的一桩心愿。

1975年4月,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终于在人民的支持下,收复了金边,并解放了全国,9月,西哈努克将返回柬埔寨,8月26日晚上,西哈努克和夫人前往医院向周恩来辞行。这时的周恩

来,已77岁高龄,病魔缠身。医生已预见到了周总理去见马克思的日子,但周恩来坚持要见西哈努克,周恩来艰难地对西哈努克等人回顾了柬埔寨的战斗历程,说:“你们的胜利是毛主席关于‘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弱国能够打败强国’这一英明论断的最好证明。”

周恩来还无限希望地对在场的西哈努克、宾努、乔森潘说:“你们两派要加强团结,巩固胜利,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建设不结盟的和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柬埔寨”。“现在柬埔寨主要的是民族独立和民主改革”。他也指出了“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不是容易走的”,“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最后,他感谢西哈努克等柬埔寨朋友前来医院看望他,并遗憾地表示,因健康原因不能参加两亲王的告别活动,也不能为两亲王和代表团送行。他祝西哈努克及其夫人归国旅途愉快。

这次会见,在愉快的交谈中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左右。这是周恩来去世前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国元首。

周恩来去世的消息传到金边后,西哈努克“全家立即沉浸在无限悲痛之中”,他的夫人莫尼克,



1965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家中会见西哈努克夫妇

更是泣不成声。他与宾努、乔森潘立即给毛泽东、朱德、邓小平和邓颖超发来一封很长的唁电，称“周恩来阁下是我们柬埔寨民族和人民的一位最亲密、最可信赖的战友。他是为建设我们柬中两国人民之间牢固的、美好的、纯洁无暇的友谊和战斗团结作出了最重要贡献的一个中国领导人。”连续几个“最”字，把西哈努克等人对周恩来的深厚感情溶了进去。西哈努克还专门发表谈话，称周恩来“是杰出的英雄和政治家”，“是柬埔寨人民最亲密的战友和伟大的朋友，为柬埔寨人民的胜利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第三世界人民、全世界人民特别是柬埔寨人民的心里。”

1979年初，由于越南入侵柬埔寨，使得西哈努克再次流亡。2月13日晚，他和夫人莫尼克从纽约飞抵北京。邓颖超特意迎着寒风，穿着厚厚的冬大衣，与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国党政领导人到机场迎接。

在西哈努克离开纽约时，曾有记者问他：去中国有何战略计划？他坦然地说：“中国是我的老朋友，回老朋友那里去。没有任何战略计划。”

当他在机场见到邓颖超，眼中顿时满含起泪花，说：

“邓颖超夫人身体不好，在这么冷的夜晚到机场迎接我这个退休了的人，这使我感到既光荣又激动。”

邓颖超连连说：“亲王是个爱国者。为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亲王的任务还很重大，不能说退休。”

西哈努克不由得又回想起自1955年万隆会议以来周恩来对他的崇高友情。邓颖超安慰他说：

“我们之间不是才几年的朋



1970年3月19日，周恩来来到机场迎接西哈努克

友，而是二十几年的朋友了。请亲王相信，我们中国人是说话算数的，对朋友是讲信义的。”

听到这曾经那么熟悉的话，西哈努克仿佛又见到了周恩来。他激动地说：

“我完全相信。我热爱中国，把中国当作我的第二祖国。”

邓颖超亲切地说：“中国永远是亲王的朋友，亲王可以长久住在中国。”

西哈努克一股暖流涌遍全身，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已回到“家”了。

他又一次感激地说：

“我完全听从中国人民和邓颖超夫人的安排。我对您，像对周恩来总理一样，怀着无比热爱和尊敬的心情……”

当西哈努克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生前最喜欢的海棠树及海棠花前时，“最亲密、最可信赖的战友”不见了，但他听到了邓颖超真诚的话语：

“我们之间的友谊，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责任编辑：刘家驹）

征订《炎黄春秋》1994年合订本

本刊1994年合订本（总第22期至33期），已装订完毕，欲购从速。

精装本每册44.00元，免收邮费，挂号寄书。

原拟装订部分平装本，因工厂方面的原因，未能如愿，请读者原谅。

汇款时务必将收件人姓名、地址、邮政编码写清楚。

本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联系人：杜习；邮编：100802；电话：6076801

一颗已石化的人齿在长阳出土，震惊了世界！改写了古人类起源的历史……

贾兰坡和长阳人

● 覃世清

座落在鄂西大山中的长阳，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古人类文化研究的专家们先后在这片长近百公里、宽约60余公里的神秘古老的热土上，一次又一次地出土了一系列令全世界为之震惊的重大发现，被誉为是古人类文化遗址的王国。

春寒料峭，雪水融融。公元1957年2月的一天，中国科学院最著名的人类考古学家贾兰坡教授等一行数人，风尘仆仆地赶到了长阳……

在这不久前，中国科学院接到报告，湖北长阳大堰乡钟家湾村农民，在当地一个石灰岩溶洞中挖“龙骨”挣副业时，挖出了一个绝世珍宝——一块古人类上颌骨化石，并附着两枚牙齿。中科院根据化石标本作初步观察后认为，人类上颌骨化石在长江以南还从来没有发现过……

钟家湾海拔约1200米左右，早春的山花已渐渐露出一张张笑脸。贾兰坡教授亲自在龙洞主持并直接动手进行科学发掘和现场清理工作。这次发掘工作成绩巨大，除该洞出土原已上送北京的几箱化石标本外，又发掘出中国犀牛、东方剑齿象、古豹、竹鼠、豪猪、熊猫、箭猪、獾、巨獭、洞穴鬣狗等40多种古动物化石。此时的贾兰坡教授心中既兴奋又焦急，兴奋的是这次重大发现将轰动整个世界，焦急的是这次找不到新人类化石就难予作最后确定……

春天逼近，气温转暖。参加发掘工作的人们，一个个累得满头大汗。直到发掘进行到第21天的上午，长阳文化馆长龚发达，使劲一锄下去，锄头光亮一闪，一颗牙齿化石蹦跳而去。龚发达惊叫：“我挖到了一颗人牙化石！”人们呼地一下子围拢过去。贾教授说：“拿来我鉴定鉴定。”当化石被传到贾教授手中。贾教授一看就“哈”的一声大叫：“真的是一枚古人类的白齿！好！好得很！可以下断定了，就叫‘长阳人’吧！”

人类的进化是十分漫长而又漫长的。人类历史学家将人类进化的历史大致分成猿人、古人、新人，现代人四个阶段。经贾兰坡教授和专家们，对几次由长阳钟家湾龙洞所获得的古人类上颌骨和完整的第二前臼齿



贾兰坡

化石以及其他古脊椎动物化石材料分析鉴定，最终被确定属更新世晚期，即距今30万年—10万年的古人类化石，并被命名为“长阳人”。后又经北京大学考古系碳十四实验室测定为十九万五千年。

“长阳人”的发现，震惊了世界，改写了古人类起源的历史。贾兰坡教授在《长阳人化石及共生动物群》的鉴定报告中指出：“长阳人”的面世，证明了长江流域以南的广阔地带同黄河流域一样，是古人类的发祥地，是人类起源的摇篮。

“长阳人”化石，现已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长阳人”被写进《辞海》和中学历史教科书。“长阳人”化石产地——长阳大堰钟家湾龙洞遗址，已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李宗仁、白崇禧“和共”内幕

● 奎 松

—

1948年12月16日以后，徐蚌会战前线遮天蔽日的滚滚硝烟渐渐消散了，这时的国民党，东北剿总所部55万人被人民解放军一举歼灭，华北剿总60余万人被困于张家口、北平、天津和塘沽之线，覆灭之期可待，徐州剿总所部70万大军，大部也被尽行歼灭，剩下的杜聿明集团10万余万人，于陈官庄、青龙集一带陷入重围。徐州防线一失，解放军将迅速进占长江北岸，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南京城，已经暴露在解放军的攻击之下。

国民党气数将尽，内部矛盾加深，实力尚存的派系却反而暗中庆幸。

长期和蒋介石貌合神离的桂系头目李宗仁、白崇禧，这个时候的腰杆子一下子硬了许多。李、白都巴不得能找个机会逼蒋下台。现在，这个机会已经摆在他们的面前了。

徐蚌前线噩耗频传，蒋介石有让李宗仁来代理总统的意思。白崇禧听到消息后颇为震动，电话中的语气显得特别亢奋。他甚至扯着嗓子对打电话告诉他这一消息的程

思远说：“跟德公说，蒋下野必须辞职，由德公正式就任总统，不能用代理名义。如果名不正，那就什么事都办不了。对于这一点无论如何必须坚持到底，不能有所让步。”

不过，人称小诸葛的白崇禧深知，如果只靠自己在华中所掌握的那些部队，要把蒋介石完全搬倒是不可能的。虽然有湖南省政府主席兼长沙绥靖主任程潜，以及河南省政府主席兼十九兵团司令张轸等联手，但实力仍有限。

22日，白崇禧接到在港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的密电，电称：“革命进展至此，似不应再有所徘徊观望之余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至所望于故人耳。”李济深要求白崇禧，务必与各反蒋势力共同携手，积极配合共产党，“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白崇禧心动了：如果不联络共产党，只靠国民党内部几支反蒋力量，要想把蒋介石搞倒，实在是太困难了。

12月24日晚，白崇禧致电蒋介石，主张国共两党停战议和。几天后，不见蒋的动静，白崇禧又推动广西、湖南、湖北、河南各省军政各界要人，一同于30日前后再电蒋介石，要求停战议和。这些电

报的目的，自然都是要求蒋介石下台。

除夕之夜，蒋介石终于被迫发表元旦文告，言不由衷地表示赞同议和，声称他个人的进退，全凭国民之公意是从。在宣读文告的晚会上，蒋介石毫不隐讳地说：“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

元旦刚过，蒋介石从南京撤往广州的、足以装备十余师的大批军火路经武汉，白崇禧将其全部扣留自用。白、蒋之间顿时形同水火。他不得不找来在他身边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刘仲容，请他经南京前往上海设法联络中共共同对蒋。他又致电南京召来与李济深有较深交情的桂系头面人物之一黄绍竑，要他尽快前去香港，向李济深说明桂系愿意联共反蒋的意向，希望李能够代为引见中共代表，切实争取中共的谅解与支持。

刘于1949年1月3日晚到上海，见到在上海的秘密联络人员吴克坚，向吴说明了白崇禧的想法。

开始，中共对于国民党方面的任何和谈意图，统统视为缓兵之计。毛泽东改变对和谈问题的态度，是在斯大林1月10日转来国民党政府的求和电报之后。考虑到

应当挫败国民党的和平攻势，同时也注意到利用桂系反蒋有可能大大缩短解放中国长江以南地区的时间表，毛泽东才在14日公开发表《对时局的声明》，表示可以与南京政府进行和谈。

就在毛泽东发表《对时局的声明》的当天晚上，黄绍竑到了香港。这时李济深已经乘船去大连，参加中共所召集的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去了。黄又找到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另一位负责人黄琪翔。他向黄琪翔说明了来意，并交给他一封写给李济深的信。黄琪翔打开信一看，里面写道：……健兄（即白崇禧，号健生）认为，蒋决不会轻易下野，必须更进一步表示，发表宣言，公布蒋氏罪行，必须有军事行动之准备，事前尤其应当与中共方面取得谅解与合作。因此，请任公（即李济深）向中共中央通告：（一）武汉反蒋经过及以后决心与行动。（二）请中共中央转知华中当局与武汉当局成立军事谅解，以免误会；（三）商定以后共同作战之计划。健兄并郑重声明：（一）欢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迁入武汉；（二）绝不维护南京宪法法统，拥护新政协解决国是。

黄琪翔看罢，笑笑说：“可惜来得晚了些，好在这件事任公早与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通过气，相信他们会愿意接洽的。”

三天后，黄琪翔领着黄绍竑前往一家饭店去见中共在香港的重要联络人潘汉年。

潘汉年告诉黄绍竑：“我会将你的来意报告中央，你是否有时间等呢？”黄绍竑颇感焦急，但仍表示无论如何要等到答复。

20日和21日，毛泽东、周恩来分别起草电报，指示给香港的潘汉年和上海的吴克坚，称：望告黄绍竑，只要白有决心，我们可以和

白联合对蒋。如白确有诚意，可派人带电台到郑州，通过市政府介绍至第二野战军司令部进行接洽。中共中央同时通知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准备接待白崇禧派来的代表。

1月21日，蒋介石突然宣布下野，李宗仁来电要白稍候勿躁。紧接着李宗仁竟成了代总统。正准备宣布蒋蒋罪状的白崇禧已无可奈何，他当即要黄启汉到南京去告诉李宗仁，既然已经走上这条路，那就一不做二不休，先来个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自由，争取人心；然后下令将蒋介石的嫡系干将陈诚和薛岳撤职，削其左膀右臂；同时与行政院长孙科商谈合作办法，不行就改组内阁。

蒋介石宣布下野的第二天，北平傅作义宣布接受和平改编，整个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和国民党将近200万军队已落入中共之手。李宗仁这时的思想也颇为矛盾。黄启汉来，李宗仁对白崇禧的建议不无同感，相信背起烂包袱也不是办法，表示愿意接受毛泽东提出的八条作为和谈的前提条件。

当然，李宗仁之所以不顾白崇禧的劝告硬要当上这个代总统，内心深处也不是没有自己的“小九九”。想到蒋介石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搞得一塌糊涂，就是蒋系内部也成土崩之势，一旦他能够与中共和下来，会得到国民党内绝大多数人拥护的，再借助美国人在幕后支持，最后取蒋而代之。想到这些，李宗仁刚一上台，就马上发声明，表示“愿即开始商谈”和平，同时宣布以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五人为南京政府的和谈代表，随时准备与中共谈判。同时，李宗仁一面秘密派专人送电文给李济深，请其力劝中共军队缓和攻势，开始和谈，以符人心。一面

秘密派过去曾为中共工作过的刘仲华与黄启汉同去北平，带信给毛泽东，希望“迅速推动和谈”。1月27日，李宗仁针对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向毛泽东发出一封电报，喷有怨言：“以往恩怨是非倘过分重视，则仇仇相报，宁有已时，哀吾同胞恐无噍类，先生与弟将同为民族千古之罪人矣。”以图谈判得到平起平坐。

二

24日，潘汉年在香港主动约黄绍竑密谈。潘汉年告诉他，中共中央已同意和白崇禧联合对蒋，要白立即派代表经河南信阳转道郑州与中共前线负责人联络。

潘汉年说：“李宗仁先生最好能够效法傅作义先生，先明确接受毛主席的八项条件作为先决条件，然后再具体商谈和平解决方案。如果空谈什么议和停战，恐怕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时机紧迫，我看先生还是尽快劝白崇禧将军与我刘伯承、邓小平两位将军洽商军事反蒋为最实际。如果局部商洽能够成功，将来很容易发展成全面的和平。”

黄绍竑第二天飞回武汉向白崇禧报告接洽结果。25日当天，白崇禧派鄂省和平促进会主席李书城和促进会干事李瀛刚二人经信阳到漯河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纵队所在地。四纵政治委员雷经天等接见了李书城和李瀛刚。身着长袍马褂的李书城带有几分遗憾地表示：“临动身时，白先生一再表示对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基本同意，只是感到贵方宣布的战犯太多，尤其不应包括他本人在内。不过，白先生已表示，他不会因此而放弃与贵方之合作，若得贵方同意，他愿意充任江南进攻蒋系军队

的先驱。”雷经天颇为严肃地说：“白将军愿意反蒋我军当然欢迎，但白将军近几年来助纣为虐与我军为敌的事实也是不容抹煞的。我想，白将军应当认清形势，尽快放弃一切幻想，如能协助我军解放江南自然最好，如若不能，像傅作义将军那样，接受和平改编，也可以将功折罪。不知白将军具体计划是什么？”

两人表示对这个问题无从回答，李书城思索片刻说：“据我看，白先生是希望能够尽可能保全军队，最好是只改变部队名称与指挥系统，如能在联合政府中给白先生以相当的位置则更理想。”

看到在座的解放军领导人听到这话时一个个都皱紧眉头，李瀛刚赶忙补充说：“当然，改编国军是天经地义的事。若对白先生施加一定的压力，相信白先生也会接受改编军队的条件的。只是最好能够酌量缓急，对白先生本人尤应从宽处理，允其立功赎罪，我想，彼等都十分愿意模仿傅作义部的解决方法。”

李书城等关于白崇禧希望保全军队的一席谈话，比较清楚地反映出白崇禧这时的心态。他在给黄启汉的指示中直截了当地提出：务必劝说中共军队不要过江，将来以长江为界，暂时南北分治。他甚至在1月22日写给李济深信中声称：现在李宗仁既已就位，决心以最诚恳态度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就应全力求和，并努力扫除独裁祸根。至于将来国是，则应“由国人公意抉择。”这种话，共产党有爱听与否，可想而知。

黄启汉与刘仲华于26日由南京飞到北平。28日上午与中共中央任命的北平市长叶剑英谈话约一个小时。黄一上来就滔滔不绝地介绍白密谋反蒋经过，但一句也没

有提到白有什么具体方案和设想。唯一让叶剑英注意的是，黄明确讲：“按说，解放军没有李白两先生，也完全可以胜利，但如欲更有可为，还是以争取真和平为好，否则全成为历史的罪人。”

刘仲华看来知道中共方面想要了解的是什么。他详细介绍了李白两人手下可能掌握的军队情况，说李宗仁交待，他所设想的和平解决办法无非两种：第一是局部和下来，并与中共并肩作战，第二是切实在八项条件下里应外合，推动全面和平。而李的计划是想等蒋离开后，真正拿到政权再与中共言和。为此，李宗仁要求他们作为李白二人的私人代表留在北平，以便成为他们与中共联系的固定中间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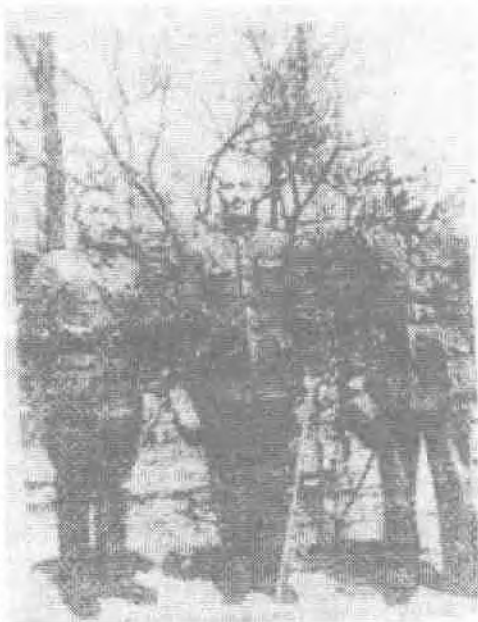
叶剑英听了两人的说明后，回答说：“我只讲几句话。第一，欢迎你们来。第二，所谈各节，我即转报我党中央，如有答复，当会转告你们。第三，既然你们打算在北平与我们建立固定联络，刘先生还想在北平家中暂住，我们会加以适当关照。第四，你们既然没有带来具体方案，请原谅我也只能如此答复。至于我党对时局的主张，在毛主席的声明里，可以说是讲得很明白了。”

在北平市委随后举行的碰头会上，与会者对叶剑英介绍的谈话内容都表示不满意，认为没有重要价值。可是，在西柏坡的周恩来读到简报后，却有不同看法。在周恩来起草的电报稿上，明确指出：黄刘二人的谈话是有具体内容、有文章可做的。基于“加深李白与蒋系的分裂，逼其站在我们

方面，走上推翻美蒋统治的道路”的方针，有必要利用一切机会使李白反美反蒋，与蒋系火并，以利我各个击破。因此，周具体指示了叶剑英下一步谈话的策略办法。毛泽东阅后，大笔一挥，表示同意。

2月2日，叶剑英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再度接见刘仲华，要其立即返回南京告诉李宗仁：“如果他确有反蒋反美、接受毛主席八条要求的真意，就应迅速与蒋分裂，逮捕蒋之嫡系将领，如顾祝同、汤恩伯、俞济时、陈大庆及特务头子毛人凤、郑介民、叶秀峰、郭紫峻、毛森等人，如此方能站住脚跟，进行和谈。否则，李白不扣复兴社和CC系，结果必致李白为复兴社和CC系的特务分子所暗算，弄得身败名裂。中间道路是万万走不通的。如果李白确有反蒋反美的实际行动，你还可来北平，并且可以带密码等准备建立直接联络。如果李白并无诚意，只搞骗人的把戏，那么，我们也没有时间与他们周旋。”

刘仲华听后，面露难色，停了



李宗仁（左）与蒋介石（中）白崇禧

三

半晌才说：“这件事德公做起来怕有些困难。德公这个人通常比较稳重。昨天上午我曾打电话给他，告诉他蒋这次公然释放冈村宁次等战犯，他作为代总统却无所作为，实在说不过去。如果他确实想要争取民心，就应当立即把冈村宁次扣起来，听候人民处理。但德公却以在电话里听不清为由不置可否。据我观察，德公是打算首先分化南京的政治力量，争取一部分军队为其所有，然后再有所作为。如此计不成，他会回武汉举旗反蒋，与中央并肩作战。”

叶剑英摆了摆手，从沙发上一边站起来一边说：“我看你还是抓紧回去一趟，把我们的意见告诉李先生，请他当机立断。如果照他的想法慢慢搞下去，不要说他搞得成搞不成，我军恐怕也奉陪不起。”

刘仲华也站起身来，笑笑说：“也罢！也罢！我马上回去。不过，我估计，德公在南京既无力量，也无胆量逮捕叶先生所提到的那些人，就是冈村也怕没有可能。既然如此，我去南京，如德公太稳重而不敢有的作为，我就由南京飞武汉，与健兄谈判，策动健兄单独行动。那时再来北平具体商谈行动步骤。”

最后，离开北平回南京赴命的只是黄启汉，李宗仁在电话中坚持要刘留下来，协助安排南京所派和谈代表来平事宜。

这时，人民解放军正在逼近和夺取长江北岸所有重要渡口，李宗仁在南京城里颇为被动。他三天两头打电话给刘仲华，一会儿要刘向中共开放煤运，以解宁沪煤荒；一会儿要刘与中共协商南京和谈代表名单。他还求助社会贤达，前往北平帮助他策进和谈。游说他的主张。

2月6日下午3时，一个民间组成的南京人民代表团代表8人飞抵北平。

8日上午，叶剑英接见了代表邱致中和吴裕俊。吴一上来就提出：“政府实际已经表示承认八条和谈基础，中共为何对和谈仍旧反映消极？中共迟迟不指派和谈代表和指定谈判地点，不免使人民产生误解。”邱致中也表示：“再不能打了，国家元气损伤太大，不出一年，国军必然全面崩溃，解放军为民众武力，损耗过大不免可惜。南京有主战主和两派，如能谈判，则主战派军心民心立时瓦解，和平不难取得。况且战犯早已席卷资财，远扬海外，就是打到广州，也无损其生命财产，所苦者只是人民和国家仅有之建设基础。”

二人振振有辞，叶剑英只是问道：“你们认为，在蒋介石继续存在的情况下，真有和平的希望吗？你们说李宗仁、白崇禧是主和派，但是，李宗仁上台以来，南京政府又做了哪一件根本区别于蒋介石、利国利民的事呢？残害中国人民的日本战犯冈村宁次还不是放掉了，特务还不是照样在南京上海肆意捉人，人民团体还不是一样没有自由，南京、武汉还不是一样在积极进行战争准备？”

吴裕俊和邱致中两人都苦笑着摇了摇头。邱答道：“叶将军的话当然有道理。蒋介石没有和平诚意，李宗仁、白崇禧也并非好人，所作所为让人激愤。但蒋桂之间确有矛盾，应该利用。李求和心切，若能蒋李分化，自可兵不血刃获得十省左右之土地，并先行解决桂系军队和其他非蒋系军队。那时组成联合政府，明令讨蒋，要夺取蒋系

军队控制的三五个省份，必然容易十倍不止。”吴也补充说：“国际国内所公认，和平谈判达成统一，不仅为人民所拥护，而且便于人民政府接收旧政权，由此而产生的联合政府，也易于为国际社会所承认。”

综合8日代表团成员的谈话，彭真与叶剑英两人致电中共中央报告说：代表们的基本意见在于，第一，主张利用蒋李矛盾。第二，另立新政府，不如通过和谈接收旧政府，便于控制全国和得到国际承认。第三，和谈成功，至少西到宜昌，东到上海，都可解放，那时蒋只剩台、赣、闽、粤四省，容易解决。第四，和谈策略应注意轻重缓急。中共中央复电称：“代表们所谓另立新中央不如利用和谈占有国际已经承认的旧中央，运用旧中央权力实行对蒋系讨伐等语，是真正代表美国和桂系的意见，在这些方面你们不要表示态度。”但“你们可向和桂系有关的代表暗示，只要桂系今后行动是站在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及能达成真正持久和平之目的，我们是不会拒绝他们的。”据此，叶剑英通过电话向代表团转达了中共中央的这一态度。

11日上午，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登上离平返宁的飞机。走上飞机舷梯时，代表们个个满面春风，好像他们已经成就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伟业似的。

就在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离开北平的第三天，“上海代表团”又飞抵北平。

对于这个代表团，中共中央更加重视。所谓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不过是被国民党封闭的“中国人民和平策进会”的成员，知名度并不高。而这个上海和平代表团，却是由国内享有盛名的四位年事已高的社会名流组成的，他们是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和邵力子。颜

惠庆已73岁，是著名的外交家，历任驻美、德、苏、瑞各国公使或大使，早年当过外交部长和国务总理，后为国民党立法委员，作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远东区域委员会主席。章士钊68岁，是著名的律师兼教育家，早年担任过大学教授、校长，办过报纸，做过司法总长、教育总长、政府顾问及历届国民参政员。江庸，72岁，早年做过北洋法政学堂教习、学部参事，也当过司法总长、大学校长、京师高等审判厅长，抗战期间任历届国民参政员，是修订法律馆总裁、法权研究会总长。邵力子，68岁，是著名的国民党人，曾任国民党陕西省主席、驻苏大使、中宣部长等职。这些人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因此，代表团14日到达北平不过两小时，中共中央就电示叶剑英等：在北平的高级军政负责人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均应参加接见和宴请代表团，“招待要周到，谈话要恳切”，代表团提出的要求应尽量满足，一般不予限制。

15日上午，叶剑英只身前往六国饭店拜访颜惠庆等。一阵寒暄之后，五人分别坐下来进行第一次座谈。颜惠庆首先表示：“我们四人合起来有300岁了，我还有心脏病，本来不适宜坐飞机的，但是还是带着医生来了。”

邵力子说：“三位老先生远道而来，负的使命很重大。当然，和平并非几句话可以说完的。来此也是李（宗仁）先生请求的。虽然我也68岁了，三位先生都比我年龄大，张治中先生对和平很热心，只是现在回兰州处理中苏贸易纠纷去了，如果和谈开始，我想他还是可以来的。李先生已有电报同意以毛先生的八条做商谈基础，只是如果八条一点都不折不扣，李先生实在为难。”

叶剑英听罢四位老先生的谈话，当即表示感谢各位代表的和平诚意，并说明一定转达他们的意见给中共中央。他同时解释说：“李宗仁先生感到困难的我想主要是八条中的第一条，就是惩办战犯问题。其实这一条我党不提出，人民也必然会提出来的。1927年以来，由于蒋的反动，使中国历史走了20年的弯路，人民和国家受到了巨大损失，这一责任应由谁来负……，必须明是非，追责任。但是，像傅作义，以前也列为战犯，北平和平解决对人民有功劳，人民就可以重新考虑傅的问题。李先生嘴上主张和平，可是一上台就放走了冈村宁次……”

“放冈村的决定，并非李作的。李先生还亲自去上海研究补救办法，但冈村已经被秘密送回日本了。”邵力子补充说。

“最主要的是怎么样使人民跟上来。”颜惠庆慢条斯理地插话说，“人民不能跑的，走到半山，要休息。领袖走得太快，人民在道德上、知识上都可能跟不上你们，要等等他们，你们在北平、济南做出样子来，人民就理解你们、欢迎你们了。就好像武戏唱了，唱一唱文戏，于国计民生更有利。”

江庸接过去说：“其实哪一党执政都可以。当年我们曾希望过国民党，现在失败了。这个班子唱不好，就换一个班子唱一唱。现在中国需要改革，什么人能够实现这个改革呢？只有中共了。最希望中共能使人民安居乐业，彻底刷新政治。”

叶剑英问道：“蒋介石并未放弃政权，还在幕后导演，究竟蒋李之间关系如何？有人说只是双簧而已，对不对？”

邵力子答称：“蒋李不是双簧。去年选举时，感情已经闹坏了。并

且历史上蒋对李也是不放心的，蒋下台，是形势所迫，蒋不想放弃政权，但亦无办法。因此，蒋介石最希望战争。假使不能和平，李非走不可。”章士钊插话道：“凡读过中共文告的，只有蒋介石高兴。因为蒋一读，便知道和平是不能实现的。”颜惠庆望了章士钊一眼，急忙解释说：“和平问题还是一步一步谈，大家商量，最好是见见面。我们不是代表，国共双方都有自己亲信人，可以另派代表来谈这些问题。”但章士钊好像并不在意，仍自顾自地接着说：“依我看，楚汉之争，韩信举足轻重。韩偏楚，则汉不能成功。现在桂系就似韩信，应该与之接近。这恰恰是蒋所害怕的。如果李不能成功，到时候蒋就会重新发号司令。”

中共中央历史上与邵力子和张治中接触较多，对两人印象不坏，因此早有电报要叶剑英“对邵力子应表示尊重与倾听他的意见，并和他单独谈一次，并探询他和张治中是否愿意参加联合政府”。

但是，与邵力子的谈话使中共中央感到失望。邵力子关于应当缓和与美关系的说法明显地刺激了中共领导人。在看到邵力子关于中共应当看到美国也有很多人同情中共，将来中共建设亦须美国帮忙的说法时，毛泽东边看边自言自语地说：“这是替美国作说客！”看到邵谈苏联大使赞同双方直接谈判的说法时，毛更气愤地敲着桌子，冲着正在对面读电报的周恩来的大声说：“你知道吗，苏联也是要和平的！”看到邵力子谈中国地大人多，中共应当尽量采取温和手段进行政治变革，双方和谈不要一上来就提出战犯名单迫使战败方承认时，他更是大声痛斥道：“这就是说，革命必须带上温和色彩”，“谈判还要承认对方与我平等”！

第二天叶剑英单独与章士钊谈话，章士钊的谈话也同样不受听。章又重提桂系举足轻重的话，说蒋迟走两天，白崇禧就宣布两湖独立了，现在白仍有力量，白一动作，四川也会跟着走的。因此，他再次讲，中共文告“同情中共者则担心，反对中共者则高兴”。认为如果中共寸步不让，美国会援蒋到底，组织日本志愿军，从而增加解决的难度。不如现在就和下来，仿照当年承认国民党领导组织政府的例子，要各党派承认中共为领导，用策略的办法来收拾残局，争取人心，平稳过渡。对此，毛泽东得出结论：章士钊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不和，美必援蒋到底，结果使帝国主义者及大资本家害怕，中共亦不能成功的。

毛泽东断言：“邵章很狡猾，是受美国人教出来的”。他明确要求叶剑英等，在以后的谈话中，要“痛骂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特别要当着章士钊的面骂日本，说如果美国人装备日本军队侵略中国，我们必须并完全有把握彻底干净歼灭之。美国在中国的走狗必须肃清，决不许其存在。要当着邵章的面痛骂桂系，说桂系的军队比蒋系军队还要野蛮，白崇禧过去是主战最力的人，他是仅次于四大家族的战争罪犯，将来人民法庭审判难免要被枪毙，李宗仁完全是骗子，他一月二十七日给我的电报以‘千古罪人’威胁，完全是做和平攻势。蒋系也是做和平攻势，但蒋系比桂系老实，蒋系始终是凶神恶煞，桂系昨天是凶神恶煞，今天是笑面虎”。当然，应当把握的一个原则是，“对桂系形式上要打，实际上要拉”。

毛泽东并非完全不重视代表们的谈话。颜惠庆一辈子搞外交，说话十分策略，虽讲得与邵章并无

根本不同，但却让毛泽东听得很入耳。他很重视颜所说的“学唱文戏”，赞同颜所提“先用武力，到一定程度改用政治。政治无效，再用武力。表明中共态度，不是好用武”，以此来取得民心的意见。毛当即与周恩来商定，接受颜惠庆的建议，与南京来一个非正式会谈，作为初步交换意见的方法。为此，毛泽东很快起草了几点意见，准备专门接见几位代表一次，然后交他们带回南京。

20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叶剑英，同意颜、邵、章、江要求会见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要求，批准四位代表及颜的私人医生，另外加上傅作义、邓宝珊和北平市委一人，总共8人于22日经石家庄前往西柏坡村，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见面。

22日上午10时，颜惠庆等乘机飞往石家庄并转往西柏坡村见毛泽东。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双方进行了两次交谈，毛泽东明确表示可以考虑与李宗仁南京政府谈判的问题，但必须“速议速决”，一切以八项条件为基础，谈得成解放军立即过江，谈不成解放军也立即过江。

劝说中共同意与南京政府举行和谈，这是代表团此行的基本目的。既然中共方面能够同意和谈，各位代表自然深感满意。根据毛泽东所谈诸点，章士钊迅速起草了一个八项协议，提交讨论。经过简短的讨论之后，双方就协议的基本文字达成妥协。这一秘密协议规定：中共和南京政府各派出同数代表在北平，以毛泽东所提八条为基础，进行秘密谈判，一经达成协议，应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终于说服中共中央同南京政府进行谈判了。这个结果实在让四

位代表兴奋不已。24日下午，四位代表返回北平后，仍长时间沉浸在激动的情绪之中。

27日上午11时，上海代表团再次来到了南苑的机场。叶剑英亲到机场送行。临上飞机前，颜惠庆松驰的脸上每条皱纹几乎都充满了微笑。他右手颤巍巍地握着叶剑英的手，左手轻轻拍着叶的肩膀说：“你们应该成功，应该成功，希望很快能在上海见到你。”叶剑英也注视着老人的眼睛，和声细语地说：“颜先生多多保重。我们很快会见面的。”在和个小个子的邵力子握手时，邵神秘地把叶拉到一边，问道：“你们是不是把《世界日报》给封了？”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深感遗憾地摇头说：“依我看，《世界日报》似乎完全不必封，况且你们进城时没有立即封闭，进城后20天才将其封闭，这容易给人造成共产党的政策是先宽后紧的印象，影响不好。”

在一一握手道别之后，几位代表依依不舍地登上返回的飞机。

四

3月5日，受桂系影响的南京《救国日报》发表了题为《蒋公不出国则救国无望》的社论，像是在舆论界甩了一颗重磅炸弹，引起一片喧哗。卫戍司令张耀明当即派军警把该报主笔龚德柏逮了起来。龚在李宗仁与孙科竞选副总统时，曾冒险刊出一篇揭露孙科养“小妾”蓝妮的消息，为李宗仁助阵，立有汗马功劳。况且，这次逼蒋出国，也是李宗仁策动、并亲自透露给龚德柏的。因此，李宗仁得知龚被捕，也顾不得许多，两次打电话要张耀明放人。但有CC系、黄埔系齐声鼓噪，张硬是顶着不办。气得李宗仁在总统的办公室里直转圈子。还在

2月中旬，蒋介石一个电话撤了主和的浙江省省主席陈仪时，李宗仁就有点儿后脊生风的感觉了，不得不下决心把他原来的警卫团调进南京来保驾。白这时恰在南京，他也毫无办法，只是威胁着要调四十六军来南京。程潜也跑到李宗仁的家里，咬牙切齿地主张逼蒋出国，明确表示和战都支持桂系。

劝蒋出国，最初其实还是蒋身边的吴忠信提议的，李宗仁自然赞成，但没有人敢去当这个冤大头。张治中2月下旬从兰州回京后，自告奋勇地愿意去做说客。《救国日报》社论发表之前，张治中和吴忠信刚刚离开南京前往蒋介石的老家浙江奉化的溪口。几天时间张没有电话打来，急得李宗仁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一个劲儿地担心张治中被蒋介石扣起来了。而7日午后张治中打电话来，说何应钦即由奉化返京，蒋已同意由何应钦组阁。这一来，李宗仁又兴奋得不得了。直到程思远问他，才知道，是张临走前曾约好，如果劝蒋出国有戏，就打电话出来。而搞倒孙科，改换何应钦，也是李宗仁的提议。因为何与白曾长期共事，关系还不错，历史上何也曾与李、白联过手，长期指挥军事的何，这时在战与和的问题也更倾向于和。眼下除了蒋之外，也只有何才能镇得住那成千上万的黄埔生。如果何应钦与李、白联手，蒋介石又听劝出洋，他李宗仁的整盘棋就活了。难怪李宗仁转眼间又飘飘然了。8日孙科内阁总辞职。12日，李宗仁公开宣布任命何应钦为行政院长，重组内阁。

中共中央对李宗仁这时的组阁行动十分注意，尽管邵力子在北平时曾再三替何应钦开脱战争责任，说何其实是主和派，但中共中央仍旧把何看成是蒋系的顶梁柱。因此，在得知李宗仁准备让何出面



南京和谈代表团飞抵北平

组阁的消息后，叶剑英当即打电话给仍住在六国饭店的黄启汉，要他立即打电报给李宗仁，要李务必选最能够顺利进行和谈者担当行政院长之职，以免引起各方误会。但李宗仁显然有自己的主意。

3月13日，即李宗仁正式宣布任命何应钦组阁的第二天，他把刘仲华和刘仲容都找了来，要刘仲容转告毛泽东先生，说他是诚意和平的，希望中共相信他。据他说，蒋现在已经完了，无论军队、政治、经济、党，都崩溃了，大势已去，就是特务也不足虑了。这次拉上何应钦就是证明。何是主和派，用何可以控制军队，并便利今后的军队改编与裁减。他希望中共给他一段时间，用政治方法来解决，不要在和谈时或和谈前渡过江来，那样他只好一走了之。他甚至半威胁半诉苦地说：“我很害怕把一个好好的局面搞乱了。现在和平民主力量已经有了战胜封建死硬势力的基础，只要不打仗，和平前途绝对可以乐观。相反，如果解放军渡江，那么不要说蒋介石会重新出来，白崇

禧也会打的，美国、日本都会放手支持蒋，那样的局面是我所不愿看见的。”不管二刘怎样向李宗仁解释，对中共无论如何不能以不渡江来作为条件，解放军渡江只会对宁沪一带的蒋系军队形成威慑，而不会威胁和平，李宗仁始终不改变态度。即使在中共中央得知此一情况后，专门去电上海转告李宗仁“不要惧怕我军渡江”，李也还是不做答复，而且要黄启汉转电中共中央称：正当和平初现，和谈将开之时，中共部队连日向麻城、罗田、英山、望江、安庆、无为、巢县、泰州之线大举推进，迫近江边，致使此间人心惶惶，影响和谈进行甚大，务请从事考虑制止，并酌予后撤。为免生枝节。中共中央这时还真的一度下令前线部队暂停向计划中的花园及其以南之孝感、黄陂、黄安、阳罗、黄冈、麻城、浠水等地前进。

中共中央这时已决定要联合李、白，不惜迁就李宗仁的上述要求，但对李宗仁、白崇禧的表现也有疑惑，特别是因为李宗仁身处南京，未必能有多大的作为，而白崇

禧控制着大批军队，中共中央对争取白更加重视，急欲建立直接电台联系，因此特别要求调长期在白身边工作的刘仲容到北平来。还在3月5日，当白崇禧找刘仲容商量，要刘取道武汉进入解放区时，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就明确指示刘化名王志廉从武汉经驻马店向解放军前线部队接洽进去。中共中央迅速批准了一计划，并要求刘行前应向李、白问清楚他们对颜惠庆、章士钊等人带回去的协议的具体答复，并带来电台呼号波长密码等，以便联络。之后，中共中央接连数电中原局，要求他们立即和驻马店前线部队说明情况，迅速派人接引刘仲容，并护送至郑州，乘火车赶往济南，再转送石家庄。毛泽东并亲自批示：“勿误至要”。

3月16日，刘仲容从南京飞往武汉，由白崇禧用装甲车送至信阳，再由张轸派兵于20日送到驻马店。之后，中共中原局社会部高洵东、卢声涛二人接引刘至郑州，再坐火车于27日送至济南。因中共中央这时已经由西柏坡搬入北平，周恩来28日专门致电社会部负责人康生，要他“派要人在济南接待，并乘汽车附警卫员护送至德州转乘火车经天津赶来北平。”29日，济南市公安局副局长凌云受命带警卫人员专程送刘仲容转赴北平。30日下午，刘仲容终于被送到北平，并被立即由齐燕铭接送至中南海中央统战部李维汉处住下。

刘刚刚被安排住下还不到一小时，毛泽东就派人用车把他接到西山双清别墅自己的住处去谈话。可见毛泽东希望了解白崇禧情况的心情是如何急迫。两人一直谈到晚上，毛泽东对他所介绍的情况看来还比较满意。尽管毛泽东早就知道李、白已了解了刘仲容和刘仲华和秘密身份，他们对二刘所谈的一

些情况未必完全出于真心，但在得知李宗仁等基本赞同颜惠庆等人带回去的八条协议之后，毛泽东还是得出结论：李、白有联合反蒋的诚意。因此，他当晚就打电报给华中前线高级指挥官，称：与白崇禧之间的电讯联系即将建立，“我们决定联合李白反对蒋党，李白对此计划已有初步认识”，望前线各部准备与白崇禧在军事上进行配合。

五

为了与中共进行和谈，整个3月间南京方面都在积极准备方案。得到蒋介石批准的作为最后退让尺度的谈判腹案，第一条就明确要求“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第四条则要求“军队应分期分批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第八条更要求在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中国共双方名额相等。

4月1日，天阴沉沉的，渐渐沥沥地飘着一丝丝细小的雨滴，连续几天江南都是这种阴雨天气，但是今天的南京机场上却是人声鼎沸，官盖如云，热闹非凡。原来，今天是南京和谈代表团离京前往北平与中共和谈的日子，包括李宗仁在内的大批政府官员都整整齐齐地列队送行，再加上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代表团的家属和众多新闻记者，就连飞机发动时的轰鸣声也被人群中发出的一阵又一阵兴奋的叫喊声给淹没了。直到飞机飞离南京上空很远之后，代表团的成员们仍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南京和谈代表团可谓阵容庞大，浩浩荡荡。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是在国民党内地位显赫的国民党中央常委、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张治中。以下分别是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

蒸、刘斐。代表团另有顾问四人，即刘仲华、屈武、李俊龙、金山。代表团的秘书长为卢郁文，另有秘书10人、译电员2人及随员5人。仅张治中一个人带了一个秘书（谢超），2个速记（余湛邦、袁永竹），两个缮写（周光宇、任宝华）和一个随员（张立钧），另加2个译电员，总共8个人。张治中解释说，他带这些人是因为他还要在北平同时指挥西北的军队。

飞机临北平时，已是下午3时许。当机翼下的北平城区透过一道道阳光渐渐清晰可见时，坐在靠近驾驶舱门口的黄绍竑大声要求驾驶员在市区上空盘旋两圈，以示礼貌。“党的方面周恩来一定会来，政府方面估计会派叶剑英来接。”他高声预测着，“希望不要有南京那么多的记者，我真是烦死这些家伙了。”刘斐边说着边把领子上的风纪扣扣好。

飞机下午3时45分降落在北平南苑机场的停机坪上。当轰隆隆的马达声渐渐消停下来之后，人们透过舷窗，惊奇地发现尘土飞扬的机场上似乎一个人没有。直到打开机舱门，代表们扶着梯子鱼贯而出，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整个机场上冷冷清清，平地卷起的阵阵黄沙中只站着两位身着军便服的中年人，再远处就是几辆吉普和大轿车旁边正在聊天的十几名士兵了。“这简直是莫名其妙！”刘斐第一个睁圆了双眼气呼呼地压低了嗓门儿吼着。黄绍竑也半晌儿转不过弯儿来。走在前面的邵力子则显得很老道。他三步并作两步地向迎上来的北平副市长徐冰先生走去。然后转过脸来又把张治中介绍给徐冰和徐冰身后的另一位先生。

北平机场和南京机场的强烈反差，给了代表团成员强烈的刺激。在前往六国饭店的路上，代表

们一反在机舱里那股兴奋劲儿，一个个像霜打了似的直犯蔫儿。直到住进饭店，看到房间里的报纸时，有些人才又活跃了起来。不过，这回不是兴奋，而是愤怒。刘斐手里挥动着 he 刚刚看到的一张报纸，冲到张治中的客厅里，炸雷般地吼着：“这简直是侮辱！”李蒸这时也拍着手里的报纸，大声问道：“这里满篇都骂我们是匪，那找我们来谈什么？这也未免欺人太甚了！”

黄绍竑也拿着一份《进步日报》来到张治中的房间，递到坐在沙发上闷不作声地喝茶的张治中面前，说：“你看看，点名骂你是蒋系的走狗。这件事应有所表示，我们既然来了，可以不客气地提出来。”李蒸也说：“此事应提出抗议。”但在一旁背着手踱步的邵力子却慢条斯理地说着风凉话：“共产党骂政府是老早就骂了，正因为骂，所以我们才来。如果受不了，就不必来了。既来了，受得了得受，受不了也得受。况且《进步日报》是大公报的前身，我们如果提出来，他们会说是新闻自由。我看没必要小题大作。”张治中一边读着那篇署名的评论文章，一边做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问道：“这个杨刚是不是共产党？”邵力子答复说：“这个人不是共产党，只是他过去在上海没少受国民党特务的迫害，与国民党恐怕有血海深仇吧！”黄绍竑问张治中：“我们好心好意来，他们一上来就给我们一个下马威，这不有些过分了吗？”“见到周恩来时，有机会可以顺便提一提。”张治中头也不抬地回答道。

卢郁文这时蹑手蹑脚地跑进来，神秘兮兮地小声说：“中共要人来了。”张治中迅速站起来，走到房外。果然，周恩来、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叶剑英等七、八位中共领导人已经笑容满面地出现在走廊

里。“久违了。”周恩来一面热情地握住张治中的手，一面用眼神向张治中身后的国民党代表们致意。

寒暄之后，周恩来带头领着张治中等一齐走进了饭店的宴会厅。他们一进大厅，等候在那里的中共方面的人同时纷纷鼓起掌来。代表团的情绪又重新高涨起来。丰富的晚宴和热情的招待，使代表们又开始恢复了来时的某种心情。代表们开始相信，共产党一切都是重新建设，工作很忙，这样招待他们已经很不错了。因此代表团决定：招待和商谈等等，均随中共的便，不做特殊要求。新闻宣传的事，也暂时避开不提。但是，晚宴后周恩来找张治中谈话，严厉质问张治中为什么临行前专诚去溪口向蒋介石请示报告，这个代表团是代表南京，还是代表溪口？林伯渠约章士钊谈话，坚持在战犯问题上决不让步，也说明中共立场难以松动。因此，代表们刚刚兴奋起来的神经顿时又倍感压抑。张治中忿忿不平地说：“他们也未免太势利了，过去我三次去延安，毛泽东都亲自来接，后来我们驱逐他们，我还不是一样亲自送董必武到机场？如今我们打了败仗，就接也不接了。晚上周恩来甚至提也不提一句，我真气不过。照这个样子，恐怕就是我们再努力，也难成功。”章士钊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其实就是一个面子问题。此次六个代表，除本人之外，均属国民党。如果一定要抓蒋介石，等于让儿子签字抓老子，你们怎么签字？”

2日开始，双方代表进行个别交换意见。双方争执的焦点明显地集中在战犯问题上。多数代表认为，我们是第二号战犯派来的，第二号战犯怎么能办第一号战犯呢？这件事根本办不通。纵然签了字，不仅南京不会同意，而且我们根本

就回不了南京了。可是，中共代表在战犯问题上毫不松口，只是同意谈判期间军队暂不过江。

在接连两天个别谈话摸底之后，中共中央对于南京代表团内部情况和要求已经十分了解。鉴于代表团中相当一部分人都与蒋系有关，因此他们对代表团谈判求得根本和平解决不抱太多幻想。中共方面这时的策略是尽量分化争取代表团中的动摇者，而对坚持与共产党为敌者置之不理，使其无所作为。同时，在北平的报纸上接连刊登《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什么人应负战争的责任？》等文章，激烈地批评南京政府及其张治中等人，不断施加政治压力。同时，眼看长江快到涨水期，毛泽东更多的在暗中拉拢白崇禧，力图促使白崇禧能够在解放军渡江问题上保持中立甚至给予配合。

4、5两日，白崇禧接连给刘仲容来电，要求解放军在安徽停止进攻安庆，在河南停止向花园推进。毛泽东当即复电，表示整个华中问题的处置，可以由双方代表谈判解决，黄冈、黄陂、花园、孝感、汉川、黄陵矶一线及其以南地区，解放军将暂不进攻，只须将该线以东地区及安庆以西地区部队撤退即可。毛泽东并具体说明了白崇禧前线部队与解放军前线司令部取得联系的方法。

对于毛泽东的提议，白崇禧9日复电表示基本赞同，称已通知前线将领，但又解释说：要他从安庆撤退军队，还有些困难。因该地属京沪区指挥，他不便擅令守军撤退。对此，毛泽东表示充分理解，一面复电白崇禧，告诉他同意在安庆保持现状，一面指示前线部队停止对安庆的攻击。

同样，对于这时李宗仁通过电话提出的请解放军不要占领镇江、

芜湖，以免南京因可能受到炮击而动荡的要求，也迅速给予满足。

这充分表明了中共方面急于与李白合作的迫切心情。

六

李宗仁这时“和共”的急迫心情，也足以与中共相比。解放军已经兵临城下，如果他和不下来，南京政府必将南撤，蒋介石多半还得上台，到那时，再没有他李宗仁的位置。因此，代表团临行前，李宗仁曾专门把黄绍竑找去谈了两三个小时，求和之心表露得情真意切。他信誓旦旦地表示：“如中共条件真难接受，和谈破裂，我便下野；如中共条件并不太苛，尺度适当的放宽，大家仍不同意签字，因而和谈破裂，我亦下野；另外，不管中共条件如何，只要你们同意签字，即令溪口方面反对，我都可以完全负责。”可见，李宗仁这时非常明白他自己的处境。

但是，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却无论如何不敢擅自主张接受中共的条件。代表们苦撑数天，

天天与中共代表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进行商谈，说来说去都是一个意思，就是“和约不要像个投降文件，得使我们面子上还过得去”。

在经过几天时间的个别交换意见，和通过报纸政治攻势之后，中共中央注意到，代表团内部经常意见相左，这边吵的不可开交，那边却仰头大睡；这个轻描淡写地说什么：“既来之，则安之”，那个忿然大叫：“如果明天有飞机，王八蛋不回去。”争来争去，其实只是两个问题，即同不同意惩办战犯和解放军渡江。4月5日，在中共中央的提议下，各民主党派派出朱蕴山、李民欣为代表，在刘仲容陪同下前往南京，邀请李宗仁亲自来北平进行和谈。面对这种情况，代表团深感困惑，斗志顿挫，态度迅速软化了。他们于次日作出决定：第一，战犯应受惩处，只要不正式提名，并且凡赞成和平条款及对人民作有益贡献者，均可酌情减免处罚。第二，同意解放军渡江，但应给南京政府必要的准备时间，不过也不必拖至联合政府之后。7日，代表团果然又收到何应钦来电，要各位代

表本着悲天悯人的态度，荣辱在所不计，务必达成和平。看上去，南京政府方面也已放下架子，准备签城下之盟了。这一下，那些曾经强硬的代表都像泄了气的皮球，蔫了，而那些极力主张接受中共意见的成员，则如释负重，脸上神采飞扬。

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开始采取决定性步骤。8日上午，张治中被接往香山双清别墅。刚下汽车，周恩来就亲自迎出门外，微笑着伸出手来与张治中的手握在一起，同时说：“今天毛主席想和你谈谈。请。”“毛先生？”张治中惊讶地张大了嘴，然后不禁高兴地笑了起来。

两个人一前一后走进院子，只见毛泽东已经走到院子里来迎接张治中。张治中与毛泽东相互问候着，然后一同走进屋里谈话。这次谈话共进行了4个小时。当天晚上，张治中召集代表团开会，刚说明他要报告的题目，底下的代表们就立即打断他的话，问：“你先讲：‘好，还是不好？’”张微笑着答复说：“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屋子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十分热烈。张详细讲述了他与毛泽东谈话的经过。他声称，毛、周的意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战犯问题，可以不在和平协定条款中提名，可以不在和平协定条款中提名，可以不提蒋介石三个字，对南京代表团的处境，困难表示理解，并同意将此问题拖到最后办。（二）改编军队问题，所有国民党军队的数额、番号、官长均可照旧不动，驻地问题可以研究。（三）渡江问题，是否签字后马上渡江，也可以商量。（四）南京政府和谈至新政协开会，即到联合政府成立前这一段时间内，都要继续负责，不要散了。（五）和谈方案正在草拟，拿出方案正式谈判时，两小时内便可解决问题。将



周恩来在和谈会上发言

来签字时，如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张群等都来参加最好。他最后兴奋地讲：“你们知道吗？整个谈话过程中，毛先生态度闲畅，对蒋亦称蒋先生，只有一次称蒋介石。可以肯定，按毛主席精神，和谈是可以成功的，因为今天双方谈判距离不大，甚至于没有距离。争执的焦点为战犯问题，但我们对战犯问题原则上是承认的，所争者仅是时间问题、技术问题，主张不必在此次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名单，以减少我们的困难。可把战犯名单拖后到新政协，更为有利。惩治战犯将来由中共领导的新联合政府去办，到时要办谁就办谁”。

正在这时，何应钦突然从广州打来电报，声称国民党常委会通过决议，要求代表团要求中共切实维护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停止一切施行暴力的政策；坚持双方军队应在平等条件下各就防区自行整编，整军方案必须双方同时实行。

何应钦的电报在代表团内部引起一片哗然。谁都知道这是蒋介石在背后指使。张治中愤然道：“事情已进展到现在的阶段，这话如何说法，真是莫名其妙！什么自由、恐怖，这些话，我们还有脸去同人家说吗？上海现在成了恐怖世界，他妈的皮，真不知耻！”刘斐也忿忿然：“我最痛恨蒋介石的军队。我几次去故宫，遇到中共军队，四五次从队中穿过，战士们总是很和气，并无不悦之色。如果碰到我们中央军，早已张牙舞爪，甚至拳打脚踢了。即使不打，骂也将你骂死。”

气愤之下，张治中直截了当地致信蒋介石，痛斥国民党“今日之失败，乃由钧座领导错误所招致”，劝蒋“将党政军大权，尤其军事上之全权，交予李、何两同志”。而黄绍竑也密电李宗仁，要求他务必使蒋介石离开溪口出洋。

4月9日—1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先后接见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卢郁文等。众代表谈话后均甚表满意，刘斐、黄绍竑等对毛泽东更是赞不绝口，交口称赞毛“极懂得谈话的艺术，轻松而又深入”，“他教训了人，但不使人感觉有教训人的味道。他与蒋先生之官腔，大不相同”，“蒋的领袖是自封的，而毛的领袖是人人衷心拥护的”。一时间，代表团内气氛大变，几乎人人称赞共产党有办法，并且感到和谈大有成功的希望。代表团相信，他们与中共已经在下述几点上达成了妥协，即（一）战犯名单可以不提；（二）军队整编数额可由南京政府自定；（三）解放军可暂不过江；（四）南京政府仍可过渡，等待政协召开，联合政府成立；（五）联合政府可以组织一个七人军事委员会，中共四人，国民党三人。12日，代表团电告李宗仁：目前只等中共方案提出，一旦中共提出方案，代表团讨论后，即派黄绍竑、屈武飞回南京，如南京同意，即与李宗仁等一同飞返北平签字。如不同意，亦请于右任等来平，以便讨价还价。

12日，何应钦来电转达南京政府和谈指导委员会作出的五项决议。除表示战争责任问题可依据代表团所谈原则处理外，明确要求对解放军“渡江问题应严加拒绝”，即使签约，双方军队也应各驻原防。

代表团很清楚，解放军渡江不可避免，故对南京试图划江而治的企图深感绝望。李蒸悲观地说：“我们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彻底靠近中共，与主战派开火；另一条是因此而宣告破裂。”邵力子当场劝告说：“事到今天和谈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们只有尽力争取中共缓渡江，因为缓渡江确对全面和平运动

之推进有利。”章士钊也表示：“过去德邻没有力量，因高唱和平而增加了力量，因此之故，如缓渡江，假李德邻以时日，使其政治力量继续增加而扩大，对李德邻、对中共、对人民均有利。”但李俊龙却以为：“三两个月恐怕不能增加南京力量，相反地怕只好加强溪口力量，为人民计，恐怕还是中共马上渡江的好。”

尽管意见不一，张治中最后还是请章士钊出面设法向毛泽东通融，要求中共考虑在和平条约签定后能够暂缓渡江。

七

12日，刘仲容回到北平，说明李宗仁求和的态度不变，但拒绝中共渡江的态度日趋明显，何应钦的电报实际上也正是李宗仁同意的。李的目的，颇有点儿想划江而治。按照李宗仁对他所说的来看，所谓执行中共的八项和平条款，都得由他们自己动手解决。同样，白崇禧到南京后，虽仍反蒋，但也不主张与中共局部和平，更反对投降式的解决办法。

得知李、白态度如此暧昧，长江涨水期已到，毛泽东决定不再与代表团继续周旋。周恩来立即拿出已经拟好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于12日晚交给南京代表团。由于这一草案措辞严厉，并历数国民党发动全面战争的罪行，因此代表团中多数一时颇难接受。

在反复商量和交换意见之后，代表团仍旧决定接受这个文件。14日晚，张治中向中央正式提交了一个书面修改意见，要求取消原草案中的各种刺激性字眼儿。

在第二天的代表团会议上，刘斐眼睛瞅着天花板，风言风语地发着感慨：“过去我们是南京政府的

代表团，与中共交涉，今后我们是中共的代表团了，要去说服南京了。”倒是代表中唯一不是国民党员的章士钊看得开些，他笑着说：“过去中共新华社发出八条的电报，内有十六个伪字，南京都答应了，今天一个伪字也没有，如果南京反不答应，那就是有精神病。”

张治中经过几天长吁短叹之后，至此终于意识到国民党大势已去。他心情沉重地表示：“连日来之所以争论不休，实在因为两种东西在束缚我们自己：第一，我们是代表，一切须听命于政府，我们个人的意见，受政府权力的束缚；第二，我们是国民党，国民党不行，集一切坏事之大成，但可惜我们未脱党，今日的政府又是国民党的政府，因此我们的意见又受国民党的束缚。在此双重的束缚下，自然甚为矛盾与苦闷。”邵力子颇不以为然，说：“今日已是所谓宪政时期，我们是代表政府，代表人民，不是代表国民党。况且清党以来，国民党越弄越不像样，连‘民族’主义都不许讲，而要讲‘宗族’主义了，将总理遗训抛得一干二净。今日之下，要我代表国民党，这点我不能承认。”

15日晚，周恩来将最后修订的协定文本交给张治中，并声明，如果到4月20日为止还不能获得协议签字，我们就只能渡江了。张治中这时也全然想开了。他坦率地宣称：“现在对于这个《国内和平协定》，如果还想字斟句酌地去辩论，等于白费，是不必要的；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大些，胸襟开阔些，重新合作，这才是国家民族之福！”于是16日晨，黄绍竑、屈武根据代表团的决定，乘飞机返回南京说明一切。

当晚，黄绍竑、屈武向李宗仁当面报告了全部谈判情况和代表

集体的意见。虽然李宗仁当初曾保证不管中共条件如何，代表团同意他就敢负责，这时却全然缩了回去。白崇禧看到黄绍竑带回来的协定内容后，也气呼呼地表示反对。结果，李宗仁不顾周恩来的劝告，把牌摊给了何应钦，以此来使自己脱身。他随后告诉黄绍竑：以后不要再提接受中共协定的问题了，这是不可能的。

19日，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南京中央社的广播公开宣布，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8日已经发表声明，明白告诫任何人主和都不得超越元月一日蒋介石发布的文告及国民党中常委4月初的有关决定。至此，黄绍竑自知安全难保，决定远避香港。20日，他专门打电话告诉代表团，他已被迫辞去代表职务，南京方面绝不会批准和平协定，和平谈判事实上已完全破裂。

4月20日，李宗仁、何应钦联名致电南京和谈代表团，明确拒绝了中共的协定，称“其基本精神所在，不啻为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之处置”。希望中共方面能够“确认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之原则，对此项协定之基本精神与内容，重新予以考虑”。而为了说明他之不得已，李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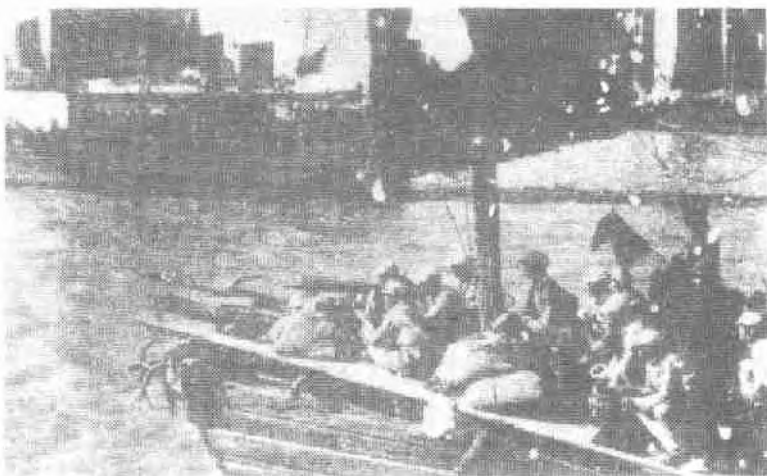
仁随后又单独致电章士钊等，解释说：昨日立法院开秘密会议，何应钦宣读协定全文后，即使彻底主张和平之立委，亦噤若寒蝉，不敢有所主张。他自己即使同意也无济于事。

国共和谈至此宣告正式破裂。但李宗仁既也没有像他当初所反复声明的那样，自动下野；白崇禧也没有像他屡次向中共表示的那样，联共反蒋。说来说去，李、白的“和共”反蒋，归根到底还是想向蒋夺权罢了。

21日，解放军大举渡江，国民党寿终正寝，张治中等人决定留在北平不走了。此时的李、白，却一面指挥桂系军队节节抵抗，一面联络张发奎、阎锡山、居正进一步向蒋夺权，企图彻底破灭蒋再起之幻想。只可惜，李、白自视过高，他们既不是解放军的对手，也不是蒋介石的对手。到头来，一个被逼亡命海外；一个被夺兵削权，饮恨而终。

（杨奎松：42岁，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主要著作有：《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等。）

（责任编辑：刘家驹）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挥师横渡长江



不仅仅是血证

——再现《南京大屠杀》记

云阳

江苏镇江市，解放前曾是江苏省国民政府所在地。日军侵华战争中，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镇江是序幕，它比南京沦陷早四天，日军在这里共屠杀民众4525人，烧毁房屋30151间。这次历史巨片《南京大屠杀》摄制组，在这里拍摄了“国际安全区难民营”一系列镜头，笔者将现场纷纷花絮撷取几片以告读者：

《南京大屠杀》在镇江景区开拍牵动着古城的万人心。全市各有关方面为摄制组大开绿灯：市农业

银行安排住宿，欧罗芭酒店供应伙食，市影剧服装厂赶制影服，市公安部门组织警力，市文化部门组织群众演员……

摄制组选定五十三坡的镇江博物馆作为“国际安全区难民营”景点，该馆清末为英国领事馆，西洋式的建筑物保存完好，为了场景需要，市博物馆拆除了宣传橱窗，门口搭建成一道栏杆，作为“国际安全区难民营”的界线。

下午三点，镇江小码头西津渡街的一居民家中，吴子牛导演坐在

电视监视器前，发出了一声大喝：“来！”

随即，右街的坡台上出现了川流不息的逃难人流，推着板车的小贩、挑着箩筐的贫民、衣衫褴褛的流浪汉、长衫革履的富商、白发苍苍的老者、学生模样的男女，纷纷仓皇奔命。一群十一、二岁的孩子，在女教师刘书琴的带领下，也匆匆地涌入镜头。孩子们一边快步小跑，一边不时地回头，焦急地大叫：“刘老师，快一点！刘老师，快一点！”

“刘老师”由台湾著名演员刘若英扮演。她背着一个有腿疾的学生，急速地登上坡台，穿过了街面，拐进了小巷……

吴子牛从屋里钻了出来，一脸冷峻地喊道：“停！”

这就是《南京大屠杀》镇江景区第一镜。

参加第一镜拍摄的群众演员中，不少老人都是那场战争的幸存者，他们都亲身经历过逃难岁月。尽管雪下得很大，但1000多名群众演员仍秩序井然，当笔者们问他们有何感想时，他们说，能参加拍片，既高兴又悲凉，我们要让全世界人民记住这段悲惨的历史。



导演吴子牛

南京大屠杀已过去这么多年，纪录片、照片、文件资料早已披露得淋漓尽致。因此，这部片子的基调将着重放在对历史的反思、对生命的尊重以及对爱的赞颂上。希特勒屠杀犹太人谁都知道，而南京大屠杀许多西方人却茫然无知。我拍出这部片子，是让世界人民都能知道那段历史的真实面目。

在“国际安全区难民营”拍摄现场，台湾“影帝”秦汉的出现让人大吃一惊，他剃着半个光头，蓄着一脸胡须，戴着一副眼镜。笔者问及为何要参加这部电影的拍摄，



台湾影星秦汉

秦汉略带激动地说：“我在几年前来大陆拍片时，看到了一本反映南京大屠杀的书，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内容、很重要、很感人的作品，南京大屠杀是个很悲惨的事件，死去的都是自己的同胞，不应该让这一事件无声无息地过去，要将这一段历史公布于众，拍成电影。大家都知道，我父亲孙元良也是抗日将领，参加过守卫南京，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有义务将这个事件告诉大家。”

记者好奇地问：“听说这次拍片是你主动自荐的？”

秦汉笑了：“以往拍片的确是导演先找我。这次大陆拍这部影片，我知道后就通过台湾龙祥公司



台湾影星刘若英

与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接触，表示参加拍片的愿望，正好导演也找我，不过我更主动一点。”

秦汉从影以来大多数拍的是爱情文艺片，记者谈到他在《南京大屠杀》中的角色时，秦汉笑了片刻，沉思道：“这次戏中扮演的角色是我从影以来的第一次，不过我希望今后多拍一些这样重大的、有意义的影片。”

秦汉与大家相处很好，他与妻子拍摄的是经过国际安全区门口时的一些场景。

记者又问他：“你认为最满意的搭档是谁？”秦汉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刘雪华！”记者又追问道：“今后和林青霞是否有再度合作的可能？”秦汉坦率作答：“不会的，不会的。”



日本影星早乙女爱

裹着花头巾、穿着黄大衣的日本影星早乙女爱，出道艺圈已20多年，演了大量的爱情文艺片，“早乙女爱”是她成名作里的一个人物，她的本名现在已很少有人知晓了。《南京大屠杀》原定的女主角是日本颇具票房号召力的秋吉久美子，但她不巧在美国出了车祸，膝盖骨折断成三截。

早乙女爱这次演出的是一名叫理慧子的日本寡妇，在片中她与



拍摄现场

“秦汉”组成了家庭，是和秦汉演对手戏的第一女主角。

当记者问她作为一名日本演员，演这样一部戏有何感想时，早乙女爱坦言：“我很喜欢理慧子这个角色，我一定会尽一个演员的职

责，把电影拍好，我现在的最大问题是语言上的障碍，今后我一定努力学好汉语。”

15日晚，镜头中出现了令人窒息的场面：日军士兵蜂拥而上冲进“国际安全区”抢夺“花姑娘”，

国际友人、安委会负责人雷伯等奋力阻挡，立即遭到日军野蛮殴打，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都被打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

16日凌晨5时许，数十名“日军”冲进“安全区”的芦席棚中，抢走了十多个“花姑娘”，几名“安委会”的国际友人为护卫“难民”被“日军”打得晕倒在地，一位专业演员扮演的青年妇女，被两名“日军士兵”扒光衣服，赤裸裸地绑架；7时许，“日军”又冲向小巷内10多户居民家中，10多名妇女在与“日军”搏斗后终因寡不敌众，又被“日军”强行抓走……经过十多次反复拍摄，这一镜共历时了15个小时。至此，镇江景区终场戏降下帷幕。摄制组又奔赴南京下关赶拍……

（现场摄影 吴丹青）

（责任编辑：刘 文）

马屁术高手徐达

● 竟陵子

如今南京莫愁湖边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历史建筑，人称“胜棋楼”，相传曾经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与他的凤阳老乡、得意权臣徐达经常对奕的所在。朱元璋是一流高手，徐达更是九段名人。当然，每盘总是天子围追截堵封杀大胜，臣子负隅顽抗兵败告终。朱元璋深知是徐达的马屁术。这天，龙颜和悦，对徐达说：“咱老乡今天撇开君臣之礼，来个一搏为快，真正决个高下。咱要输了，这栋楼就归你得；你要输了，你的魏国公的乌纱帽给咱交出来！”徐达遵命，他俩

都动了真格，从早起下到黄昏，挑灯夜战，直到第二天晨钟报晓，徐达才以一目拱手投降。朱元璋顿时掀须大笑：“老徐呀，你这下完球了！”徐达却将棋盘一转，不动声色地手一挥，说：“万岁，请看嘛！”朱元璋冷下神一瞅棋盘，双目瞪得犹如龙眼了，原来，执黑的徐达，竟将自己的子儿摆成了“万岁”两个字。朱元璋赫然良久，喃喃地说：“奶奶地，算你赢了！”

这一场君臣豪赌，徐达赢了一座花园小别墅。还赢了君主的一颗欢心。

台湾塑胶大王

王永庆

●纪 流



有源之水，寒冽不冻；不德之人，厄穷不塞。

——〔宋〕胡宏

王永庆是台塑集团的创办人、董事长。这个集团拥有数十家连藤企业，员工四万余人。它的三大经济支柱是台湾塑胶公司（原料企业）、南亚塑胶公司（加工企业）和台湾化学纤维公司，年营业额约千余亿元，是台湾企业界的头三名。在世界 500 家大公司中，占第 153 位。主持台塑全盘工作的王永庆，是台湾最卓越的企业家，也是最具传奇色彩的神秘人物。他在经营管理上的最大特色，是充分发挥财力物力人力的高效益。他经营的产品，以物美价廉著称于世，在国际市场上有很强的竞争力。

福生于隐约，而祸生于得意。

——〔汉〕刘向

王永庆于 1917 年出生于台北，其祖籍是福建安溪，在道光年间定居台湾。王家世代种茶，永庆的父亲长庚先生只经营几片贫瘠的茶田，以卖茶叶糊口，春秋在茶园耕作，冬夏打零工补贴家用。永庆的母亲詹样操持家务，养猪种菜，劳碌一生，至 1987 年已达百岁高龄，仍能健步劳作。永庆特地为母亲在台塑大楼屋顶建一菜园，以种菜作为健身运动。

王永庆从童年就养成吃苦耐劳

的习惯，他 7 岁到新店镇国民小学就读，每天清早要提十几桶水才去上学，放学时常去打猪草背回家来。小学毕业后，他离乡背井来到粮食集散地嘉义，先在一家米店里当小工。米店经营的奥秘在一年苦工生活中全部摸知。他让父亲借来 200 元钱，在嘉义开了一间小米店。为了吸引顾客，他一改米店掺砂石的做法，筛簸砂石、米糠，改善米的质量和服务态度，日久天长，大家都来买他的米。进一步他送米上门，把米给放进缸里，包括腾清米缸，涮洗米缸，把新米放下层，陈米放上层，都干得很认真，像给自己家操劳一样。他用一个小本子记下各家米缸的容量和人口多少，大人小孩各多少，一月吃多少米，估计各家存米快要吃完时，主动送米到家。他还记下客户发薪日期，到时候去收米款。这些不辞劳苦的首创之举，受到客户的欢迎。起初，一天卖米不过一包，两年后一天可卖二十几包，营业额增长二十倍。而每包米仅赚 1 角 2 分钱，其经营之难可见一斑。

米店开业一年，王永庆稍有积蓄，就购置设备办碾米厂，他决心要超过隔壁日本人的碾米厂。论设备、经营经验，隔壁日本人的条件比他优越得多，王永庆靠以勤补拙，他每天早开工晚收工，比对方

多做活四个半小时。一身粉尘，只在屋外的水龙头下一冲。只二年光景，他的厂在 20 多家米厂中，收益列为第三，那个日本人的老厂名列第四。

勤劳节俭是同厄运贫困抗争的最好办法。莎士比亚就曾说过：“上帝把亚当贬落人间，所制定的第一条训戒就是‘你要用自己的血汗换面包’”。王永庆也认为：“先天环境的好坏，不足喜亦不足忧，成功的关键完全在于一己之努力。”

日本占领台湾时期，王永庆还养过鹅。那时粮食奇缺，一般养鹅户只能放鹅去吃野草，养到四个月才两斤重，瘦得皮包骨。他买下许多瘦鹅，用包心菜的菜帮子来喂养，两个月就长到七八斤重，非常肥壮。他从中得到深刻启示：其一，人在失意时，要像瘦鹅一样忍饥耐饿……一旦机会到来，就能像瘦鹅一样，足吃足喝，迅速肥壮起来。其二，瘦鹅之所以瘦，是饲养者的饲养方法不当。镜明可鉴；企业经营不善，问题在经营者管理方法不当。

由于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缺乏粮食，粮米施行配给制，王永庆的米店只好停业。他转行经营制砖和木材。砖厂几经挫折停业，木材业却在跌宕中维持了下来。日本投降后，台湾重回祖国怀抱。当时，百

业待兴，建筑业蓬勃发展，王永庆经营的木材业也得到发展，到1946年，王永庆已积累资本5000万元（台币），为新的起飞打下了基础。厄穷而不悯，遗佚而不怨。这是王永庆获得成功的第一秘诀。

但见时光流似箭，岂知天道曲如弓。
——〔唐〕韦庄

五十年代初，台湾当局想利用美援建立包括塑胶厂在内的十几家工厂。美方要求必须由民间企业来办。有关方面找到王永庆，王一口答应下来，他自酬资金50万美元，美方负担67万美元。

王永庆对塑胶的化学成分、生产加工等一无所知，只知道日本月产3000吨，自己初步生产100吨可保无虞。由于美方对经济效益的评估持有异议，长期搁置拨款，至1957年3月才建成投产。当时，面临着资金缺乏，技术落后，原料困难，市场既狭窄又封闭，月产量虽然仅有100吨聚氯乙烯，但九个月内，产品堆积如山，却卖不出一吨。王永庆叫苦不迭，他派人一了解，才知道社会上早已风传台塑投产，当局要采取保护政策，限制聚氯乙烯进口，有些厂家担心台塑产品质量不好，于是抢先大量进口原料，致使台塑产品滞销。

面临进退维谷的境地，王永庆以过人的胆识，果断作出两项决定：一、筹组加工企业（南亚塑胶公司），为台塑的聚氯乙烯寻找出路；二、扩大厂房设备，借大量生产降低成本，打开外销渠道。

1958年扩厂后，月产量上升到300吨，成本略降，1960年，台塑月产能力达到1200吨，业务开始蒸蒸日上，彻底摆脱了困境。

到1978年，王永庆的台塑集团企业，营业额突破十亿美元大关。经过20多年锲而不舍的艰难奋斗，他的企业已具备同世界跨国

大企业竞争、抗衡的能力。

至八十年代，实力雄厚的王永庆，开始向美国投资，他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筹建一家世界最大的PVC塑胶厂，年产量氯乙烯和聚氯乙烯各为24万吨。他还先后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向卜内门公司买下一家氯乙烯厂。在特拉华州买下了一家PVC厂、八个PVC下游厂，接手后又加扩三个新厂，共11个下游厂。这些原来赔钱的工厂，到了王永庆手里，一经整顿，立刻扭亏为盈，成为新的“摇钱树”、“聚宝盆”，台塑集团各公司生产的PVC粉，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PVC制造厂商。南亚塑胶公司也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PVC塑胶加工厂。

王永庆又致力海运业，1981年组建化学船队，直接从美加向台湾运回塑胶原料，同时营运北美与中南美洲国家购买的石油气。人们认为他不懂航运，搞船队是一步错棋。他选派台塑内部得力人员现学现做，步步成功。由于有了自己的船队，运费大大降低，在国际市场上石油气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台塑的原料价格长期保持在低水平上，在日趋紧张的竞争中，王永庆一直立于常胜不败的地位。

1987年，是王永庆的企业大发展的一年，他投资新台币500亿元，兴建了20多个塑料配套工厂。

不安于小成，然后足以成大器；不诱于小利，然后可以立远功。

——〔明〕方孝孺

王永庆常说：“经营管理，成本分析，要追根究底分析到最后一点。我们台塑就靠这一点吃饭。我看美国人都没有这样做，我就晓得我们台塑有饭吃。”他常说俗人的头脑太简单，只会把复杂的事物分成“是和非”、“黑和白”，只会一分为二，而不会一分为三，他运用

《易经》的道理告诉他的亲近说，周文王演绎出六十四卦，就是六十四种可能，六十四种看法，加上爻变就是数千种可能、数千种看法，怎么能把现在的事物看作纯黑纯白呢！我们连古人都不如，还能搞什么经营呢！王永庆指出：“只要肯花心思把事情做好，自然就必须深入探讨事物的本源，这是做事的不二法门。在日本也好，在中国或其他各地也好，道理都是一样的。”

王永庆一贯追求高效益，说：“物美价廉是靠成本分析追求合理化生产取得的。成本分析的目的是为了降低成本。成本降低了，产品价格才能低廉；而降低成本不能损害质量，是以维护高质量高品质为前提的。”

船队成立伊始，王永庆派成本分析专家随船记录各项单元成本，核算出标准成本，据此进行运营，使运费降低60%，一年以20万吨货物计，可节省运费1200万美元。

王永庆贯彻自己的领导思想，主要体现在午餐汇报会上。午餐汇报是一种工作制度，大家边吃边谈，吃的是类似盒饭的便当饭菜，各部门负责人乘机汇报工作情况，讨论经营问题，考核各单位的主管。王永庆只要在台北，天天召集这种会议，每次都由他亲自主持。他并不随便打断别人的话，遇到可疑问题，马上记下来，待对方汇报完毕，以追根求底连珠炮般地提问，言辞犀利，觉察敏锐。如汇报人准备不足，随时都会被问倒。如果连续几次被问得张口结舌，就有被解职淘汰的危险。有些亲朋觉得他不顾情面，缺乏中国企业的人情味。王永庆驳斥说：“人情用在努力、有贡献的人身上，是一种热爱和鼓励；假如这个人不用功、不努力，没有贡献，你还用中国固有的人情味关怀体贴，那就成了错爱，

不但对他没好处，还要惯坏他。不如给他机会反省，淘汰他，使他找到教训，这样才有救。中国式的人情味在过去家族式的企业中表现得很强烈，不管能力如何，自己的亲戚总是最要紧。他们不讲理，只讲情，事实上，没有理怎会有情！”本着这种精神，王永庆建立了自己的企业骨干队伍。这支队伍，兵强马壮，奋发有为。他的成功第三秘诀是：用人靠理靠情，不可以情欺理，不怕立理失情，私情交谊不是用人的先决条件；才干、成就、贡献才是升赏的根据。

富人如果把金钱放在你手中，你不要对这点恩惠太看重；因为圣人曾经这样教诲：勤劳远比黄金可贵。

——〔波斯〕萨迪《蔷薇园》

1975年1月，美国圣约翰大学赠给他荣誉博士学位，他在赠授仪式上说：“我幼时无力进学，长大时必须做工谋生，也没有机会接受正式教育，像我这样一个身无专长的人，永远只有刻苦耐劳才能补其不足。”

他从不相信命运的摆布。他常以中国和日本相比，来说明有资源、先天条件好的国家，往往比较懒散，易耽于逸乐；那缺乏资源、条件差的国家，则能体会自身的环境限制，为求得生存和发展，拼命工作、发奋图强。他认为美国资源得天独厚，经济实力相当强大，但“人的劳动已经退化”，“只图安乐享受”。

王永庆崇尚节俭，他招待贵宾亲朋都在台塑招待所里就餐，饭菜可口，间或中餐西吃，不求量多，恰到好处。不像有些大亨在豪华饭店大排宴筵，一掷千金。他用的肥皂剩下一小片时，还要粘在整块肥皂上继续使用。他每天做健身毛巾操，一块毛巾使用了27年。西服不

合身了，不做新的，拆一下改一改，继续穿用。外出乘用飞机，只坐经济舱。

他在公司里倡导节约时间、经费、物料，接待来客只是一杯白开水；一个信封在内部转用30次。他教育部属：“虽是一分钱的东西也要拣起来加以利用，这不是小气，是一种精神，一种警觉，一种良好的习惯。”

近年来国际上流行一种说法，所谓“日本第一”，他不以为然。他说：“我绝不相信‘日本第一’，只要肯脚踏实地，充分发挥勤劳朴实的精神力量。我们中国人应该是第一的。现状是我们努力不够，只停留在开发阶段。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我们的智力不如人，而是我们追求合理化的认真程度不足，很多力量都在纷扰、紊乱中被抵消了。”

信誉与财富积累发生了矛盾，他会毫不犹豫地金钱投在信誉上。1974年台塑增资股收盘价只有202元。他依照约定的244元价码，每股退回42元，一共退了4000万元，开创股市空前纪录。1978年美、英三家银行向台塑提供1500万美元的低息贷款，按正常手续必须有台湾金融界的担保。但贷方认为王永庆已成国际市场“信用”的王牌象征，免去金融业担保，只要王永庆个人担保就行，开创了中国人以自家信用担保的先例。由于他的成功，美国石化大公司潭尼可副总裁惊呼：“台塑是个不可轻视的劲敌！”日本人在同他竞争中，也刮目相看，赠给了他“经营之神”的称号。

既会花钱又会赚钱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因为他享受两种快乐。

——〔英〕约翰生《随感》

在王永庆看来，财富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是个人与集体、社会协作的果实，成功的结晶，

应该用它回报社会。从这种观念出发，王永庆先后捐献巨资创办了明志工专、长庚纪念医院、明德基金会生活素质研究中心。

明志工业专科学校是工读学校，使许多家境贫寒的青年，学有专长。20年中，这个学校培养了大批人才，遍布台湾各大企业，这些人的才能、表现，都获各界好评。一批批学习精英，成为台塑的顶梁柱。

王永庆还创办长庚医院，以纪念因医治不周而去世的父亲。他捐资新台币20亿元，在1976年筹划建立。十多年来，长庚医院的发展，从台北到台南。分布在高雄、基隆、林口等地，都设门诊中心和医疗中心，共有病床5000多张，每天可接待七八千人治疗。

1980年8月，王永庆设立生活素质研究中心，运用民间的智力、财力，推动生活素质各项专题研究，用研究成果促进社会生活素质的提高。他常和人们谈论生活的目标和真谛，他说，追求物质生活的提高不是生活目的的全部，也不是人生的最终目标。人类还必须注意精神生活的提高，也就是注意生活素质的全面提高，应以生活素质的全面提高为最终目的。如果一味追求物质生活，其结果必然物欲横流，奢侈无度，甚至巧取豪夺，只求肥己不问众生。他认为：台湾已出现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大家的忧虑。

王永庆还做了一些公益事业，1986年，他捐赠7.8亿元，建造了一座可容纳15000名观众的体育馆。同年提出赞助移植器官的创举，宣布五年内捐出器官遗爱人间者，其家属可由王永庆所属机构获得10万元丧葬补助费用。此一义举，救活和救治不少危难病人。

（责任编辑：刘文）

丁玲与沈从文的恩恩怨怨

● 许正雄

友谊，人们常比喻为生命的泉水，它可以润泽心灵的瘠土，使重驮着悲苦命运的人们变得更为坚实。沈从文、丁玲、胡也频早期的文学活动中，就曾经汨汨流淌过这种友谊的清泉。作为文章知己，他们曾荡舟在北京香山静宜园，也曾上海望平街那摇摇欲坠的亭子间合编副刊，同吃辣椒、菠菜，同看最后的清样。当29岁的胡也频穿着沈从文的海勃绒袍子慷慨就义之后，丁玲和沈从文之间的友谊受到了一次严酷的考验。应该承认，由于丁玲、胡也频二十年代后期的逐渐左倾，沈从文愈来愈感到自己那“充满弱点性格的卑微庸俗”难于跟他们“走同一条路了”。但他们三人毕竟像兄弟姐妹般地相处过，彼此都不愿看到旧谊的丝缕断绝。因此，沈从文不仅两赴南京营救胡也频，而且后来又毅然陪伴成为新寡的丁玲从上海回湖南老家，将烈士的遗孤交外祖母抚养。当他们入洞庭、渡沅水、闯过六次盘查关的时候，他们的友谊也在腥风血雨中得到了净化与升华。

令人遗憾的是，丁玲和沈从文之间的友谊终于在半个世纪之后悲剧性地终结，其公开表现之一是丁玲《也频与革命》一文的发表。这篇刊登于《诗刊》1980年3月份的文章，将沈从文的《记丁玲》一书称为“一部编得很拙劣的‘小说’”，并斥责了沈从文“对革命的无知、无情”，乃至“对革命者的歪曲和嘲弄”。沈从文对丁玲这篇文章作出的反应，则是在编定十二卷本《沈从文文集》时，断然抽去了《记丁玲》《记丁玲续集》两书，并在致友人信中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至此，这两位文学大师的矛盾就完全暴露在热爱他们作品的读者面前。不过，作为局外人的读者仅仅感到他们友谊裂缝的不可弥合，而对这条裂缝的初现及其扩展过程却不知其详。

1986年3月4日，82岁的丁玲在经历了“魍魉世界”和“风雪人间”之后离开了人世。这位唯物主义者弥留之际写下的最后一行字却是：“你们大家高兴吧，我肯定能成佛。”直到神志不清时，她还清晰地一字一顿地对秘书说：“我早成佛了。”两年后的5月10

日，沈从文也走完了他86岁的人生旅程。他的遗言是：死后不举行仪式，不要宣传，不发消息，不开追悼会。这一连四个“不”字，清楚表明他对人世的褒贬、荣辱视若浮云。这种超然物外的气度，也近乎于佛家的心态。

在沈从文去世半年后，作家徐迟披露了沈从文1980年7月2日给他的一封长信。沈从文写道：

……听人说，我的作品近于抒情诗，用法文译较易传神。这多属于“正面”的。当然还有“反面”的，也值得欣赏，即《诗刊》三月份上中国“最伟大女作家”骂我的文章，不仅出人意料，也为我料想不到。真像过去鲁迅所说“冷不防从背后杀来一刀”，狠得可怕！乍一看来，用心极深，措辞极险。但是略加分析，则使人发笑，特别是有人问及她这篇文章用意时，她支吾其词，答非所问，无从正面作出回答。她二十年来受的委屈，来自何方，难道自己不明明白白？嚷也不敢嚷一声，自有难言苦衷，却找我来出气，可见聪明过人处。主要是我无权无势，且明白我的性格，绝对不会和她争是非。自以为这一着够得上“聪明绝顶”，事实上，三十年代活着的熟人还多着，（即或过去和我不熟，也骂过我，但从近三十年种种印象，都会明白这篇文章用意的。）我对他们夫妇已够朋友了，在他们困难中，总算尽了我能尽的力，而当她十分得意那几年，却从不依赖她谋过一官半职。几乎所有老同行，旧同事，都在新社会日子过得十分热闹时，我却不声不响在博物馆不折不扣作了整十年“说明员”。所有书全烧尽了，也认为十分平常，并不妨碍我对新工作丧失信心，更不曾影响我对国家的热爱。在她因内部矛盾受排挤时，都是充满同情。到明白转过山西临汾时还托熟人致意。可料想不到，为了恢复她的“天下第一”地位，却别出心裁，用老朋友来“开刀祭旗”，似乎以为如此一来，我就真正成了“市侩”，也就再无别的人提出不同意见……

沈从文推断丁玲对他的不满主要有两点：一、《记丁玲》及其“续集”对她“举得不够高”；二、书中“不该提及对于现今还活在台湾的一个人的‘怀



丁玲重返北大荒留影（1981年）

疑”——此人即1931年至1934年5月曾与丁玲发生同居关系的冯达。冯达是向国民党自首的共产党人。丁玲跟他生过一个女孩的历史，长期成为烙在丁玲身上一块洗不净的耻辱印记，也成为一些人加害于丁玲的一个口实。

根据目前掌握的史料，丁玲公开流露对沈从文的不满可以上溯到1938年左右，《丁玲在西北》一书中写道：“丁玲似乎感到文人在友情上的浅薄与虚伪。她被捕后，她的友人就利用这机会出了本《丁玲选集》，获得名利双收。丁玲很爱她的母亲以及二三个孩子，自她被捕后，母亲与子女的生活当然是很悲哀惨苦的。沈从文几次回湖南，连顺道去探望一次都不曾，不必说是友情上的应有的扶助了。”文中提到的那位“友人”即蓬子，丁玲被秘密绑架半年后，蓬子编选的《丁玲选集》在上海天马书店出版发行，蓬子在该书卷首冠以他撰写的长文《我们的朋友丁玲》，介绍了他跟丁玲、沈从文、胡也频之间的友谊，特别披露了丁玲深埋在心中并煎熬她达两年之久的对冯雪峰的情感。当时蓬子以为丁玲已成为“死去的战士”，故出版此书、发表此文前都未征求丁玲本人的意见。至于责备沈从文没有在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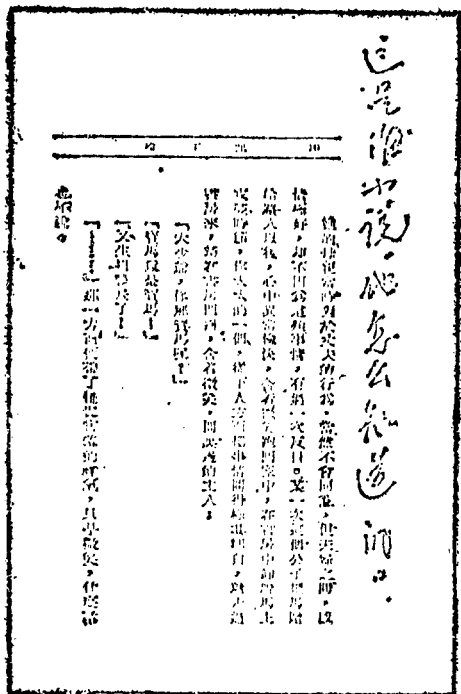
玲被捕后顺道探望她的母亲，无疑也是丁玲本人的意见，这一点，在丁玲晚年写成的《魍魉世界》中可以得到印证。沈从文于1934年返回湘西，路过常德，也不去探望丁玲的母亲。母亲后来曾把这件事讲给了丁玲听。丁玲虽然表示沈从文“向来胆小，怕受牵连，自是不必责怪”，但也承认自此俩人的心里“都隐隐有一点芥蒂”。不过，另一方面的确也是事实，即丁玲被捕后，沈从文公开发表了《丁玲女士被捕》与《丁玲女士失踪》两文，谴责国民党政府不按法律手续而用绑架方法虐杀知识阶级。当误传丁玲殉难时，沈从文创作了小说《三个女性》，以寄托对老友の哀思。

丁玲与沈从文之间的友谊在这场政治风波之后虽然进一步淡化，但朋友关系总算没有彻底破裂。沈从文对周健强说：“我们一直都是朋友，一直要好。解放后，她在天上飞来飞去的时候，我没有去巴结过她，她对我也没有什么恶意。”

从大陆解放初期，丁玲的确度过一段短暂的顺境，而此时的沈从文，却因曾受到左翼文坛的批判而陷入“灵魂的迷乱”。比如他服用一种叫“鸡鸣散”的中药，就会立刻产生幻觉，以为待到天明鸡一叫，他这个家就会离散，在这种极度的紧张和恐惧中，他终于用小刀划破血管，试图自杀。丁玲闻讯，立即跟陈明一道去看望他，为了使谈话更无拘束，还特约了一位“京派作家”何其芳。丁玲劝他不要疑神疑鬼，自恐自吓，要他把空洞的自大和过分的自卑统统抛掉。临行前，丁玲以200元相赠——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

老友的关怀和开导，使处于精神崩溃边缘的沈从文深受感动。1950年9月8日，他曾给丁玲写了一封3000字的长信，主要谈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大陆解放后，他心中“生存全部失败感占了主位”，感到“什么都完了”。由于“怕中共，怕民盟，怕政治上的术谋”，导致神经失常，“只觉得家庭破灭，生存了无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他“实在需要得到一点支持，才能够不再崩溃”。二、通过学习，检讨自己，“已深知个人由于用笔离群、生活离群转成个人幻想，涉于公，则多错误看法，近于病态而不健康，涉于私，即为致疯致辱因果。”三、他请求丁玲转告有关方面，希望能得到中共的谅解，安排他从事工艺美术研究，“为将来建设中的人民工艺美术的保存与发扬终生服务”；同时，希望丁玲劝他妻子留在他的身边，因为他“目下还能活下去，从挫折中新生”。

沈从文很快被安排到历史博物馆陈列组工作。经过他30余年的潜心研究，终于以《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论著赢得了世界性的赞誉。1950年11月，丁玲



丁玲在《记丁玲》一书上的批语（局部）

撰写了《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如实记叙了沈从文作为一个“困苦时期结识的知友”，在胡也频被捕后给予她的真诚帮助。但笔端仍带温情。1952年8月18日，沈从文再次致函丁玲，一托她将文稿推荐给报刊发表，二向她借100元。

从1955年秋天开始，丁玲先后被指控为反党集团成员、右派分子、叛徒，被开除党籍、公职，甚至锒铛入狱，直到历经24年坎坷之后，方于1979年2月获准从山西长治郊区的漳头村返回北京治病。这一时期，丁玲自身难保，当然不能再给沈从文以关照，而生活相对安定的沈从文似乎也并没有在精神和物质上给沦为流囚的老友以些微帮助。1978年冬，即粉碎“四人帮”两年之后，笔者曾致函沈从文，打听丁玲的地址及近况，沈从文表示一无所知，并承认“和丁玲多年来没有直接通过信。”当然，这种情况主要应该归咎于历史，不能再以古代传说中的义士高风苛求畸形政治下难于掌握自己命运的今人。

大约就在1979年秋季，博学质朴的日本汉学家中岛碧女士访问丁玲——她是《丁玲论》的作者，也是钱钟书夫妇作品的翻译者。她送给丁玲两本书，即是《记丁玲》与《记丁玲续集》，香港某书店据1939年9月上

海良友复兴公司的初版本翻印。至此，丁玲才知道世间有这样两本关于她的书。令人费解的是，沈从文在事前事后从来没有在她面前提起过。

作为传主的丁玲，对于这样一部号称研究她的“入门书”，自然是要认真拜读一番的。1985年6月25日，丁玲在致上海石化总厂子弟学校教师姚明强的信中，曾这样追述她读完之后的心情：

……我生气。一直生气，他以为我死了，他在写《记丁玲》时，谣传我已死。这本书我曾想逐条批驳，但转念我个人所受的诬蔑，有比沈从文更甚者，如我能忍受，那么沈从文的这本书就不值什么了。只是它有影响，成为研究我个人的第一本资料，还当着是非常可靠的，我在写《也频与革命》中曾说过这是一本很坏的小说。我想也够了。去年我在厦门读过一篇批评这本书的论文，我也建议不要发表，实在认为他也受过一些罪，现在老了，又多病，宽厚一些好了……

我粗略统计了一下，丁玲在《记丁玲》和《记丁玲续集》两书上所写的眉批、旁注等多达127条。那么，丁玲的127条批语是些什么内容呢？为节省篇幅和读者时间，我将它归纳为四类，每类略举数例，使读者借一斑以窥全豹。需要声明的是，笔者只是如实披露丁玲本人的观点，相信明达的读者不至于把丁玲的观点与笔者的观点划上等号。

一、丁玲认为，《记丁玲》及其“续集”违反了传记作品的真实原则，很多内容纯系编造臆想，一些情节的夸张甚至超过了小说。

例证——

二、丁玲认为，沈从文按照自己的低级趣味，把她描绘成一个向往“肉体与情魔”、与湘西土娼毫无二致的女人，把她跟胡也频的结合写成是单纯肉体的结合，并有意无意地在她的私生活中蒙上一层粉红颜色。这种描写，为一些人制造丁玲的桃色乃至黑色新闻提供了“依据”。受这类新闻伤害达数十年之久的丁玲对此感到愤怒和厌烦。

例证——

《记丁玲》第21页：

她们一面读书一面还得各处募捐。为时不久，他们住处似乎就同那些名教授在一个地方了。至少瞿秋白兄弟同施存统三人，是同她们住过一阵子的。

丁批：又是胡说！

《记丁玲》第41页—42页：

……她的年岁已经需要一张男性的嘴唇同两条臂膀了。……倘若来了那么一个男子，这生活即刻就可以使她十分快乐。

丁批：沈从文常常把严肃的东西，按他的趣味去丑化。我很不喜欢他的这种风格。在他的眼睛里，总是趣味。

《记丁玲》第71页：

她虽然同这个海军学生住在一处，海军学生能供给她的只是一个青年人的身体，却不能在此外还给她什么好处。

丁批：混蛋！

三、丁玲认为，沈从文笔下的胡也频是不真实的。一个有才华的革命作家被他描写成既无文学才能又无政治才识的庸人，胡也频的革命转变也被他说成是被革命宣传所蛊惑的非理智行动。无怪乎台湾陈纪滢教授认为《记丁玲》一书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即共产主义的“邪力”诱使千万追求理想的青年“误入歧途”。

例证——

《记丁玲》第84页：

譬如两人的书想卖时，必署丁玲的名，方能卖出，两人把文章送去同一地方发表时，海军学生的则常被退还。

丁批：胡也频的稿子，我从未改过。也频牺牲后，为须要钱，我出了一个集子，字数不多，编进了他的两篇小说《一个人的诞生》，还有不记得了。未署他名字，是因为他的名字由于政治关系未署。

《记丁玲续集》第25页：

海军学生之被人重视，我以为对于他根本毫无好处。这人既并无多大政治才识，有的只是较才识三倍以上的情。

丁批：你谈这些干什么，表现你的政治才识吗？

《记丁玲续集》第51—52页：

促成这人（按：指胡也频）转变的，实在还只是一种南方人单纯勇往的热情，并非出于理智的抉择。不过由于过分相信革命的进展，为一束不可为据的“军事报告与农工革命实力统计”所迷惑，为“明日光明”的憧憬所动摇，彻底的社会革命公式把他弄得稍稍糊涂罢了。

丁批：以小人之心！

四、丁玲认为，沈从文在书中把方兴未艾的左翼文艺运动说成是“过时的题目”、“博注上的冷门”，并断言这一运动“毫无乐观希望”，“到了退休的时节”，这种态度，完全违背了沈从文“不轻视左倾，也不鄙薄右翼”的宣言。作为左联的党团书记之一，丁玲对此感到忍无可忍。▲

例证——

《记丁玲》第177页：

左翼文学从商人看来，从多数人看来仿佛已过了时，大凡聪明人，皆不会再去参加热闹了。“文学左翼”在是时已经是个不时髦的名词，两人到这时节还捡取这样一个过时的题，在熟人看来恐怕无人不觉得希奇的。

丁批：这时左联刚成立。只有你觉得是希奇的。也频既不告诉你，可见认为同你不必再谈什么了！

《记丁玲续集》第9页：

且共产党方面将来的问题，若……不能相互为用，则一切计划将成为租界中的儿戏，结果乃不过一二文人负隅固守的梦想，所谓左联文学运动也将转入空泛与公式情形中，毫无乐观希望可言。

丁批：表现他对政治的无知，懦弱，市儻心理而外，没有别的。

《记丁玲续集》第176—17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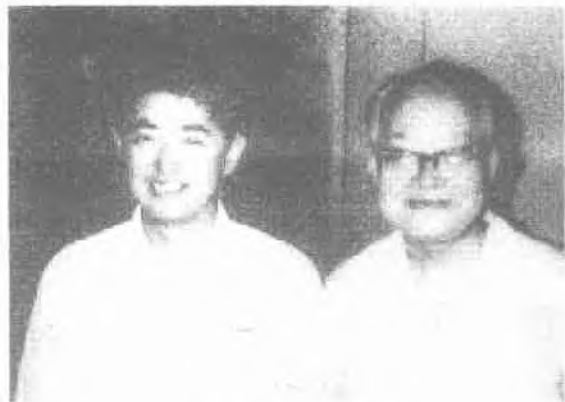
稍前一时期左翼作家的露面，已因为政府商人两方面的合作，加上种种由于自己理论，自己态度，自己战略所造成的不良局面，到了退休的时节。

丁批：胡说！

对于在沈从文书中涉及冯达的地方，丁玲未作任何批注。陈明先生说，丁玲从不回避跟冯达的关系，也未对沈从文涉及冯达的文字表示任何不满。沈从文认为因他提及冯达而触怒丁玲，只不过是个人的一种臆测。

沈从文先生1982年1月22日跟周健强谈话时，再次肯定《记丁玲》不是小说，“都是真人真事”。然而，历史上客观存在的真实毕竟只有一个。到底是沈先生眼中的丁玲符合历史真实，还是丁玲本人的意见更符合历史真实，那就是只好留待读者来判断了。·

（责任编辑：刘家驹）



沈从文与本文作者

「一个「延安的养蚕姑娘」的人生际遇」

「声播蚕桑女，名扬花木兰」



甘露，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一个普通的女学生。四十年代，在她似锦年华时就名震延安，因为：她能演唱梅派京剧“玉堂春”、“花木兰”，屡屡获得满堂掌声；她曾经是著名诗人肖三的夫人，因此，经常是当年毛泽东家中的座上客；她在陕北从事推广蚕桑事业，毛泽东曾赞誉她是“我们的养蚕姑娘”。她身材修长、风姿清秀、生性活泼、多才多艺、正直豪爽。可说是当年延安青年女性中的佼佼者。

她的一生颇富传奇色彩。她的少女时期，正处于祖国危亡之秋，她经历了难于想象的艰难险阻，终于奔向了延安；她有幸的是，每当处于关键时刻，总是碰到好心人为她引路；她和肖三情缘的种籽也在这个时期就埋下了；她和肖曾经有过恩爱的“模范夫妻”生活。当她还是30岁的少妇时，和肖三发生

了婚变。她还是在痛苦中奋力拼搏过来了。她的中晚年是在谢筱迺的爱抚中，儿女长大成人的温馨家庭中度过的。她67岁的人生道路曲折而坎坷，锤炼了她的坚强意志。她不愧为一代坚强女性。

1943年，我是作为延安的解放日报记者派驻绥德地区采访时认识她的。当时她受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的委派，到绥德地区来推广蚕桑养殖业，并在吴堡、清涧两县选点试验、推广新蚕种和新法养蚕，以及培养妇女养蚕能手，取得显著成效，曾经获得绥德分区专员的表扬和吴堡县政府的奖励。1944年冬，在毛泽东、陈云、林伯渠等参观“陕甘宁边区生产展览会”的蚕丝展览室，甘露向他们汇报边区发展蚕桑事业的成就时，毛泽东曾高兴地称赞她：“你是我们的养蚕姑娘。”

因为我和甘露都是浙江海宁蚕乡人，我们很快就熟悉了。我曾积极帮助她在解放日报上进行发展蚕桑事业的宣传报道。

以后，我留在陕北、直到担任第一野战军随军记者。甘露、肖三于日本投降后和女作家陈学昭同去华北；以后，又和丁玲、陈明夫妇同到河北省阜平县。我们的联系就一度中断。直到五十年代初，我担任了习仲勋的秘书，由西安调来北京，才知道她已经和肖三离婚。原来，她俩的结合和离异，还有那么一段曲折难言的经过。当然，我是同情她的；对她后来的爱人、能干的谢筱迺也印象很好。因此，当他俩结婚时，我曾到荣宝斋买了一幅齐白石画的“牡丹花”画卷作为礼物祝贺他们；还帮助他们邀请习仲勋（四十年代绥德专区的老上级）夫妇在北京的青海饭店参加了他们的婚宴。

五十年代中期，丁玲因所谓“丁玲陈霞反党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案而受到不白之冤，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其间，丁玲回北京要求其原单位发她一本《毛泽东选集》而被拒绝。甘露同情丁玲，要我为丁玲找一本毛选，我满足了她的要求。我们对这事的看法是一致的：即使丁玲犯了错误，怎能不让她学习《毛选》呢？对这件事，甘露是愤愤不平的。

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错误发动批判彭德怀以后，国家逐步陷入了极左的狂潮，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急剧下降，机关干部生活同样受到严重影响。当时，粮食供应紧张，干部每月定量标准下降到27斤，副食供应更难保证。我们一家由于身体比较瘦弱，还容易度日，而甘露一家大小都是高大身材，饭量较大，就难于果腹。因此，每当星期天带着她的

小女儿到我家作客时，我们再困难也得使她们吃饱肚子。临走时还得送她们几斤节余的粮票。那时候“做衣难”，谋划我家四个小孩的寒衣就十分着难。甘露联系群众面广，她可以在她家所在居委会内找家庭妇女，帮助我家缝制寒衣。缝新的、补旧的，一包包带去又送来。当时我经常患神经性头痛，甘露介绍我去协和医院找神经科谭教授诊治；我爱人延玉珍的妇科病是她介绍去找林巧稚诊治的，而且都由甘露陪同前往。当我们夫妇于1961年8月奉调陕西工作，她到火车站为我们送行时，她那满含热泪夺眶而出的情景，实在难于忘怀。

经过“文革”浩劫，七十年代中期，我和老伴曾两次到北京看望老朋友，总是借住她家的小屋，我们互诉各人所受的劫难、人世炎凉的体会，自然感慨万分。

1978年8月，我被调回北京到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任职。我和甘露之间的交往就多了。当时她住在东华门，每当我们去王府井，总要到她家歇歇脚，问个好。而且她总要用家乡口味烧鱼相待，用胖头鱼头熬汤，鱼块红烧，又叙叙国事、家事、大小事。那几年，几乎每当新年到来之前，她总要送我外文出版社出版的精美挂历。1981年下半年，我有机会参加中央党校的学习，她家住在党校的宿舍区，她对我学习生活中遇到的难题无不积极相助。她爱好养花，经常受到她赠送的名贵花种。

1982年4月的一天，甘露跑来找我，说广西人物画家刘宇一在北京举行个人画展，其中有一幅《良宵》，画的是1950年中秋国庆之夜，毛泽东在中南海联欢晚会上与柳亚子和诗的史实。描绘了50多位当代中国名人欢聚一堂的宏大场面，受到普遍好评，当时美术界

权威人士江丰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称赞《良宵》为扛鼎之作；但也有些人有不同意见，认为此画是“给共产党拍马屁”，因而不能送进人民大会堂展出。甘露是支持江丰的意见的。因此，她要我帮助联系，请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去参观评论一下，习仲勋很快表示同意。4月28日下午，在刘宇一、江丰、甘露陪同下，习仲勋一行去王府井美院展览室参观。只见这幅《良宵》油画上，皓月明媚，宫灯高悬，毛泽东微微弯腰，捉笔待书，名人们在庭院中吟诗作画，品茗弈棋，畅叙攀谈，一派昇平景象。画面气势恢宏、构图饱满和谐、人物细腻逼真、色彩华丽典雅。这本是画家在经历“文革”浩劫以后，表达了人民对五十年代国家赢得祥和日子的怀念。确是中国历史上重要而珍贵的一页，怎能说是“给共产党拍马屁”呢？当然，细心观察，画中并不是没有毛病的。经过这次习仲勋对画家的鼓励和指点，又取得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推荐，《良宵》作了认真的修改，终于在1988年送进了毛主席纪念堂内举办的“中国名家书画珍品展”上展出，并由纪念堂留作珍藏。在毛泽东诞生100周年之际，画家应纪念堂之约，另行绘制巨幅《良宵》作为永久陈列，而原画由画家取回，交由香港拍卖行拍卖，于9月份以底价300万港元拍卖，突破了中国在世画家作品价格新纪录。令人遗憾的是，甘露没能见到她为之奔波的这幅名画的好结局。

1987年5月间，她患病住院，我带了一束鲜花到协和医院病房探望，只见她原来硕长而颇有风度的身躯已经相当消瘦。但我不懂得她害病的严重，总以为她会慢慢好起来的，不料过不多久，她的病情发展到急性尿毒症引起脑出血，终

于抢救无效，于5月24日上午逝世，还只67岁。8月6日我去八宝山公墓礼堂向她遗体告别。参加告别仪式的生前友好有700多人。正如画家黄苗子的挽联所题：“声播蚕桑女，名扬花木兰”，概括了她晶莹明亮的一生。

甘露，原名蒋德良，于1920年1月出生在海宁县硖石镇，父亲早逝，家境贫苦，9岁上学，为免费生，1937年夏，甘露在“蚕校”毕业，正值“七七”事变和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年仅17岁的她，不随母亲外出避难，而和同学一起挤上难民船过钱塘江到浙东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同年12月，在丽水县碧湖镇考上了当时省政府教育厅举办的“战时青年训练团”。原在上海抗日演剧团的肖崑（肖三的妹妹），任中队指导员。她们相识后交往甚密。

毕业后，他随肖崑到金华“中华全国战时难童保育委员会浙江分会”工作。

“保育会”是一个抗日统一战线的妇女组织，总会名誉会长是宋庆龄，会长宋美龄，副会长李德全，邓颖超等中共党员均为常务委员。浙江分会由省主席黄绍竑夫人蔡凤珍任会长，肖崑任秘书长！戚铮音任副秘书长，甘露被分配在宣教组工作，组长是程为昭。甘露和戚、程同住一室，在交谈中又得知戚、程二人都是从延安抗大毕业后到金华的。她们给甘露介绍革命圣地延安的情况。对于她走上革命道路，起到了促进作用。

她随戚铮音走遍了肖山、余姚、诸暨、绍兴等县，沿途宣传战时保育难童的意义和前途。在短短的两个多月中，收容了303名在敌人的炮火和敌机轰炸下丧失了父母、从1岁到13岁的难童。1938年8月，日寇已侵占杭州和浙西各

县，并将渡江侵犯浙东，情况十分危急。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和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商定，把浙江省的难童保育院迁往长沙。由戚铮音、程为昭组织护送大队，包括甘露在内共12个保育人员护送，日夜兼程，花了三天三夜才安全到达长沙。时张治中的大女儿张素我为湖南省难童保育院院长，把浙江难童安置在一个小学校内。1938年10月，广州沦于敌手，张素我匆匆安排保育院撤离长沙。经过十多天，历尽艰险，才到了沅陵。甘露在这偏僻而安全的山城安排好家乡的难童后，决心踏上去延安的征途，到重庆去找八路军办事处。

11月，甘露带着保育院发给她的20多元“遣散费”，来到重庆。不料因未带任何介绍信，“来路不明”而未被接收。这时她那20多元遣散费已花完，无法前往西安。当她徘徊在重庆街头之时，突然遇到了杭州蚕业讲习所的俞筠燭老师。师生异乡相逢，自然倍感亲切。这位可敬的俞老师为了发展蚕桑事业而抱独身主义，政治上同情共产党，称赞八路军英勇抗日，支持进步青年。当她了解甘露的困境后，就介绍甘露到她领导的四川省丝业公司西充蚕种场工作，帮助她积蓄路费后再到西安去陕北。甘露在蚕种场工作期间，俞老师给她买来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斯诺的《西行漫记》等书籍，更加鼓励了她早日去延安的决心。1939年11月，她已积蓄了百余元路费，俞老师又帮她开具了四川省丝业公司去西安探亲的证明公函。凭这公函，甘露闯过国民党宪兵的层层盘查，终于到达了古都西安。当她跨进了七贤庄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大门时，又是因为没有介绍信而被婉言谢绝，但好心的接待人员王平告诉她，可以写信给延安的同学或朋

友，请他们介绍她去延安。这时，甘露想起了往日的好友肖崑就是著名诗人肖三的胞妹。她就写信给肖三作了自我介绍，又托西安新华书店的安克成把信转寄延安肖三。到1940年3月中旬，接到安克成的信说：“家中来信，要你速归”。这一暗示，真使甘露欣喜若狂，终于在4月16日到达延安。

到达延安的第三天，她见到了肖三。肖三当时在延安文艺界抗日协会。初次见到甘露，就激动万分地说：“盼望已久了，真担心你被关进国民党的集中营，现在好了，到家了！”还说：“你是我妹妹的好友，也就是我的妹妹了！”

历经磨难的甘露，此时面对已经43岁的肖三，就像对待自己仰慕的兄长一样，倾心地叙说了她的家庭、经历以及她爱好声乐、京剧，想到“鲁艺”学习的愿望。肖三静听人说：“先不要去‘鲁艺’，可先到中国女子大学去学习马列主义，以后再学别的。”并给甘露送了一本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要她回去好好学习，然后送甘露下山。半山上遇到一位中年女同志，经肖三介绍：“这是丁玲同志，这是我的妹妹！”由于甘露读过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丁玲也成了她的良师益友。

在“女大”渡过了一年另四个月的学校生活，学习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以及中国革命史和党的建设等课程，初步树立了革命人生观。学习期间，甘露被选为俱乐部副主任（主任是丁雪松，我国第一位女大使），下设声乐小组和京剧小组，邀请“鲁艺”的音乐家郑律成和潘奇担任声乐小组的教员；邀请“鲁艺”平剧院导演陶德乐担任京剧小组的教员。每天下午到“女大”俱乐部上课。在1940年秋为庆祝“女大”成立一周年，和1941年为

纪念“三八”妇女节，京剧小组演出“四郎探母”和全本“花木兰”，导演指定甘露饰演“花木兰”，从而“花木兰甘露”的美名便在延安传扬开了，肖三当然更加为之倾倒。

当时，甘露在中央党校礼堂演出“花木兰”时，由鲁艺戏剧家阿甲和音乐家金紫光伴奏。当她舞枪时不小心失手，她沉着敏捷地拾起继续表演毕，毛泽东登台和她握手时说：“你很勇敢呀！”

从此，肖三对甘露更增强了爱慕之心，经常要甘露为他抄写书稿。甘露写得那一笔潇洒飘逸的好

字，有如其人，肖三十分喜爱，又经常指点她如何阅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以及进步小说，如何争取做一个共产党员。肖三住地文化沟和甘露学习的“女大”，两个山头遥遥相对，只有一条延河相隔，中间还搭有一条小桥。晚饭后双方下山散步就可以相见。如此往来几个月，纯洁无暇、美丽善良、朝气蓬勃的甘露，使这位革命诗人的浪漫激情日益强烈；而甘露对肖三也由敬仰感激之情，进而萌发了少女初恋的梦幻。双方年龄的悬殊阻挡不了彼此间感情的与日俱增，相互间都感

到对方的吸引力。但正在这时，在莫斯科的肖三苏联妻子叶华带着孩子，于1940年10月来到了延安，回到了肖三的怀抱。此时，甘露清醒地把叶华当作自己的嫂子，热情地帮助叶华料理家务，使叶华逐渐适应延安的艰苦生活。

1941年7月，“女大”停办，全体学员分配工作。甘露响应党的号召，以一技之长为边区人民服务，报名要求到边区政府从事蚕桑工作。当时边府因无蚕桑专职干部，因而这项工作尚未开展，从甘露来到建设厅农业科以后，边府林伯渠主席曾对她说：“事在人为么！你来了，我们就可以把边区的蚕桑工作开展起来！”1942年秋末冬初，遵照林老的指示，组成“边区蚕桑考察团”，任命甘露为团长，一行三人来到绥德地区。

甘露理智地退出了与肖三的感情纠葛来到绥德工作，这使肖三颇受感动。肖三给甘露的信中写道：“自从1940年秋叶华来华后，你顾全大局，决定忍让，这，你处理非常适当、大方、贤惠，我完全了解你，并十分感佩你！”

当时，我在绥德和甘露接触中，丝毫看不出她有任何沮丧的情绪，只见她正朝气蓬勃地为蚕桑事业而努力工作。意想不到，在延安的肖三和叶华的共同生活中，不断发生矛盾，双方都怀疑对方与异性朋友（包括外国朋友）发生不正常关系，感情出现波折，到1942年，发展到了感情破裂而分居。1943年11月，经请示党中央，由周恩来副主席批准，叶华和肖三正式办了离婚手续，叶华带着两个孩子回到苏联去了。

叶华离开延安以后，肖三对甘露一往情深，要求甘露回到他的身边。经肖三向中央请求批准，将甘露调回延安。这时甘露的心头，又



1942年10月甘露和肖三在自家窑洞前



1941年三八妇女节，甘露在延安演出《花木兰》后留影

涌上了难忘的初恋憧憬，在肖三和叶华离婚一年后，甘露同意了肖三提出结婚的要求。1944年10月，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贺龙、王震、李富春、肖劲光等领导人，热情地参加了肖三和甘露的婚礼。毛主席回忆起当年16岁的毛润之和13岁的肖子璋（肖三的号）在湘乡东山学堂同学以来长期的战斗友谊，在给肖三祝酒时语重心长地说：“子璋啊！祝你和这个中国的养

蚕姑娘白头偕老！”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们在张家口和西柏坡先后生了两儿子：铁塔和甘平。孩子给了他们无比的幸福和欢乐。当时的生活十分艰苦，勤劳能干的甘露，把肖三和两个孩子的生活安排得妥妥贴贴；甘露还同时照顾丁玲、陈明夫妇的生活。在这新中国诞生前夕的重要历史时刻，甘露先后在张家口的晋察冀行政委员会交际处、接待了被国民党暗杀的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先

生的家属，和著名女作家史沫特莱等国际友好人士；在西柏坡村参加过中央研究室领导的土改工作。在工作之余，一面抚育幼子，一面做好两家人的后勤事务；还要帮助肖三抄写《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书稿。肖三也很爱孩子，尽量抽空帮助甘露给孩子喂饭、洗澡，逗孩子玩乐。周恩来同志曾当众表扬他们为“模范夫妻”。

肖三常带甘露拜访毛泽东。毛主席也总是热情招待，留他们吃饭。毛主席很喜欢孩子，有时就让警卫员叫肖三、甘露带上孩子搭上毛主席的吉普车去野外散步。

1949年1月下旬，肖三参加了周副主席召开的一次会议后告诉甘露：平津快要解放，中央决定委派叶剑英、彭真负责接管北平，需要500名干部参加接管工作。希望现任工作能够离开的同志自动报名参加。甘露听到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后非常激动，考虑到当时土改工作已经结束，两个孩子也有托儿所和保姆照管，可以参加接管工作。在征得肖三同意后报了名。

就在那年的1月26日清晨，她和领队张文松等6人，坐上敞蓬卡车向北平进发；28日深夜抵北京西郊青龙桥，向彭真同志报到后，彭对她说：“你是搞农业的，就分配你到军管会的农林水利处工作。”29日凌晨，甘露随叶剑英等20多位干部分乘四辆吉普车，还有荷枪实弹的警卫战士们，分乘两辆敞蓬卡车，组成先遣指挥分队向市区进发。沿途欢迎群众人山人海。当时以彭真为首的北平市委就暂设在东交民巷德国大使馆内，车队开进了这个大院。次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入城仪式。

甘露到农林水利处的另一项工作，就是对接管的几百名科技人员进行登记造册，及时分发人民币，

让大家欢度解放后第一个春节。后来农科院一些专家们对甘露风趣地说：“我们那时原以为要欢迎一位很神气的共产党大官，没料到迎来了一个穿一身粗布棉衣、背了个背包的女八路！”

4月初，肖三带了两个儿子从西柏坡来到北平，他奉周副主席之命，和钱俊瑞一起负责组织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无暇照顾两个幼儿。为此，甘露只好离开农林水利处的工作，调到肖三所在的文艺界，参加当时周扬和沙可夫正在筹备的第一届全国文代会的筹备处工作。4月底，肖三随中国代表团经莫斯科到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参加世界和平大会。5月25日回到北京。当天周副主席又委派肖三去莫斯科参加普希金诞辰150周年纪念大会。肖三又匆匆地去了莫斯科。

7月1日，是解放后第一个党的诞辰纪念日，在先农坛举行了隆重了纪念大会，由朱德总司令作报告，文代会全体代表参加。领导上分配甘露负责照顾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等著名京剧演员。素来爱好京剧的甘露，当然尽心尽力地执行这一光荣任务。7月9日夜晩，大雨下个不停，甘露像往日一样，正伏案细心校对肖三所写的《毛泽东青少年时代》一书的第三校清样。她哪曾料到，离家出国一个多月的肖三突然冒雨回家，他带来了已经离婚的叶华和两个儿子，并说他们已经在莫斯科同居了。

善良的甘露做梦也没有想到，两个月前才收到肖三于5月4日从莫斯科写给她的信中还是这样说的：

“……她（指叶华）在这里生活很苦，虽然孩子安顿了，但她简直无家可归，收入少，什么东西都卖光了，因此她愿意去中国作事，同

时愿带立昂、维嘉回国，这我很赞成。我告诉她，她去中国，你不反对。她表示感激你，并且再次声明：决不妨碍我你的家庭生活，决无‘挖墙脚’之意。她只愿立昂、维嘉两个孩子感觉到有父亲能经常见面，她和我也只维持同志和朋友的关系，她就满足了……”

5月25日和平代表团回国当晚，肖三还对甘露说过，叶华向甘露发誓，决不破坏肖三和甘露的家庭生活。

天真的甘露非常相信肖三的诺言，也很同情叶华的处境，同意肖三把叶华带来中国。当肖三应邀于6月去莫斯科参加普希金诞辰150周年纪念大会前，甘露曾要求和肖三同行，并取得周副主席的同意，但肖三却对甘露说：“你去了，叶华就不能来。”因为他和叶华都没有把二人离婚的真情告知苏联当局。所以苏方一直将叶华当作肖三的妻子看待。也只能凭这一点，叶华才能来华。肖三又向甘露保证：“叶华和孩子来了，把她安顿在东北，工作、生活有保障就可以

了！”甘露信以为真，为了成全叶华来中国，她就不再要求和肖三同去莫斯科。5月30日夜，周副主席和肖三谈话，再三叮嘱肖三注意不要发生意外，既自找痛苦，对党的影响也不好。要肖三即使把叶华母子接来，也只能放在哈尔滨等地，不能来北平。肖三答应了周副主席，保证不发生问题。同时，李立三也和肖三谈话，要他把握自己，不发生意外，肖三也答应了。

当那天深夜肖三带着叶华母子冒雨回家时，甘露仍把叶华母子当客人招待，为他们做饭，烧洗澡水等等。本来，肖三和甘露居住在二楼里外两间卧室，而此时肖三把叶华母子安排在里屋，自己到外屋抱着甘露痛哭，向甘露坦白了他和叶华已经同居一个多月。表示既离不开甘露，也离不开叶华。说他很痛苦，请求甘露原谅。甘露好似被晴天霹雳炸懵了，痛苦地感到肖三欺骗了她，欺骗了党中央领导，异常痛心而愤怒。当时正在举行文代会的工作人员，第二天看到叶华出入肖三家庭的异常现象而有所议



著名摄影家石少华于1946年在张家口为甘露和她的儿子铁塔拍下的珍贵照片



甘露和谢筱迺在颐和园

论，甘露羞于被辱，但为了照顾到党和肖三的威信，没有诉之于法，而将情况用电话报告了周恩来。当天下午，周恩来亲自来到肖三家，听取了甘露的申诉，严厉批评肖三欺骗党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说：“今天到了中国就要说中国话。”（意即要按中国的道理办事。）并明确指示肖三，立即将叶华母子送去大连。

叶华母子去大连后，肖三始而苦苦哀求，继而以他要参加国际活动、在中苏友协工作为由，日日逼迫甘露同意和他离婚，让他和叶华复婚。这极大地伤害了甘露的感情。为了维护党的威信，维护自己共产党的尊严，也照顾到肖三这位老同志的影响，甘露没有上诉法庭，而是向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中组部和中直机关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信申诉，请求中央教育肖三。为了避免争吵，同年8月中旬，自己带着小儿子甘平去上海看望母亲。不久，肖三又把叶华母子从大连接回北平。甘露在离开肖三以后，在各位中央领导人的关怀下和众多的好友的帮助下，逐渐冷静下来，认为肖三再也不值得她留恋

了。同意和肖三离婚。1950年9月，由朱德亲自向肖三传达中央的决定，同意肖三与甘露离婚，与叶华复婚，并给肖三一个口头警告的处分。后来，肖三几次给甘露寄去孩子的生活费，都被甘露坚决退了回去。

甘露虽没有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但是，正像她自己的名字那样，她是纯洁无瑕、晶莹剔透、光明磊落地做人；而且，关心他人，团结同志、急人所急、热情诚挚地对待他人。她并不因受肖三感情上的挫伤而倒下。相反，她更加坚强地面对人生，正当她30年华之时，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学习，三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国际贸易促进

会联络部。此时，她和联络部部长谢筱迺相识、结婚，1955年生了小女儿谢立安。“大跃进”时期，她被下放到北京市轻工业局，协助局领导在原有基础上创建包括一轻、二轻的轻工业局，在筹建了包括工艺美术、挑补绣花、日用化学、皮革皮毛、食品酿酒、造纸、服装、儿童玩具等八个研究所，为这些行业以后的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由于“大跃进”期间工作过于紧张疲劳，引发了妇女血崩病而住院治疗。病愈后又改调国务院所属的外文出版局工作。在十年“文革”的动乱中，她被剥夺了分工管理毛泽东著作外文翻译出版的工作权。造反派成立“甘露专案组”审查后，又把她下放“干校”劳动改造三年。1982年离休。

由于感情上的沉重打击和工作、生活中的操劳，使她的精神和身体受到很大的损害。曾因急病而进行过三次抢救性的剖腹手术。她拖着虚弱多病的身躯，在曲折而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拼搏，她的一生是平凡而明亮的，无论对待工作和生活，她总是顾全大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始终保持和发扬延安时代女性的优良传统。

（本文为作者给即将出版的《延安女性》丛书第二卷所作）

（责任编辑：方实）

重要更正

本刊今年第2期25页照片的说明是：“郭沫若在北伐途中”，但制版时却把郭沫若同志漏掉了。同期35页照片的说明是“陈云”，实际误用了肖劲光同志照片。这些错误的出现是很不应该的，谨向读者致歉，并对分别指出这两处差错的姜大义、史克己同志表示感谢。

本刊编辑部

第43届世乒赛中国队如何搏

——访徐寅生、蔡振华、张燮林

● 张继华

第4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即将在我国天津举行，国人翘首以待。

中国乒乓球运动，自第25届世乒赛上容国团单打夺冠后，第26届世乒赛上我国运动员便独领风骚：庄则栋直板两面攻横扫乒坛，徐寅生十二大板降服星野，张燮林“海底捞月”技压群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乒乓球队雄踞世界乒坛宝座，乒乓球成了我国的“国球”。小球带动大球、乒乓外交、乒乓球传友谊……大振国威！由于种种原因，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初期，我国乒乓球男队的战绩不佳，1991年第41届世乒赛上，男队竟一项冠军未获，之后蔡振华挑起了中国乒乓球男队主教练的大梁。我国男队经过两年的卧薪尝胆，终于走出了低谷。现在，中国乒乓球队正厉兵秣马，我走访几位老将，请他们谈谈这一战役的备战如何？

问：为了使我国乒乓球运动的水平能“更上一层楼”，当前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徐寅生：当前在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改革的同时，特别要强调思想政治工作，要加强对运动员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增强祖国荣誉感和责任感。队伍稳定了，战斗力才能提高。

现在世界乒乓球技术发展很

快。尤其是欧洲男子选手水平高，实力强。这几年我们的打法进步不大，创新不够。要尽量让年轻队员多出国打比赛，取得经验。

从长远看，还要抓好乒乓球运动的普及工作，从广大青少年爱好者中发现优秀苗子。

问：目前直板两面攻的打法已几近失传，这究竟是由于技术本身的缺陷，还是人为因素的阻碍？

徐寅生：我个人认为，直板两面攻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到了七十年代，欧洲选手创造出横板全攻型打法，既有速度也有强烈的旋转，这给两面攻的中国直板快攻打法造成了很大威胁。如果我们不发展，现在要对付欧洲的打法就非常困难。因为两面攻的直板快攻受手腕动作和拍形的限制，较难发力，更难以对付突飞猛进的弧圈球。为了解决直板反手进攻的缺陷，我们只能在“左推右攻”打法的基础上搞些创新。比如直板横打，就在直板反面木板面上也贴上海绵胶，用拍子的反面来进攻。

中国乒协历来提倡打法百花齐放，培养直板两面攻的打法，并不是口头上喊喊就能行的。任何打法它是否先进，能不能被人接受，都要经过实践检验。现在谁有本事培养出比六十年代更加先进的直板两面攻打法，重振雄风，我想中国乒协将会给予特别的奖励。

问：您在中国男子乒乓球队处于低谷的时候，担任了中国男子乒乓球队的总教练。在第42届世



徐寅生（右）

乒赛上,男双和混双冠军已被我们夺得,而且还获得了男子团体亚军。在第43届世乒赛上,您打算在哪些方面继续扩大战果呢?

蔡振华:目前中国男队的整体实力与上届男子冠军瑞典队相比,还有差距,但这个差距已不像以往那么大,这次43届世锦赛对我们来说是一次机会,力争在男子团体能有所突破。再是要保持在男子双打和混双上我们已经取得的优势。

问:关键场次比赛时,一些运动员打球时,说有什么心理障碍,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蔡振华:现在讲物质鼓励多,一些运动员患得患失的思想比较严重。当然,要完全脱离大气候,做到我们那时的那样也不现实,但不能过分,如果过分地追求物质条件,就会导致心理上不稳定。现在有些主力队员与青年运动员、陪练的待遇相差太悬殊,他们与外国的运动员相比,认为自己钱还没有人家拿得多。光靠物质鼓励会造成恶

性循环。要是都谈钱,我们这个体制优越性也就不存在了。在43届世乒赛前要下较大的功夫做这方面的工作。

问:您在国外待过几年,您能否将我国的训练条件、时间、方法与国外作一些比较呢?

蔡振华:我们国家搞集训时,有许多教练、陪练、工作人员为运动员服务,各种打法的选手比较齐全,可以帮助主力队员进行针对性训练,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也难以做到的,欧洲一些国家的运动员一般都是职业运动员,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在所在的俱乐部训练,这些俱乐部大都是民间团体资助,国家不管。一些国家好手分别在不同的俱乐部,国外请教练,要人陪练是要给钱的,所以训练对手不如我们整齐。训练方法、手段,可能我们与国外差不多。我们的运动员与世界强手较量,水平都很接近,唯一比人家强的就是高度集中,为了国家的荣誉共同奋斗。

问:为了迎接43届世乒锦标赛,国家乒乓球队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张燮林:在思想方面,我们要求队员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首先是43届与26届世锦赛之间的关系。26届世乒赛在我国举行时,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关注。如今电视已普及,我国许多体育项目已走在世界的前列,群众对世界了

解得越来越多,兴趣也越来越广泛。要想再获得当年的盛况已不大可能,我们要争取在新的形势下,发挥出我们最好的水平。

其次是要摆好我们与社会舆论的关系。第43届世乒赛在天津举行,处理不当,可能成为包袱。记得我国男子乒乓球队有一次5:0败给了瑞典队,下一届的世锦赛刚好在瑞典举行,当时瑞典的新闻界作了很多宣传工作,舆论都认为对瑞典队有利,可以战胜中国队,没想到,瑞典队反而背上了包袱,以5:0又输给了我们。这次43届世锦赛,我们的队员在家乡父老面前比赛,输球了、赢球了各种议论都听得到、看得到;不像在外国比赛,语言不通。不会产生直接的心理影响。所以我们要求队员要正确对待胜负,既要有强烈的为祖国争取荣誉的责任感,又要以一颗平常心去参加比赛,也希望新闻界能为我们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和气氛,有利于我们打好比赛。

还有就是要摆好我们与“海外兵团”之间的关系。要求队员在比赛遇到“海外兵团”运动员时,就像对待外国选手一样,不要肝火上升,老是想到国家把他们培养出来了,反过来打我们,去埋怨对方,这样反而会影晌情绪。

另外,要摆好我们与欧亚队之间的关系。从女子乒乓球运动员世界排名来看,名列前茅的选手,大都是亚洲运动员,这次我去欧洲,看到欧洲运动员进步很快,无论在旋转、变化、相持能力等方面都有了很大提高,和我们之间的距离已经不大,一些尖子队员对我们很有威胁。

在技术方面,除了强化训练之外,我们要抓好一些主力队员技术薄弱环节的训练。

问:国家女子乒乓球队的后



张燮林

备力量如何?

张燮林:女队现在第一层队员,像邓亚萍、乔红等赛事多,国际比赛一般都要点名请她们去,而二、三层队员就很少有机会参加国际比赛,缺少这方面的锻炼。第二层队员,离队的比较多。现在只剩下邬娜、王晨两个人。三层队员一般都是17、18岁,包袱少,比赛时放得开,成绩较好。比如杨颖,这次访欧时没有输给外国人,只输给了队友一盘,得了个亚军。这些年轻的队员各有特点,但临场经验和心理素质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 (责任编辑:仲文)



蔡振华(左)

于右任和西安碑林

● 华 夫

西安碑林,历经九百余年的风雨洗礼,已正式定名为“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荟萃自汉迄清历代碑刻、墓志、造像、经幢2300余件,展出1000余件。同时还设立了专门的碑林史料、书法、石刻研究室,建有文物档案,已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世界50个重点博物馆之一,成了闻名于世的文博旅游景观,每年接待上百万名中外游客。

碑林又是我国一处珍贵的石刻书法艺术宝库。仅第一展室,唐文宗开成二年镌刻的一套《开成石经》,即《周易》、《尚书》、《礼记》、《左氏春秋》、《公羊传》、《论语》、《尔雅》等12部,和清康熙三年又仿欧体补刻了《孟子》,合成十三经,共计碑石144方、65万余字。唐人楷书,字体工整美观。碑幢排排峙列如

屏,被誉为“世界上最厚最重的书橱”。在各展室、碑亭和游廊中,历代名家碑帖书法精湛,各具风采,久负盛名。东汉《曹全碑》,系汉隶中第一流佳作;北魏《晖福寺碑》,展示了从隶书到楷书的过渡,隋朝《孟显达碑》和《赵芬残碑》虽不著名,但书法笔画工整端丽而开唐风。自唐朝起,因以书法取仕,故书苑奇葩竞放,流派崛起,各展风韵。褚遂良的《同州圣教序碑》,铁画银钩,笔力道劲;欧阳询的《皇甫诞碑》,结构严谨,清丽绰约;颜真卿的《多宝塔感应碑》,雍容大度,雄浑苍劲;柳公权的《玄秘塔碑》,气势磅礴,体态劲媚;王羲之的《圣教序碑》,笔法善变,丰姿多采;张旭、怀素的《千字文碑》,龙飞凤舞,挥洒自如。同时,碑林中还藏有宋代苏、黄、

米、蔡四大家及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清代林则徐等名家的许多精品,可谓真草隶篆、琳琅满目。

西安碑林的发展,近代著名爱国书法大师于右任先生给予了很大的关心和支持。1933年,他把搜寻到的《汉熹平石经残碑》捐赠给碑林,使其第一次有了汉代碑石;民国二十四年(1935)为避战火毁坏,他又将历年苦心购得的290余方北魏、北齐和隋朝刻石着专人护送西安。这是碑林增加北朝墓志最多的一次,如今已有100多块嵌镶在联结第一、第二、三展室的四条碑廊上。在他的倡导下,国民政府拨款7万余元,对碑林进行了全面的整修和有序的陈列,使其基本形成了今日之规模。

他热爱孙中山，热爱自己的父老乡亲，他经历了异国他乡的炎凉世态，懂得了祖国要强盛，首先要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他本不十分富裕，却拿出巨大财力在家乡办学。

爱国侨领吴桂显家乡倾资办学记

● 陈迪秋
张兴汉



吴桂显先生生于日本横滨。祖籍广东中山市郊员峰乡，现仍保留中国籍。“九·一八”事变后随母回国念书，就读于中山县立中学，1942年回日本横滨，帮助父亲经营餐馆。

1965年开始经营房地产，事业有成，在侨胞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曾任旅日广东同乡会的理事长，副会长多年。1981年第九届旅日广东同乡会改选时，他被选为会长，连任五届。

吴桂显先生任会长期间，以激励炎黄子孙对中华文化的敬仰，每逢清明节，他就带领同乡会前往横滨中华墓地祭拜先侨，进行慎终追远，数典念祖的教育。同乡会经常放影《孙中山的家乡》、《新会风光》、《台湾渔业新象》、《林则徐》、《孔子的故乡》、《食在广州》和《天府之国的白菜百叶》等影片。使侨胞进一步加深乡土感情；吴桂显还赞助香港、广东名画家到东京、大阪和横滨等地巡回画展，进行中日文化交流。他还经常组织侨胞回国观光团和粤籍华侨子弟暑期回国学习团，寻根问祖。1985年吴桂显先生率领广东籍华裔青少年学生25

人回国。在广州中国语言文化学校参加夏令营活动。他在开学典礼上，意味深长地对25位华裔青年说：“广东就是你们祖辈劳动生息的地方。我终于把你们带回故土来寻根了。”目前，在海外老一辈华侨担心青年一代对祖国家乡观念淡漠，大家感到对华侨青少年一代的教育很棘手，吴先生认为最好的教育方法，就是要让华侨子弟更多的机会接触祖国的传统文化。了解家乡的建设。培养民族意识，激发爱国爱乡的感情。

吴先生在日本一贯热心华侨教育。长期担任横滨市山手中华学校的理事长，他为了办好侨校不仅自己出钱出力，还发动侨胞捐资鼓励华侨子弟刻苦学习，奋发向上。横滨山手中华学校已有90多年历史的老侨校，办得颇具特色。

1979年吴桂显先生首次回国探亲。中山市有关领导向他介绍了家乡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情况，陪他参观了母校和中山侨中等一些学校，他深感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他长期生活在日本，对日本经济起飞有着深刻的了解。他认为日本战后几十

年经济发展迅速的原因，重视教育和培养人才是重要的成功经验之一。此时，他内心萌发出报效桑梓的强烈愿望，要振兴中华，应从家乡做起。他崇敬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的故乡，也是自己的故乡。几年来，他为家乡兴学育才先后捐资捐物总值港币1400多万元。

1979年，他莅临侨中参观，率先为建校捐赠10万港元。在他的带动下，旅日侨胞郑华贵、麦惠鸿、伍美月、李煜涛和邓显光等校董，纷纷争相捐款捐物赞助中山侨中的建设。他先后捐赠图书一万多册，教学仪器显微镜、英文打字机、录音机、电视机等一大批，充实了教学设备，他回日本后，在横滨联络旅日乡亲成立了“横滨中山华侨中学教育基金会”，为中山侨中筹集发展基金。他还设立“吴桂显奖学金”，以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每年颁奖期间，他都亲自回来参加颁奖大会。自1981年以来，获得“吴桂显奖学金”的优秀学生的已逾千名。

同时，对他家乡的郊区中学和员峰小学也热心赞助。先后捐资30万元人民币。为纪念其父母在

郊区中学兴建吴文陆科学馆、叶惠英体育馆；捐赠图书、体育器材、照相机、显微镜一大批；每年春节和教师节都给教师发“红包”。

1989年他又捐资200万港元给中山师范学校，兴建科学大楼和艺术大楼。

为了进一步加速培养师资，提高中学教师的质量，他捐资委托华南师范大学每年为中山市培训10名大学生，充实中山市中等教育的师资队伍。

1986年中山市政府决定创办中山大学孙文学院，海外侨胞闻讯后，纷纷表示要为创办孙文学院作出贡献。吴先生得知家乡要创办大学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他首先捐赠一部九座日产丰田牌汽车。让筹备工作能顺利进行。创办孙文学院是白手起家。困难重重，建校需要一笔巨款，吴先生急家乡人民所急，决定把东京一块地产卖掉，捐助孙文学院的创办，兴建教学大楼、实验大楼和图书馆三个主体工程，他原计划将东京的地产价值二亿日元（相当港币1200万元）卖出



1989年，吴桂显先生（右）荣获中山市荣誉市民称号，接受中山市市长汤炳权赠送的金钥匙

后才汇款给孙文学院，后来他考虑到这三项工程一定要赶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23周年时开幕，为了能尽早满足孙文学院的开学需要。避免耽误工程进展，他的房产虽然未成交，却先向日本银行贷款，及时将钱汇给孙文学院投入施工之用。这样一来，他自己却要承担银行的利息170万日元。这是多么难能

可贵的赤子之心。他的财力有限，在华侨中他不算富有，但倾资育才，不愧为爱国华侨的楷模。

吴桂显每年为了办学回乡四、五次，中山市人民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要将他在孙文学院捐资兴建的三座大楼，以他的名字命名，他拒绝了；家乡亲人要拨地给他盖一幢别墅，他也谢绝了。

为了让中山市教育事业得到更快的发展。他想方设法，成立了“吴氏教育基金会”，他已捐资200万元兴办了“樱侨印刷服务公司”和“中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和“兴华特种涂料厂”三个实业公司，将企业的营利全部投入教育基金。

在吴先生穿针引线促成下，中山市与日本大阪府守口市缔结姐妹城市。

守口市经济和交通都十分发达。著名的“松下电器公司”、“三洋电器公司”和“富士通电脑公司”的总部都设在守口市内。这对中山市的经济发展，引进电脑高科技，提供了有利的合作条件。

（责任编辑：仲文）



吴桂显先生在横滨欢迎叶选平省长（右2）

日寇杀光北疃村纪实

●解力夫

在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笔者来到了这个村子，目睹了这一惨绝人寰的景象……
一九四二年，日本侵略军对我冀中进行大扫荡中，在仅有二百户人家的北疃村，一次就屠杀了千余名抗日军民。

日寇对冀中根据地的大扫荡，是从1942年5月1日开始的。

4月初，敌酋冈村宁次就召集华北日军联队长以上军官在石家庄开会，部署了有关扫荡事宜。随之，日军以三个师团、两个旅团及五万伪军共约十万余人，并配备了飞机、坦克，在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下，向冀中抗日根据地开始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

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中共冀中区党委，把冀中党政军领导机关由三、四千人减到近两千人，并将大兵团化整为零，组成机动灵活的二、三百人的战斗单位，采取“避实就虚”歼灭小股敌人。并号召民兵和县区地方武装，坚壁清野，凭借地道坚持村落战，机动灵活地和敌人周旋。

重兵压境的日军，在冀中8千多个村庄、6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立了1700多个据点，修筑了7500多公里的公路，挖了4000多公里的封锁沟。可谓三沟一堡、五里一堡。在强敌面前，英雄的冀中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在斗争，在反抗，在呼号，在血泊中奋力拼搏。其中定县北疃村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北疃位于定州城南50华里处，二百多户人家，是定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分区和县领导机关经常在这里驻防。

北疃村的民兵，十分英勇善战，5月中旬，北疃群众武装和县游击大队，曾打退过李亲古和邵村据点敌人的几次进攻。不仅使敌人遭受重大伤亡，而且破坏了



前日本陆军少将旅团长上坂胜

敌人在沙头国村修炮楼的计划。从此，附近群众视北疃为“保险地”，部队的失散人员和伤病员也经常到这里来隐蔽休养。

敌人在北疃久攻不下，就千方百计地设法摧毁这一抗日堡垒。日军一一〇师团驻北定的第一六三联队主力，在联队长上坂胜大佐率领下，于5月26日寅夜，会同定县、安国县的敌寇，共2000多人，像潮水般向北疃扑来。

就在日军进攻的前一夜，县大队政委赵树光召集民兵和县大队战士们作了战斗部署。

5月27日凌晨，两千多日本鬼子和伪军把北疃村围了个水泄不通。敌人首先根据汉奸提供的北疃地道图纸，堵住了北疃和南疃村外的地道干线，尔后发起猛烈的进攻。霎时间，小钢炮、掷弹筒、迫击炮不住点地倾泻过来，阵地上顿时硝烟滚滚，一片火海。这时，战士们个个怒视着涌过来的凶恶敌人，直到敌人靠近前沿阵地，我机枪、步枪火力突然齐发，手榴弹和埋好的拉雷一起指向敌人，鬼子像煮饺子似的倒在血泊中翻滚着。日军大队长，手持指挥刀，挥动指挥旗，督战前进，但是，还没有到村跟前就被我神枪手狄四根在村东口一枪结束了他的狗命。敌人连续组织了三次冲锋，均被我英雄的战士打退了。

敌人屡攻不克，气极败坏的联队长上坂胜，当场把一个鬼子中队长枪毙了，并亲自组织敢死队冲锋。鬼子敢死队身穿白衬衣，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在炮火掩护下“呀！呀！”地冲了上来，但又被战士们的集束手榴弹炸得血肉横飞。整整一个上午，打退敌人12次冲锋。

下午敌人调整了部署，主攻方向改为南疃和北疃村之间的群众武装阵地。经过十多个小时的激战，我手榴弹和子弹都打光了，有的机枪也发生了故障。傍晚时分，敌人终于突入我军阵地。

敌人进村了。当群众知道死亡正笼罩在头上的时候，大家反而镇静了下来。分区卫生部的干部宋守仁，定县农会干部李庚申，被敌人的军犬咬得遍体鳞伤，血如泉涌，他们在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中壮烈牺牲。分区供给部已怀孕的女干部刘亚如和八路军在北疃养病的一伤员，面对敌人的刺刀，挺起胸膛，坚贞不屈，凛然殉难。

敌人突入我阵地后，民兵们拼命封堵突破口，誓与阵地共存亡，这时一位战士怀着复仇的怒火，拉燃了手里仅有的一颗手榴弹和一颗手雷的弦，冲进敌群，炸得敌人乱作一团。

敌人堵截了地道，涌进地道的群众，有的拿着包袱，挎着篮子，有的还抱着鸡，将地道挤得水泄不通。

因此，防守北疃的县大队和民兵进入地道，便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这时，敌人已将地道切断，到黄昏时，他们找到几处洞口，将随身带的各种毒气点燃后投进地道，同时，点燃毛柴投到洞口，盖上棉被，使毒气向洞内四溢。敌人施放的是窒息性、催泪性和喷嚏性的三种气体。气味辛辣，令人窒息。县武委会作战部长张健、秘书刘西峰和北疃青抗先队长李德祥，意识到敌人施放毒气，他们便又钻出地道，利用房屋和敌人继续战斗。

他们三人控制着一所房屋，同敌人对峙。这时，三区小队马队长和北疃游击组长李孟申，也从地道口出来。他们两人脱去上衣，光着膀子，上好刺刀，跳进院内，同成群的鬼子拚起刺刀来。敌人猝不及防，连着被刺倒几个，随后终因寡不敌众，马、李二人英勇牺牲了。接着敌人向屋里冲来，李德祥手持擀面杖和菜刀，掩护刘、张二人先进地道，然后把刘西峰的文件包、公章扔进炕洞里，才沉着地进入了地道。

浓重的毒气，呛得他们嗓子发痒，咳嗽不止，张健拖着松软无力的身子向前爬行，爬了一段，终于爬不动了。他拉着李德祥的手说：“德祥，你走吧，我不行了，不要管我了！”说着嘴对枪口，右手勾动扳机，壮烈牺牲。民兵刘铁洲，受不了毒气的折磨，见敌人在头顶上



照片为殉难者遗骨。下面的字是战犯上坂胜对所犯罪行的确认

照片为殉难者遗骸，下面的字是
战犯上坂胜对所犯罪行的确认



挖开了个洞口，随即拿起一把杀猪刀冲了出来，和敌人拼杀。他左一刀右一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最后英勇战死了。李德祥的父亲李大爷，也从地道里冲出来，拿起一把粪叉对乡亲们说：“老少爷们，我们是中国人，绝不作亡国奴！我们要活得正气，死得壮烈！”随即拿起粪叉向敌人冲去，最后也光荣地牺牲了。

豺狼成性的日本强盗冲进村后，一场大屠杀、大血洗开始了。没有战死的被俘虏了。男的被屠杀，女的被奸污，有的被拉去奸污四五次，甚至连十几岁的少女和五六十岁的老太太也难以幸免。进入地道的群众和战士们，大部被敌人的毒气窒息了。有些中毒较轻者，强行从死难者的尸体中爬往洞口，结果不是被枪杀，就是被绑在树上剖腹而死。

5月28日下午，敌人走后，笔者曾随定县县长李守真和县议长吕丁儒等到北疃村进行善后工作，亲眼目睹了日本法西斯强盗洗劫后的惨状。北疃街头，到处都是被杀害者的尸体。在南北街上的尸体有50具，李家坟地里70具，李家街上250余具，村东北王之恒家

的井台上90多具，李洛敏家里被刺杀的尸体29具，朱根德家的土井里有被砍下的头颅16颗。死难者有的双拳紧握，怒目而视；有的满面怒容，肠胃露于腹外；朱根德家院子里，一青年被日寇用铁钎将其头颅砸烂，鲜血、脑浆并流。死者生前，大都和敌人进行了拼搏，他们的尸体多是裸露。另外地道内还有约500多具被毒气致死的尸体，多半是老弱、妇孺。看样子窒息前他们都作了痛苦的挣扎。有的头钻入土里而死；有的撕烂自己的衣服头部顶着洞壁而死去了；有的满面唾液和呕吐物；有的搂着孩子甚至婴儿在吃着母亲的奶死去了。其状之惨真是令人毛骨悚然！

当地党政领导干部怀着极其悲愤的心情，动员附近村庄的群众，把近千具遇难者的尸体安葬在村北的沙岗上。在清理中发现，有两口井被尸体填满，没办法将尸体捞起，不得已只好将井填掉。这次惨案中，仅北疃村就有280多人死亡，其中死绝了近30户。为了揭露、控诉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我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曾发布通电，号召全世界的人民声讨和制裁日本法西斯强盗！

在这次战斗中，敌人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我前沿阵地上，日本鬼子留下了五、六百具尸体，这是我冀中抗日地方武装利用地道村落战，歼敌创造的纪录。

乡亲们掩埋了死者的尸体，擦干身上的血迹，又英勇地投入了战斗。在惨案第二天的夜里，北疃附近的村庄，就有一百多名青壮年秘密地参加了八路军游击队。

这支游击队自成立之日到抗战胜利，大小战斗91次，歼灭敌人2578名，缴获各种枪支1935支。

日本投降后，在中国制造北疃惨案的战犯上坂胜，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此时，这个杀人魔王已是少将旅团长了，胸前还挂着三等旭日勋章和四等宝和勋章。

下面是1954年3月15日，中国军事法庭对上坂胜侦讯记录：

审讯员：上坂胜，你把“五·二七”事件的经过系统地谈一谈。

上坂胜：1942年5月27日，在冀中作战中于定县城南22公里之处的北疃及滹沱河北岸附近，制造事件之部队是我上坂胜指挥的步兵第一六三联队。其中，在定县南方的罪行是第一大队所为，在滹沱河北岸地区的罪行是第二、第三大队所为，其残酷手段中最毒辣的就是使用毒气，尤其是将大批八路军战士与居民驱入地道内而使用毒气，大批的人被杀，有的用刺刀刺杀，或者用军刀斩杀及强奸等。此外，为了收集情报捉住居民来拷问，以及放火和破坏，掠夺财产更不用说了，都干过。这种残酷性就是帝国主义日本军队之特征。其结

果,使无数居民被杀,若用具体数字来推测的话,这仅限于推测来统计,即我之联队各中队所杀死、伤的人员以最低限度来计算,有3000人以上。其中特别是在定县的北疃、南疃杀害八路军居民的数字约有1000,又在滹沱河北岸地区,杀害约2000人以上。我是如此指挥教育了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发挥了残酷性。我如何能赎回这种罪恶呢?这完全是我的责任。我痛感我的责任是重大的。我在中国人民各位面前衷心谢罪。

前面我的供述已经翻译用日语向我宣读,同我供述无误。

被讯人:上坂胜

讯问员:王宝棋

书记员:徐永忠

翻译:张铁

当中国人民特别军事法庭将群众的控诉书和见证材料与被告对质时,上坂胜又向军事法庭提交了如下的书面口供:

关于河北省定县人民政府对我命我的部下在河北省定县东南方北疃村使用毒气杀害抗日军及和平居民罪行之鉴定书及李庆祥等对此罪行的控诉书,以及对此进行审查的笔录,经翻译用日语向我宣读又经我阅读,我承认其内容属实,这完全是我的部下第一大队按

照我的命令所犯的滔天罪行,我要负完全责任,确实对不起中国人民,深表歉意,特向遭受此灾难的英灵表示深切哀悼之意。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六日于抚顺

译者 张铁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于1956年6月19日作了如下判决:

根据上述事实,本庭确认:被告人上坂胜在参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战争期间,实犯有对中国执行侵略战争,违反国际法准则和人道原则,指挥命令所属部队残杀、虐待我国和平居民从事军事性劳役和纵容部下强奸我国妇女的罪行。按其罪行,本应予以严惩,但本庭考虑到被告人在关押中有悔罪表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精神和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对被告人上坂胜判处有期徒刑18年。

对上述判决,上坂胜认罪服法,并感谢中国政府对他的宽大处理。

定县党政军民,为了永远铭记“五·二七”北疃大惨案,为了发扬死难烈士们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1946年夏,特修建了北疃烈士陵园,并修筑纪念碑。

(责任编辑:方实)

古人重德不重色学故录

一、晏婴不嫌丑妻

春秋时,有一天,齐景公到晏婴家饮酒。见其妻,问晏婴说:“这就是你的妻吗?”晏婴回答说:“是的”。齐景公说:“她又丑又老了,我有一女,年轻貌美,许配给你为妻吧!”晏婴迅速离席,说:“她之所以老丑,是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间长了。她年轻时并非这样。人皆壮托于老,美托于丑。她曾托我,我也受她之托。现承蒙您厚赐爱女,我怎好背叛丑妻。”于是齐景公点头辞别。

(故事见《晏子春秋》卷六)

二、丑妇责问丈夫

三国时,魏人许允娶阮氏女为妻。女相貌奇丑,新婚交拜后,许允不愿进洞房,家人十分着急。这时桓范来访,阮女料定他能劝说丈夫。果然,许允听从桓范劝说进了洞房。但只同阮女打个照面,便要出去。阮女知道他断难再回,便扯住衣襟不放。许允说:“妇有四德,卿有几样?”阮女说:“我只缺容貌一样。但读书人应有百种美德,君缺其几?”许允答:“皆备。”阮女道:“百样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许允深感愧疚,从此对阮女十分敬重。

(故事见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贤媛》)

● 李 锐



劳动英雄 吴满有

真的叛变投敌了吗？

编者按：吴满有，一个著名的农民劳动英雄，抗日战争年代在陕甘宁边区，他是毛泽东亲密的农民朋友，他的名字尤如五、六十年代陈永贵一样，是无人不知、那个不晓的。解放战争中，他参军后被俘，后来，以“自首叛变”的罪名被开除党籍，在家乡郁郁而死。吴满有是怎样一个农民劳动英雄？他到底叛变没有？他被俘后在国民党拘留期间表现如何？这件事一直为许多延安时代的老同志所关注。现在，特请对此事了解内情、当年在延安解放日报社工作、《开展吴满有运动》社论的执笔者李锐同志为本刊写来一篇文章，刊载于后，以解此事之谜。

吴满有早被人遗忘了，而且是蒙着羞辱被人遗忘的。可是历史不应当忘记这个人，应当还其人以本来面目。

1992年，我应约写过一篇《清凉山上的文字生涯》，谈到我执笔的1943年1月11日《解放日报》的社论《开展吴满有运动》，当年对解放区的生产运动起过很好的作用。文中还写道：由于“国民党的西安电台广播过一篇‘吴满有的讲话’，吴满有其人也就在历史上‘消失’，……现根据调查证实，当年国民党广播电台和报纸发表的，所谓吴满有反共讲话和文章，都是国民党泡制和由一个绥德口音的国民党人员念的。”这篇文章先在《随笔》发表，后连同社论编入《延安

记者》一书。1991年出差西安时，我同陕西省委组织部的同志谈过吴满有的事，经他们的介绍，从一个调查吴满有问题的同志手中，得到几份可靠的资料，足以使我写出上面这一段话。现在，我觉得有必要将吴满有其人其事，作一较详细的介绍，尤其是他被俘以后，在敌人面前，并未失去其农民劳动英雄的本色。

边区劳动英雄

吴满有的老家在陕北横山。1928年大灾荒时，他和妻子带着3个儿女，逃难到延安，那时还是国民党统治的旧社会时代。他先以24元卖了11岁的大女儿，光靠砍

柴还不能维持生计，随后又将3岁小女儿以5升粮让人带走。后来租了二、三亩地，每年仍有几个月连糠麸也吃不上，举家靠挖野菜度日。这样熬了3个年头，妻子终于病死。横山的天灾和官家勒索，逼得他的母亲和两个弟弟也逃到延安来了。由于缴不出捐税，他躲到深山，还被抓着，挨过毒打。直到1934年当地起了红军，闹土地革命，他分得一架60多垧（一垧约3亩）的荒山，一家才真正翻身，作了土地的主人，二弟也参加了红军。

解放日报的记者莫艾，1942年初春耕运动开始，他在延安县各区长检查春耕的联席会上，听到柳林区区长郑重地提出吴满有的名字，说吴“地种得多，荒开得多，

粮打得多，缴公粮踊跃争先，数量既多，质量又好，是一个抗属，模范的农村劳动英雄。”“有了他，公事就好办，他一个人的行动，比一百张嘴的解释还有效。”于是，莫艾翻山钻沟，离县城60里，来到吴家枣园。吴满有那时已49岁，身体强壮，不识字，非常憨厚朴实，不肯多说自己有什么长处。1941年他共收粮34石，缴公粮14石3斗，公草1千斤，公债与公盐代金共815元。他对记者说：“我的兄弟用血保卫边区，我用汗保卫边区。”吴家枣园一共14家农户，无不异口同声称赞吴满有：“这样的好人，还有啥话说。”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刊登了莫艾写的《模范英雄吴满有是怎样发现的》专访，和《劳动英雄吴满有连年收粮特多》的新闻报道。此后，有关吴满有的新闻就连续不断。此事引起毛泽东的关注，特找莫艾去长谈了4个小时，指出只有自力更生，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才能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毛认为，这是宣传吴满有的战略意义。陕甘宁边区政府经过调查核实，在群众大会上，正式宣布吴满有为全边区的劳动英雄、模范抗属、模范公民。新闻报导和木刻的头像，都以头条地位刊在解放日报的第一版上。与此同时，解放日报发表了我执笔写的那篇《开展吴满有运动》的社论。

开展吴满有运动

由于报导了吴满有，莫艾参加了1942年4月，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座谈会的最后一天，朱德在会上发言中说，吴满有这篇报道的社会价值不下于20万石公粮，这是1941年陕甘宁边区征粮的总数。当时在延安的作家、诗人、

木刻家等，纷纷用自己的作品歌颂劳动英雄。1942年年底举行的边区高干会上，毛泽东在他的长篇报告中讲到财政和粮食问题时，开篇即引用了4月30日的这篇新闻报导，说吴满有已是一个富裕农民了。“他已把自己的命运与共产党、八路军、边区政府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毛接着说：“我们还有许多同志，只知向人民要这样那样的东西，粮呀，草呀，税呀，这样那样的动员工作呀。为了革命，为了抗战，我们向人民要东西是完全合理的，但这只是做了一个方面的工作，而且还不是第一个方面的工作。我们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在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在做了这一方面的工作，并确实生了成效之后，我们去做第二方面的工作——向人民要东西的工作时，我们才会取得人民的拥护，他们才会说我们要东西是应该的，是正当的：他们才会懂得，他们如不送出粮草等等东西给政府，则他们的生活就不会好，就不会更好。这样我们的工作才不是勉强的，才会感到顺利，才会感觉真正和人民打成一片了。这就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见毛泽东选集》1948年东北版874—876页。特引自《延安记者》476—477页莫艾的文章。）这是我写《开展吴满有运动》那篇社论的历史背景。

在热火朝天的春耕运动中，首先向吴满有挑战的是安塞的复员军人杨朝臣。这个凭一把镢头开荒

的老农，大年初一就往地里送粪；头年没下雪，他掬起河里的冰块送到山上去。吴满有应战的同时，提出建设“劳动英雄庄”，开展村与村之间的劳动竞赛，将个人致富扩展为集体致富；同时还提出军民劳动英雄大竞赛，引发全边区丰衣足食、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大生产运动，吴满有复杨朝臣的应战书在《解放日报》发表后，朱总司令立即电令边区所有部队积极响应，“多生产一粒粮食，就是多增加一份抗日的力量”。贺龙也连夜打电话给南泥湾驻军，“迅速接受吴满有的友谊挑战”。西北局和边区政府主席也分别通知各地党政机关，把吴、杨竞赛切实、迅速推广到群众中去。据统计，参加1943、1944两年边区级劳动英雄大会的劳动英雄、先进模范分别为185人，476人。原来陷于经济困境的陕甘宁边区，1943年就改变了局面，部分群众开始有余粮，政府有粮食库存；1944年有了进一步改善。这两年政府共积余公粮50万石，这对解放战争中坚持边区的战争并取得胜利，可说起了关键作用。

吴满有当时雇有两个长工和一个拦羊娃，农忙时还雇短工，但他是党员、劳动英雄、模范公民。社论号召全体农民“向吴满有看齐”，“他的方向，就是边区全体农民的方向”。这篇社论引起一老同志赵长远来信质疑，提出一个生产关系的严重问题：如果不论其经济性质，能否把富农的方向（吴满有的方向）当做边区全体农民的方向？这是一个关系到社会性质和革命方向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引起党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随即由王若飞主持的中央党务研究室以《本报编辑部》名义，发表了长篇复信。信中肯定吴满有被称为劳动英雄，包括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意义：他的

训总队，后放回原籍。吴说：“不要怕我忘记共产党，像我这样身份的人，组织上一贯抬举我，爱护我，共产党对我如此的恩德，我死了也是光荣的。请放心，我至死也不会被野兽屈服，死后阴灵也忘不了共产党。我被俘后，改名叫王文亮。进‘青训总队’编入五中队，在生产劳动时，被坏种乔某看见（川口区六乡乔树勋的儿子），因此暴露，把我调到总队部。胡宗南等人还有好多新闻记者参观团的人，搞了一个礼拜，把我的像片同1943年我的照片对照，才把我证明出来了。从此，借（用）我本人的语言，在广播电台上广播，骂共产党，并称我是共匪担架总队队长民运科长，共产党延安工农大学校长，边区参议员。我现在回国民党的怀抱，再不受共匪欺骗了。”要给林主席说：“如果听到广播的话，那是假的，不是我本人。”又说：“我与侄儿吴仲贵被俘后，编入二队，我二儿未被俘，现在不知在何部，希多照管，家中还有大儿子，希多照料。最后流泪说：如果我死不了，终有一天会是你们的人；如果死了的话，我在革命队伍里还有几条根，还能继续为党为人民服务，为我复仇。”

“据牛相林谈，吴满有和他谈了几次话。上面所捎的话是牛临行时说的。”曹、杭两人这封信的日期为1948年8月30日。

当时被俘的人都集中在西安附近的“青训总队”。曾在这个总队教育训练科担任科长的柳中宁写的材料说：吴满有最初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和真实姓名，后来被人认出卖了他。于是中队长马献瑞和第一大队训导主任王天授找吴反复谈话，加以威胁、诱骗，但是吴满有坚决不承认自己的身份。后来大队长李若海、孔宪文亲自出马谈话，也没有结果，吴一直拒绝谈话。

他们于是采取软化手段，让吴不住大宿舍，与中队副汪秉法同住一间小房子；不吃大灶，同马、汪等一起吃饭，换穿绿呢子“官佐”军服，着皮鞋，并且请政治教育来陪同照相。随后又将吴移住西安总队的政工处，由汪秉法陪同监视，带着吴逛公园、看电影，最后逼吴到广播电台广播。据柳中宁的材料说，他们怕吴满有在广播时随口说错了话，决定由第一大队的训育干事汪铿清代讲，因为汪是陕北绥德人。直到1948年冬，政工处将吴押上飞机送往南京国防部政工局。“以后不知下落”。柳中宁还写道，当年这个政工处的《爱国青年》月刊还出过一期《吴满有专号》，其中包括俘虏吴的经过和受优待情况，刊有吴的照片，以及孔宪文等同吴一起在河里洗澡的照片等。这期专刊除了在西安散发外，还由国民党飞机在解放区散发过。

柳中宁写的这份材料存陕西省政协文史馆。查证这份材料的同志告诉我：吴满有被俘以后受过刑，坚不交待什么问题。于是被转移到西安，采取软办法，如晚上将吴的衣服取走，放上国民党的军服，使吴不得不穿，于是借机拍照宣传。

关于吴满有是否“自首投降”过的问题，原国民党西安军事新闻社主任段明写有两份材料，一份这样写道：“吴满有是1947年6月间见到的，这时南京中外记者参观团来到西安，我当时是参观团成员之一，共15人，外国记者5人，香港记者2人，余为南京各报记者。有天被邀去长安县樊村一带一个村庄，参观胡宗南军的爱国青年训导总队即俘虏集中营。该总队训导组孔某带吴满有同记者们见面。有记者问吴，你在这里生活如何？吴只点头说，好。再问别的，他就不说

话了。我们参观后就走了。胡宗南亲自出面，在北院门大楼礼堂举行记者招待会，吴满有未见出席。西安新闻界在东大街福康公司楼上开记者招待会，吴也没有参加，西安各报也未见刊有吴满有的什么言论。至于飞机散布传单，那是青训队和胡军内部搞的，不能代表社会公众舆论。我只见过吴满有这一次，他穿的是灰色便衣，光头。”另一份材料中补充了对吴满有的印象：“问话时，孔某站在吴的身旁，吴只说了一个‘好’字，表情不愉快，笑是勉强的笑，具体生活条件及待遇并未吐一字，笑后，脸上立即呈现愁苦之表情。在西安胡军未作宣传，报上未作报导，就是怕记者去采访对证。从这一点可以肯定，吴并没有‘自首’，而是持忍耐等待和屈意应付而已。”

1948年7月，胡宗南“爱国青年训练总队”主编的《爱国青年》（第17期）所谓《吴满有专号》上，共刊吴满有3篇“广播词”（1948年7月7日、7月15日、7月16日）和《吴满有等脱党宣言》。这些由国民党政工人员泡制的作品，说什么“我们要紧紧携起手来共同消灭共匪，为建设富强康乐的三民主义新中国而努力！”等等，都是一些陈词滥调，没有摘录的必要，但吴满有就是由于这些所谓“铁证”，回到家乡后，就被开除了党籍而郁郁去世的。对国民党来说，也正是这些陈词滥调招致自己的必然灭亡。

吴满有悒郁而死

据杨培柱说，吴满有是1950年3月回到家乡的，只带着一个被包。回家只停了3天，就叫到县上去了。从县上回来，又叫到乡上去

了，县委组织部召集柳林乡的党员开大会，把党籍撤了。1950年或是1951年夏，王震派两个人从新疆来，叫吴满有到新疆去。吴说，我有病不能去了。来说人，你不去，我们回去不好交差，还说路上花销你不要管，从西安坐飞机去。吴满有还是不去。一直谈到下午，那两个人才走了。走后老汉说：我反正受过来了，就在家受，不去了。

杨培柱说，老汉一谈起被俘后的事，就伤心地哭说：不能提，冤枉事一肚子装着。算了，不提了。回家后，老汉还能干活。他家里的羊、牲畜都被胡宗南军弄走了。后来贷了款，从安塞买了四、五十只羊，到办社时，又发展到 170 多只。

办农业合作社时，怎样动员劝说，吴满有一直不愿入社。当年柳林乡吴家枣园高级社社长吴世昌说：刚解放不久，柳林乡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宣布吴满有是延安最大叛徒，开除党籍，取消“劳动英雄”称号。这事在延安影响很大。吴满有还能劳动，还拦一群羊。1956年，枣园、赵庄、庙河等七个村联成一高级社，我任社长。村民全部入了社，只有吴满有一个不入社。我多次去吴家做工作，他都不愿说话，有一天晚上，我又劝他，他哭了，哭得很伤心，只说：“我是社会的废人，你别来了。”我们做不通工作，打电报把他在新疆工作的儿子吴凌旭叫回来。吴满有说：“我不是舍不得这些牲畜，我儿子都舍得，还有什么舍不得？我给中央写了

開展吳滿有運動

模範農民勞勵獎章吳滿有，有政府發展農業生產的號召下，計劃擴大自耕的土地；增加耕地面積百分之四十——（開墾二十五畝），並且準備向一半公地耕作，發展副業（見八日本報）。吳滿有這種積極政府政策，對農民、周家對他的精神，是值得大家學習的；他的方向，就是今年全國農民的方向。

吳滿有過去曾經是鄉長民，他到延安來的時候，賣過女兒，幫人家受苦，磨豆腐，乞食糊口。到了今日，他到了要求衣食的生活，並且成為人人所敬愛的勞動英雄。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於政府的幫助，革命的起義；另一方面由於他的勤快和懂得先進階級的道理，他經常說：「分得了土地而不努力耕，」那我們吳滿有豈不還是進幾年的倒退！——買了女兒還不夠的吳滿有現在，就讓我們來研究一下吳滿有的成功歷史吧。

「你們要學我種和我的一樣好，大家都向我學吧，我沒有什麼秘訣，就日勞動。」這是吳滿有自己說的話（見去年十月二十九日本報）。這就是他致富。據吳滿有莊子上的農戶說：吳滿有起身比他早兩點鐘，睡覺比誰都遲，天還沒有亮，他就騎牛上山，天已黑了，才從地里回來；冬天沒睡懶覺做的多，對於抽草：往後出了苗的時候，有的農民怕上田，不願干，或者最多一次，動到至少翻兩次土。這種超常的精神，已經起了很大的影響。

更有說：「全村的人和他全部的人的臉譜，現在都同我一樣，我們一家人雞叫

子國新家，大塊上乾菜，都要打粉拌炒，要不起虎。孫德福過時，不早不晚，拿給子安在露宿棚，庵子裏弄好弄完。他又開小帳算別處，他同和生坐的最好，經常到廟前桂樹下替香敬酒。譬如開春時候，一塊地栽得最好，每日要吃吃草，喝水，養老兒持刈，歸得淨，不讓別人去割它，最出外邊不要讓在破屋地下，免得被牛馬，因為會養生花，肥時就比人家多。做開成廣發地之外，幾種菓木樹，因為會養生子，今年還算快，一畝紅松。

吳清是不像劉快，一個燒茶，而且有計劃，樣樣都想復運到，這在一鄉農民中是難能可貴的。我們看，八日中心本報所擬定的今年生產計劃，是多應具體，多麼周密。機關計劃有本報要多收銀五十萬石；勞動力量與牲口的數額，都很恰當，望弟能夠到兄弟的工作時間點上，時常抓得緊些，如「劃清七月放牧時，抽三頭牛到東家耕熟一次」。這樣的計劃就是既有眼光，又合乎實際。

因為吳清有這些優點，所以他的收成一年比一年好，平時每塊地比別人多打六分之二，今年的收成當然比去年更好。

吳清有不但是種植的模範，並且還是一個經驗較公的公民。他莊上的戶曉他公劃出的那些條件，他都記着。「八隊軍保衛團的邊境，人家在前方流血，他不不過多做一些，幫他們豈好說。」他還帶了公家莊上的數斤米，借債借穀物給他們。他是鄉上的傳統主任，他自己原是貧民，初解了公

我們認為，各地政府應大規模地普及獎勵制度，這對於生產運動的向前發展是必要的。由於獎勵有適當勞動獎賞，每種作物就實，如要種植。吳滿有本村去年開闢本村的農民，都提出了口號：「向吳滿有一八一〇」。

我們今年的春節口號，就是要大家那樣關心吳滿有的生產，並幫助他作出成績。因此，過去某些人以為「生力產自己已建設了」，為了使農民們產生一種更高興、土地、耕牛、農具、紅出產計劃，提高吳滿有的棉紗，證明不僅已有生產，實現他的生活，而且今天還比較豐富，經過自己的積極勞動，也可以達到豐裕的生活，而且對於遠處來問話，對於他贊揚，當此春耕起點開始的時候，吳滿有，展開偉大的吳滿有運動。

莫瑞有不懂是勁伏，「肯勞動」，而且他的莊稼經營得法。他對於地地是深耕，多施肥；別的農戶一般只是翻土五寸深，他卻至少七寸深；去年每畝地地下蓋七袋，今年下糞十袋；有荒地的地方，多開墾多種地是增產的上策。

吳滿有的一生，他的汗勞動，有辦

三封信，中央没有回信。”于是谈到被俘的情况，被人认出来了，对了照片，才隐瞒不住了。谈到广播录音时，吴满有说：“我叫吴满有，老子担架儿当兵……就被人家推开。人家把骂共产党的稿子全部念完后，把我押回牢房。”

吴满有常说，我是社会的废人，别的都不说了。他就是不入社。后来他儿子说：“你不入社，我就不走了。”吴满有才答应下来，让儿子回新疆。儿子走后，他还是不入社。儿子吴凌旭，小名狗娃，八十年代在乌鲁木齐轻工业局一个公司任经理。他让党关心平反和恢复名誉的问题。

1991 年我到西安出差时，请省委组织部老同志为我收集到以上有关材料。曾经负责收集这些材料并对吴满有被俘事作过调查的一位同志，同我谈到，他是 1982 年受党史人物研究部门的嘱托，做这件事的。他把整理好的材料交给了组织，据说转到延安地委，就再也没有下落了。延安时代的老同志，都以为吴满有是个在敌人广播电台发表过讲话的叛徒；1949 年以后成长的中青年人，谁又知道一个吴满有呢？

吴满有是 1959 年 3 月死去的，时年 66 岁。他是带着满腹含冤的心情郁郁去世的。

(责任编辑：方实)

由李锐执笔写的社论，发表于1943年1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

在一部简略的《三国志》中，陈寿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记叙的溢采照人，楷模千秋，已十分不易，令人敬服的是，陈寿的父亲曾被诸葛亮贬谪，这位史学家不计前嫌，还特地为廉政的诸葛丞相编辑了《蜀汉诸葛亮集》，给我们难得地留下了隆中对策和前后出师表等传颂千古的名篇。这一经略名臣经历了人们千年的“踵事增华”，到明初，由著名的小说家罗贯中荟萃成了一部《三国演义》，把诸葛亮绘声绘色地描写成一个未卜先知、料事如神、“多智近妖”的人物。如今我们心目中的诸葛亮，大都来自罗贯中生花的笔端。本文作者煞费苦心，用史料和演义做了比较，帮助我们分辨这位被包装后的历史人物所起的历史作用。

揭开 诸葛亮的 神的面纱

● 徐庆全

诸葛亮确乎出生在一个“浪花淘尽英雄”的时代。在他出生不久，头裹黄巾的农民举起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义旗，震撼了东汉政权。到了他青少年时代，袁绍父子，曹操、孙权、刘备、刘表父子等大军阀正逐鹿中原。在诸侯争雄的战乱中，诸葛亮开始了颠沛流

离。当曹操盘桓中原、孙权称霸江东，而刘备还在依附刘表时，诸葛亮正在隆中（今湖北襄阳县）过着隐居的生活。

《仙鉴》一书告诉了我们一个带有宿命论的故事。书中记载，诸葛亮躬耕期间，司马徽曾领着他到汝南灵

山拜鄢公玖为师。诸葛亮在那里住了一年,以恭敬的奉侍博得老师的欢心,因而得到了阅读《三才秘篆》、《兵法阵图》、《孤虚相旺》的机会。100天过后,老师见他已掌握书中奥妙,便对他说:“现在天下五龙出现,要具有神力的人,才能挽救混乱的局面。”诸葛亮求教“五龙”何指。老师答曰:秦汉之时,嬴秦为白龙,吕秦为黑龙,项王为苍龙,汉祖为赤龙,文帝为黄龙,所以汉朝尚赤、黄色,即火德,现在汉朝将终,孙坚尚“土”德,以土掩火,是汉的仇敌;曹操以“水”为德,以水掩火,也是汉的死敌,惟有刘备是汉室宗亲,你若出山必定选择这样一个真正明主,才能辅佐成功。

这则传说,自然是为了神化诸葛亮,但却为我们揭示了受过传统文化影响的诸葛亮,隐居隆中,潜心研读兵书,“以待明主”的思想基础。

以此为契机,一代雄主刘备到隆中“三顾茅庐”。

时年27岁的诸葛亮,在隆中茅庐为刘备描绘出一幅成就霸业的前景:首先是取得一块立足的地盘。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曹操不可与之争锋,孙权也只可与为援而不可图,惟有向刘备的宗姓刘表、刘璋开刀,取得荆州和益州而立足。其次,在政治、经济力量壮大的情况下,北出洛阳,西入秦川,霸业一定能成功。

这篇隆中对策,好似拨云见日,使刘备找到了正确的奋斗方向。刘备自然不会放弃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才。从此以后,诸葛亮就成了刘备最得力的助手,走上历史的大舞台施展身手了。

在群雄并起的争霸中,刘备当时还是个弱者,诸葛亮出山以后,即积极着手帮助刘备实现隆中对策中所提出的谋图霸业的方案,首先是谋取荆州。

荆州当时在军事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北可出襄、樊进击中原,东可顺长江而下控制东吴。对这块“兵家必争之地”,孙权、曹操垂涎已久。昏庸无能的刘表撒手西归后,曹操便急不可待的兵临城下了。刘备失去了立足之地,只好逃奔江陵。曹操则率轻骑五千急追,在当阳的长坂(今湖北当阳县东北)将刘备军杀得人仰马翻。刘备只好率军退到夏口(今汉口),进驻樊口(今湖北鄂城县西北)。当时刘备只剩关羽水军一万人左右,加上刘琦的部队,总共不过二万人,势孤力单。

罗贯中虽然也叙述了这段史实,但却给诸葛亮套上了“初出茅庐第一功”的光环。而对曹操大军的追击,诸葛亮先是在博望坡一带采取伏兵计,用火攻大败曹军,接着,诸葛亮又率军主动撤出新野,布下口袋,再用大火,把进犯新野的曹军烧得焦头烂额。罗贯中烧的这“两把火”,树立起了诸葛亮“指挥如意笑谈中”的军师形象。

刘备惨败后,曹操率军自江陵沿江东下,兵锋直指东吴。孙权自知难以与之抗争,便派鲁肃前往夏口,同刘备、诸葛亮共同商定了联盟抗敌的战略方针。诸葛亮并亲往柴桑面见孙权,陈述联盟抗曹的重要性。208年,孙刘联军与曹军决战于赤壁。

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不惜以10回的篇幅(第42—51回)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赤壁之战的过程,并把大量笔墨用在渲染诸葛亮神机妙算上,为后人留下了“草船借箭”、“巧借东风”、“智算华容道”等脍炙人口的故事,并进而树立起诸葛亮“多智近妖”的形象。

据史载:三国时期确有“草船借箭”的事,但不是诸葛亮的得意之作。据《魏略》的记载,“草船借箭”的人是孙权,地点不在赤壁,时间是在赤壁之战后的213年;又据元代建安虞氏的《新全相三国志平话》记载,借箭的人是周瑜而不是孙权,而时间、地点则在赤壁之战前。不管借箭的人是孙权还是周瑜,反正与诸葛亮毫不相干。而罗贯中却移花接木,把体现智慧的“借箭”这一花环戴到了诸葛亮头上。

“草船借箭”还不足以表现诸葛亮的神机妙算,于是罗贯中又让他到七星坛上去“借东风”。

赤壁之战中,黄盖驾船诈降火攻曹操是事实,而“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指曹军船只)”也是事实,但这风却不是诸葛亮借来的,而是当时气候变化的自然规律。假若真要说赤壁之战中有人预测风向的话,那功劳应当是周瑜。唐朝诗人杜牧在《铜雀台怀古》一诗中写道:“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我们可以推测:在决战时,周瑜大概已经预测到当时的风向,所以才有黄盖的火攻之举。而罗贯中让诸葛亮去借东风,那么自然把破曹的首功给了诸葛亮。

曹操确是抄小路败走华容道,刘备、周瑜两军则“水陆并进,追操至南郡。”而演义则写诸葛亮在华容道上三次设伏,让本来智力过人、用兵出奇的曹操,成为诸葛亮股掌玩物,使诸葛亮在赤壁大战这场充满谋攻的智力竞赛中成为拔头筹者。

关于“三气周瑜”,历史上本无此事,而周瑜的真实形象不但不属小肚鸡肠之人,反而“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起初,程普自恃功高年长,瞧不起周瑜,并多次凌辱他,但周瑜“折节容下,终不与校”,感动了程普。“普后自敬服而亲重之,乃告人曰:‘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时人以其谦和服人如此。”具有这样大雅量的周瑜怎会被气死呢?

在演义中,诸葛亮一气周瑜,是在赤壁之战后孙、刘、曹三方争夺南郡之时。其实,对南郡的争夺,仅是孙、曹二家之事,诸葛亮根本未参与过。而罗贯中不但把

诸葛亮生扯进去，而且使其成为最终的获胜者。你看，周瑜误入圈套，曹仁又中埋伏，周瑜、曹仁之间你争我夺，到头来都在诸葛亮的掌握之中。

诸葛亮二气周瑜，是刘备在吴招亲，罗贯中让诸葛亮给赵云揣上的“三个锦囊”，不但使这幕戏变成了一场妙趣横生的谋略战，而且也使诸葛亮的才智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关于孙、刘联姻，在历史上确有其事，仅有“进妹固好”等数语，而演义中，诸葛亮第一个锦囊使刘备“洞房续佳偶”，第二个锦囊使刘备摆脱声色重返荆州，第三个锦囊则使刘备平安脱险。最后，诸葛亮又巧布埋伏，把东吴追兵打得大败，给后人留下了“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笑料。

诸葛亮第三次气周瑜，是在周瑜欲取荆州的阴谋败露后，调兵“誓取西川”时。周瑜大军行至巴丘，诸葛亮致周瑜一信，劝其顾全大局，别再劳师远征。在进退维谷中的周瑜，仰天长叹：

“既生瑜，何生亮”，最后气绝而死。这还不够，罗贯中又让诸葛亮冒杀身危险前往东吴吊孝，使气度非凡的诸葛亮和胸襟狭小的周瑜形成鲜明对比。

诸葛亮的摆八阵图退敌，是在西川看了马良绘制的蜀军700里扎营的地图之后，便料定蜀军必败无疑。他对马良说，刘备若败，可速往白帝城躲避，我已“伏下十万兵在鱼腹浦矣。”而这“十万兵”即是八阵图。后来，这八阵图果然使陆逊迷失其间，若无诸葛亮的岳父老丈引路，恐怕会死在里头。其实，从历史的记载来看，八阵图不过是诸葛亮当时操演军士的训练方式。几堆迷迷离离的石头，怎么可能会杀气冲天、比拟“十万精兵”呢？

刘备死后，诸葛亮尽心辅佐幼主刘禅，治理蜀国，使蜀国政治清明，经济发展，人民过着安定的生活。在安定少数民族后，诸葛亮又兴兵北伐。从227—234年，诸葛亮共北伐六次，即通常所说的“六出祁山”。六次北伐中，诸葛亮虽然取得了两郡地方，打了一些胜仗，但始终没有击破魏主力，达到“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目的。到234年8月，诸葛亮积劳成疾，病死在五丈原（今陕西郿县西南），年仅54岁。

这一段史实，在《三国演义》中均有描述，还特地从中插入“空城计”和“死诸葛吓走生仲达”的故事，



古隆中

给诸葛亮头上，增添了一道更迷人的灵光。

关于诸葛亮的空城计故事，史书中并无记载，《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的郭冲《三事》中虽有记述，但裴指出其伪，但在三国这段历史中，却有两个人使用过这一计谋，一个是刘备的大将赵云，另一个是魏将文聘。在这里罗贯中又采取移花接木术。

“死诸葛吓走生仲达”的故事，史书也无记载，而演义中却对此大加渲染。又一次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料事如神和使对手闻风丧胆的谋略家形象。

“出师未捷身先死”，罗贯中也只能遗憾地停笔。至于罗贯中为什么要给诸葛亮蒙上这层神的面纱，诸多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都挖空心思地探讨过。著名作家聂绀弩先生曾指出：“封建统治需要忠臣，远过于需要明主。没有明主，只有忠臣，江山还是江山；只有明主而无忠臣，这明主就可能寸步难行。忠臣如此重要，但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臣，不如如有熟知天文地理、过去未来无所不知、能文能武、足智多谋、呼风唤雨的忠臣，更不如如有两者结合掌握全局大权的忠臣。《三国演义》既以蜀为正统，它就需蜀国有这样一个大人物，需要这样一个典型，而蜀国恰有这样一个诸葛亮。”

聂老这段话，或许更有助于我们在揭开诸葛亮的神的面纱后，更清楚地认识历史。

（责任编辑：刘家驹）

一支人民解放军工程兵部队，同人民一起把边陲小镇建成了一座世界瞩目的伟大城市。如今，他们已脱下戎装，穿上西服，迎接着一个新的世纪。

他们在深圳 开了一条血路

● 张正隆

掉海里了

从1979年底开始，两万基建工程兵奉中央军委之命，乘坐一列列军列，从辽宁、陕西、安徽、贵州、湖北，相继驶向深圳。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一批批赶到深圳的基建工程兵人没有这种感觉，他们仍然像过去战斗在深山老林一样，把一个荒芜的边陲小镇进行改换天地。倒是深圳河那边的那个世界灯红酒绿，富得叫人不可思议。他们看重的是这个邓小平圈地设计的这块大工地，这就不能不使他们激动而又亢奋。他们走南闯北，久经沙场，什么样的战阵都见过，什么样的硬仗都打过，可没见过要他们在这里构建一个特大的城市。凭着以往的光荣和骄傲，他们要在这里大展英姿，拓出一片崭新土地，与深圳河那边的那个世界一比高低。

两个师组成一个指挥部，负责施工的副总指挥王炬，穿双高筒水靴，白天晚上逐个工地转。市政府大楼，电子大厦，微波大楼，政法大厦，一幢幢大楼拔地而起，一双双靴子没了模样。一天3顿饭走到哪吃到哪，实在太晒了，随便钻进个工棚眯一会儿。那时没有星期天，也没有节假日。

1983年夏天，一场台风把工棚、帐篷刮翻，狂风暴雨，黑灯瞎火，官兵们嘶喊着死死抓着帐篷，按住身边能按住的任何物件。动作慢点，那帐篷什么的就飞上天去。十六团一营长张敬东，用背包绳把妻子和两个孩子捆在床上，指挥全营加固工棚。一夜之间，深圳80%的工棚被毁，损失几百万元。

就在那场台风袭击深圳后不久，两万基建工程兵就地转业，基建工程兵指挥部变成了深圳城市建设公司，所属7个团成了属下的7家分公司。这就是如今著名的深圳建设开发（集团）公司。团长成经理，政委为党委书记，营、连依次成为部门经理、书记。当官兵们发现他们在向着庄严的八一军旗敬了最后一个军礼后，失去的可不仅仅是那两面红旗和一颗红星。

用今天的话讲，他们发现他们一下子就掉进海里了。

没活干就没饭吃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与试验场，计划经济下的指令性任务没有了，代之以激烈的市场竞争。

这支从战斗队到工作队的人民解放军，总是习惯了一声令下、指哪打哪，现在有些不适应了，他们努力按市场经济法则去尝试，去投标，却屡投不中，屡战屡败，问题是他们不是败在那些一流建筑队伍手中，而

是栽在昨天他们批判的多如牛毛的小生产者——民工建筑队手下，栽在那些财大气粗、到处以钱铺路的包工头手里。

某住宅工程开发公司负责的翠苑小区18幢住宅楼，招标、投标单位全是来自福建、广东的民工队，非他们莫属。

市政府有关领导直接干预，把黄木岗工程给了基建工程兵人。哪知有工无款，还是干瞪眼。

某电站水库土方工程招标，已任市基建办主任的王炬，亲自带人去帮助竞争，人家却早把那工程内定给吉林一家施工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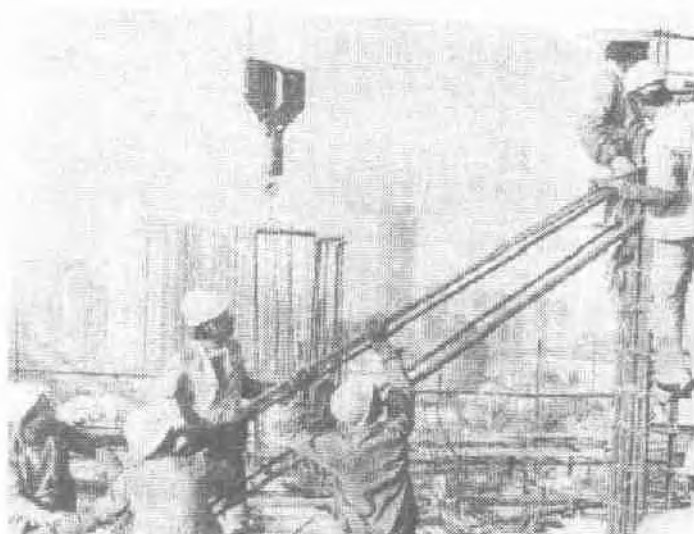
与此对应着的，是那些无孔不入的“介绍人”、“中间人”。这些手眼通天的人物主动送货上门，神秘而得意地抖着一份份盖满各种公章的合同书，只要给他总投资额3%到8%的回扣，那几百万、上千万元的工程就是你的了。

原三〇四团团长沙、现市建五公司经理李全忠，一个彪壮的中州汉子，拖着双患关节炎的腿，从城东到城西跑了几个来回，拿到份一千多万元的工程协议书。好事来得太轻易，他有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他不喜欢把人往坏里想，立即组织人通宵达旦地审图纸、看现场、做预算、备材料。果然，就在这当口，中间人发话了：李经理，是不是给点“茶水费”呀？

公司停工，上千张口等着吃饭！李全忠咬咬牙：行，你给开张收据吧。心里话：天塌下来就砸死我一个人吧！

中间人惊愕得像见到了外星人：收据？你有没有搞错？！

给回扣已经错了，再没收据，无法做账，不就等于他李全忠贪污了这笔巨款吗？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茶水费”3个字，不懂这“茶水费”是不留条、不留字的，更别说



拔地而起的市中心高楼群

收据了。而这位中间人也有自己的行规，即坐地户不收，国营企业不收。他们这种行当最理想的对象，就是那些忽聚忽散，来无踪、去无影的民工队。

无论今天应该怎样看待这些“茶水费”收取者，他们都是必然要出现的，在深圳这片中国最早出现的市场经济之海上，共和国公民中最早为此付出代价的，就是深圳的这些基建工程兵人。

三〇四团原是基建工程兵的一面红旗，全军18年行政管理先进集体标兵之一。在贵州，他们曾创下同行业产值、质量、建筑面积最好成绩。他们来到深圳后，雨中日夜奋战，仅用4天半时间就保质保量完成雅园宾馆地基土方工程，港方经理感叹不已：这么大的工程，这样的施工条件，这样短的时间，就是香港最强的施工队也拿不下来呀！昨天，国家兵国家养，今天，他们像建筑工人一样，没活干就挣不到钱，挣不到钱就吃不上饭，现实生活法则就是这样无情。

如今深圳最有实力的房地产公司之一的长城发展公司总经理

梁正兴，刚到深圳时是团预算股代理股长，所在团翻牌为机电设备安装公司后，为预算科长。他大年初三就出去找活干。第一项工程是给海关挖电缆沟，他带着电机和土建两个连队一天就干完了，挣回了3万元，还挣了一顿免费的午饭。他当场给每个战士奖励了3元钱。土建连长、一位比他大8岁的关西汉子，临别抓着他的手不放：梁股长，再有这好事可千万别忘了我们呀！

地处红荔路西端的华新小区，光秃秃的红土地上枯立着9幢7层宿舍楼，聚集着6千多名基建工程兵人。原来为一个个小家庭设计的套间，现每单元就挤进10几、甚至20多人，客厅被分隔成卧室，过道架起双层床，连水池上也架上了床板。成天没活干，除了在那鸽子笼里甩扑克、压床板，他们还能干什么？上街逛商店？那不但需要钱，还得耗费力气，一些人打扑克赢了的喊叫都显得有气无力，连压床板都直冒虚汗，有个老兵连续5个月没活干了，每月只有借支的50元生活费。在深圳，50元意味着什么？只不过是那53层国贸大厦旋



建设中的蛇口工业区

转餐厅里的5瓶可口可乐，而他还得将其中一大半寄回老家，养活妻子儿女。他就那么在床上躺着，头两天还看看书，后来连眼睛也懒得睁。同室战友问他怎么不起来吃饭，他说病了，不想吃。第6天他已经说不出话了，只是那鼻孔还在喘气。在华强医院急救室，他被葡萄糖注射液唤醒了，干裂的嘴唇艰难地蠕动着：我没病，就是饿，给点饭吃就行了……

由十六团部分官兵组建的南洋工程公司，曾发生“抢饭事件”。先是10几个人涌进食堂，接着越来越多，拿起勺子就盛饭打菜。可他们毕竟曾经是军人，抢饭之后觉得不对，成群结队赶去市检察院“自首”。他们问检察院的同志：我们几个月没活干，没钱买饭票，抢饭算不算犯罪？

一天晚上，突然停电，华新小区顿时被黑暗吞没。不知道第一声吼叫和脆响出自哪幢楼的那个窗口，随即人们涌向阳台、窗口，爬上楼顶，几乎不约而同爆发成一片狂吼乱叫，砖头、酒瓶、罐头壳等雨点般砸下，整个小区陷入歇斯底里的

喧啸之中。附近居民吓坏了，警车紧急出动，面对现场又无从下手。直到重新来电，骚动才逐渐平息。

有人说华新小区就像个火药桶。那些拖儿带女的基建工程兵又像什么呢？

这些被称为“家属”的军人妻子，像她们多少年来南征北战的丈夫一样，已经习惯了那种吉普赛人似的漂泊。未随军时，妻子和丈夫每年候鸟似的各自往返聚会一次，随军后丈夫依然哪里需要哪里去，把她们扔在家属基地守空房。而今，这些和丈夫一起住在工棚、或鸽子笼里，直到笔者采访时还以军人习惯被称呼为“家属”的女人和他们的儿女，已经就是这深圳人了。比例最高时，3个深圳人中，就有一个是和他们和他们的儿女。踏上这片土地，她们也像丈夫一样看到的是个热气腾腾的大工地，但作为女人感触最深的，则是从此将告别孤独、空寂，这个家终于有了锚地，身边有个实实在在的丈夫了。她们没像后来者那样揣着个流金淌银的梦，就是到这深圳来淘金、发财的，可又有谁曾想过会落到这步田

地呀！干了半辈子建筑的丈夫在这个大工地上竟然没活干了，倒要靠她们挣钱养家糊口了，而那些根本没活干的家属，有的只好拖儿抱女去市场垃圾堆，去郊区菜地，捡菜帮、菜叶子。

有人吃了喷过农药的菜叶，一家4口全部中毒。

特区是什么？

那时，中国还没有“下海”这个词。就是有，那意义也与今天全然不同，而且被限制在很小的行业圈子里。当基建工程兵人突然发现眼前这个热气腾腾的大工地，原来是一片波翻浪涌的市场经济的大海时，就被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一巴掌打了个趔趄。而初始阶段法律、制度不健全，改革配套措施跟不上，造成的混乱、无序，就使那打击愈发沉重，愈发使他们踉踉跄跄，苦不堪言。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历史就开始酝酿这场阵痛了。10余年后，这场阵痛波及、震动了整个共和国。深圳人理所当然地最先迎接了这场阵痛。而深圳人中最先承受这场阵痛，并终于在这场阵痛中分娩出一个全新的自我的，是这些从未在血火硝烟中冲杀过，却在这血色的南国土地上建立了殊勋的基建工程兵人。

两万基建工程兵人中，如今的市长助理王炬，是进入角色最快的。这不仅是因为他的职务使他能够较早地看到那些红头文件，更在于他的学识、才干、气质和个性。

这位西安冶金建筑学院本科高材生，1966年毕业于赶上“文化大革命”，第二年才分配到基建工程兵。先在酒泉钢厂搞基建，然后到本溪参加本钢会战，又转战北京改造首钢。唐山大地震，星夜驰去抢险，重建唐山钢厂。唐钢恢复生

产，又挥师新疆八一钢厂。最后一站是马鞍山钢铁公司，他就准备在那里落地生根了，因为中央军委已决定基建工程兵就地集体转业了。就在这时，一声令下：部队准备开赴深圳。

他习惯地翻地图，结果即便是在1:500万的广东省的地图上，也没找到“深圳”两个字。他知道深圳是特区，这特区什么样儿？“特”在哪里？只知道离香港很近，近在咫尺。特区为什么要建在这个地方？这个陕北洛川娃子总忘不了那片生养他的黄土地，总想着那个叫“延安”的地方。当年热血青年奔赴延安，如今让他们去深圳，去与香港一河之隔的那个地方建特区。这么想着，他就觉得好像能明白点什么，“特区”两个字无形中就有了魅力。

有人的意见恰恰相反：那种地方可去不得！离香港那么近，灯红酒绿，香风臭气，跳扭屁股舞，将来在那转业安家了，连孩子都学坏了。

直到笔者采访时，这位有那么多次机会却从未带夫人去过一次香港的市长助理，有时还想：有人对资本主义怎就那么害怕，唯恐躲也躲不及呢？

从技术员到工程师，由排长、连长、营长而团长，马鞍山人慧眼，看上了这位出类拔萃的军人。马鞍山钢铁公司要留他当经理，市政府那里则给他准备了一顶副市长的乌纱帽。如果非此不可，他没说的。如果征求他的意见，他这次就是要去深圳，去特区。即便是在后来深圳那些最难熬的日子里，读着当了马鞍山副市长的团参谋长的来信，他也没为自己的选择后悔过。这个在黄土高原的窑洞里长大的孩子，对新事物，对明天的世界，有着一一种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向往和激情。

他永远也忘不了黄土高坡上至今还是生养他时那副模样那个小山村，永远也忘不了那些有劲无处使、饿得昏迷的、抢吃的战友，永远也忘不了那些要饭的、在垃圾堆上捡菜叶子的家属和孩子。

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后，他到市建设公司当副经理，第二年提升为市基建办主任，从此就被推到深圳这个“大工地”的第一线。这还是当年南征北战时的那些大工地吗？这是海，是他此生还从未涉足过的市场经济的大海呀！神州大地始于深圳的土地有偿使用，哪项举措的酝酿、出台和运用没有风险呀！搞房改有人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一次土地招拍技术细节出点毛病，一个车皮来的老战友差点儿和他对簿公堂。生活没给特区准备一页现成的皇历，举手投足都是荆棘、荒莽，他就不能不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可特区是干什么的？如果不改革，不敢付出代价，还翻老皇历过日子，他还来特区干什么？

采访中，这位从当年的陕甘宁“特区”走来的黄土高原的儿子，深情而激动地背诵着邓小平同志关于“杀出一条血路来”的那段名言。

没人说今天在深圳没拿到“绿卡”的就不是深圳人，也没人说没经历过基建工程兵人那种苦难的就不是深圳人。就是那些临时在深圳打工，觉得赚够钱就炒老板鱿鱼，回到内地家乡的，生活命运把他们聚拢到这片南国的红土地，也每日每时在为特区的开发建设做着贡献。但是，那些当年在台风暴雨夜死死地拽

着帐篷，或是茅棚被台风卷走，就在那风雨夜瑟瑟发抖的深圳人，那些没活干，吃不上饭，去街头讨饭，用菜帮、菜叶子糊口的深圳人，与今天一脚就踏进一座现代化都市的深圳人，是能够一样、可同日而语的吗？今天那些把去南方、去特区视为“下海”的同义词、或代名词的人，与当年毫无思想准备就被卷进市场经济的大海，猝不及防就被呛了半肚子水，险些被潮浪冲上岸的人，对特区的理解能是一样的吗？而这些被称为“拓荒牛”的深圳人，就是在这艰苦卓绝的开拓、搏战中，体味到“杀出一血路来”的沉重，理解了特区是什么。

太平洋变成了蓝色的桌子

1984年9月15日，恰逢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一周年之际，长城房地产发展公司诞生了。



豪华的花园别墅

地处深圳市腹地的白沙岭，沟沟纵横，荆棘丛生。那自盘古开天以来的洪荒稍稍被触动了些的，是那沟边，山包稍微平坦、干燥处，用茅草搭起的一排排工棚。那是基建工程兵人的栖身之地。

如今，白沙岭西区28万平方米土地，矗起了一座梦幻般的气势恢宏的“长城部落”。从18层到38层的一排排长城大厦，以及一批配套设施和公用建筑，形成一组别开生面的高层住宅建筑群。陆续竣工的长城大厦1至9号楼，已经容纳万余居民，还在兴建中的正逐日增高。笔者在深圳的20多天里，就住在长城大厦3号楼里。

8年前，当公司经理张立凡和经营部长梁正兴等人，第一次踏上这白沙岭时，秋风萧瑟，山野浮沉，耳边骤然响起的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

只打声招呼，那些工棚的主人就卷起铺盖走了，连搬迁费都不要。都是坐着闷罐车来的，都是有劲没处使的穷哥儿们。这些还穿着当年的工装，或是没了帽徽、领章的军装的特区人，无论各自的公司挂的什么牌子，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长城人！”

长城大厦1号楼拔地而起！

这幢长254米，高18层，有504套住宅单元的大厦，是我国目前建筑的最长的住宅楼宇。白色的楼体，自下而上在顶端形成的箭楼般的造型，即便路边楼侧墙上没有“长城大厦”4个粗放的大字，也能让人一下子就联想到那逶迤万里的巍峨的长城。

出手不凡的长城人，却眼看着要破产了。

1985年，1号楼主体施工顺利进行，2号楼基础工程也已完成，深圳的调整改向期骤然间来临了。

银根紧缩，房价徒落，大片落成的楼宇空置难售。长城人千辛万苦从北京、湖北、河南、浙江、宁夏、辽宁等省市区筹集的两千万建设资金，这时纷纷要求把资金调走。不仅如此，因工程基本停工，还要向买楼的订户赔偿违约损失。

风雨中，长城大厦1号楼主体建筑像一艘战舰搁浅在白沙岭上。雨水在周围红土地掘开的管道沟里南流北淌，就像从那巨大的躯体上流出的血。

满嘴燎泡的张立凡，蹲在工棚水淋淋的地上啃面包，望着雨中模糊的楼体喃喃自语：钱哪，钱哪，钱！……

这位长城人的第一任老总，一面动员施工单位垫付工程款，一面带着梁正兴去银行千方百计争取贷款。而长城人这期间的工资，是靠那些经常去捡菜帮、菜叶子的家属们办的小工厂挣点钱，才多多少少发出点维持生计。用今天的老长城人的话讲：我们这些5尺高的汉子，是靠女人的手扶持着才挺过来的。

长城人的第三任老总梁正兴说：现在我签个字，财务部长去银行就把款贷来了。那时不行。一是国家控制基建投资；二是咱没实力，没实力就没面子，张总出面也不给面子。不给面子也得豁出面子去找、去求，不然就没活路啦！一天早上不到7点钟，我和张总就去一家银行信贷主任家门口等着，9点多钟那主任才出门，眼睛红得像兔子眼睛似的。他下半夜才从北京开会回来。没想到我们不认识他，他倒认出了我们，说头两年全市基建红旗第一名不就是你们吗？他一口答应：像你们这样的公司，要是贷款都收不回来，我就辞职不干了。

长城大厦1号楼，在白沙岭上

扬帆起航了。

凭着长城1号楼赚下的800万元，长城2号、3号、4号、5号、6号、7号、8号、9号陆续竣工，交付使用。白沙岭上，长城巍峨，舰队远航。

曾率3个团赴深圳的基建工程兵三十一支队副政委刘更申，笔者采访时为市建设（集团）公司董事长。这位1951年入伍的老兵是个诗人，已经出版了4本诗集。就在基建工程兵人最困难时期，为了一家企业的外资股份转让问题，他与香港一位蓝眼睛的英国商人进行了一场5个月的马拉松谈判，连续谈判12小时就达8次之多。谈判结束那天晚上，这位为国家赚了3百多万港元的从军营走出来的企业家，诗兴大发，一首《谈判》一挥而就：

开放之路/缩短了中国和美洲的距离/波涛万里的太平洋/变成了蓝色的桌子

桌面上，尊严对尊严/希冀对希冀/两个方案/筑起一道阻碍合作的大堤

一个喝着咖啡/老谋深算探心意/一个品着龙井/不卑不亢表心迹

绕过暗礁/拨开迷雾/双方同时发现/龙井和咖啡有着相似的主题

于是，交换了杯子/各自品尝对方的口味/一座彩虹般的友谊桥/在双方心头同时架起

“太平洋变成了蓝色的桌子”，这博大雄浑的气概和意境，不正是今天中国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形象吗？而“交换了杯子，各自品尝对方的口味”，这貌似普通的句子又是旁观者能够轻易得到的吗？

（责任编辑：刘家驹）



李兆麟

义勇军 攻打 沈阳城

● 王忠瑜

日本侵略者不曾料到，占领中国东北不到一年，白山黑水间蜂起的数十万抗日义勇军，一下把他们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

侦察员韩海山，打听到沈阳城里的大部分关东军在八月十五之前，分头开赴锦州、盘锦对付那里的抗日义勇军，沈阳已空虚，他立即赶到浑河堡向司令林子升报告，又赶到小堡向总指挥李兆麟报告。李兆麟随同韩海山去浑河堡见林子升，两人一研究，决定立即通知各路义勇军首领齐聚浑河堡开会。

来参加会议的有林子升所率领的“辽南抗日义勇军”的各团团长，有“第二十四路抗日义勇军”的燕子队、长江队、天地荣队、于志超队、平日队各团长，还有抗日山林队的“三胜”队“老北风”队等首领。

会上一致决定，八月十五拂晓进攻沈阳城。公推林子升为总指挥（林原是沈阳很有名望的豪绅，“九·一八”事变之后，他捐出全部家产，组织了一支很有实力的抗日武装——辽南抗日义勇军）李兆麟为副总指挥。各队具体布置是：燕子

队、平日队三千余人，攻打东门和东塔机场。因有浑河阻隔，须由林子升部队事先强占浑河大桥，派队引导通过大桥直奔东门，这一队由李兆麟亲自指挥；林子升部队攻打大小南关；长江队和天地荣队、于志超队四千余人攻打西路，由崔恩甲指挥；“三胜”、“老北风”队三千人攻打北路。由于攻打沈阳是抗日义勇军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闻讯前来要求参加攻打的山林队、地方武装很多。合计起来，大大小小的队伍有数十支，共约一万多人，真是浩浩荡荡。而且沈阳城内早有李兆麟通过韩海山、吴锡伯的联络，策动了满洲国靖安军里的几个连队反正，攻城时作为内应。双方约定义勇军和起义军每人手臂上系一条红布带作为联络记号。

八月十五这天，晚间下着小雨，雾很大，义勇军各队开始了行动。约定第二天拂晓，由四面同时攻打沈阳，直打到沈阳的中街十字

街口会师。

天刚拂晓，冲锋的号声四起，攻城战打响了。

沈阳城内的守敌——满洲国军和日本关东军尚在梦乡中，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抗日义勇军敢来堂堂皇皇地攻打沈阳城。一听攻城的号声、枪炮声突起，敌伪军们才赶紧爬起来仓促应战。而攻城的义勇军部队，已经进入城内。

林子升的主力，首先攻打大小南关，遭到了伪警察所的警察和一队伪军的抵抗，义勇军的官兵奋不顾身，一股作气冲过去，打死了十多个敌人，其余的敌人都被缴了械，大队人马攻进了城里……

这边，李兆麟、沈宝林率领燕子队、平日队，没有立即攻城，而是先打东塔机场。一接近机场，便遭到由一个日本少佐指挥的日军顽强的抵抗。炽烈的火力，打得义勇军不敢抬头。部队在机场外受阻。李兆麟心里非常着急，他怕机

场久攻不下，延误了攻城的时间，破坏了攻城的计划。便让沈宝林组织猛烈炮火正面进行攻击，他率领一个小队，迂回到侧面进行强攻。此时敌人守军的火力集中在正面。李兆麟手举匣枪，带队迅速地冲了过去。等到敌人发现，他们已到近前，未等敌人的火力转过来，勇士们一排手榴弹扔过去，炸得敌人鬼哭狼嚎。沈宝林趁此机会，指挥主力部队涌进机场。日本守敌，一个也未逃掉。

一进机场，李兆麟让沈宝林率队去机库和跑道上烧飞机，他带领这个小队直奔机场的无线电台，他怕敌人通过电台调来援军，进行反扑。

当李兆麟率队冲进机场电台时，几名日本的报务员正在电台前向日本关东军的总部呼救，李兆麟举起匣枪，一梭子弹便把敌人的报务员打倒了，他上去就把几根电线扯断，破坏了电台。接着，他又率队向机场冲去。

此时，沈宝林已命令整个部队和平日队一起，搜索整个机场，消灭零星抵抗的敌人，把各类缴获品集中到一处，马上组织随军进来的马车队抢运出去，然后放火烧了机库，也烧了停放在机场跑道上的飞机。

一时，机场上黑烟滚滚，烈火照亮了半边天，爆炸之声不绝于耳。他数了一下，一共烧了大小敌机 28 架。

机场搜索完毕，沈宝林、李兆麟立刻率领主力，向东门跑步前进。此时沈阳城内，枪炮声像煮粥似的响着，显见战斗的激烈。毫无疑问，敌人已经从仓皇中清醒过来，正进行顽强的抵抗。

李兆麟一边跑着一边对沈宝林说：“城里我已经有了安排，靖安军里有了吴连长和王连长，我已经



抗联仓库

策动好了。只要我们的队伍一攻城，他们就马上起义，来个里应外合。”他让沈宝林检查一下部队每个人是不是戴上了红布条，而且下令攻城时，遇见戴有红布条的伪军，不再射击，可以喊话联系。

燕子队和平日队跑步进到东门时，伪警察局的小股警察抵抗了一下，一触即溃。李兆麟乘胜喊起口号：“弟兄们，打到中街去！”

数千人发出同一个口号：“打到中街去！”

声音此起彼伏，震动了半个沈阳城，街民们一看是抗义勇军进了城，都涌出来拍手欢迎。

燕子队一路冲锋，直奔中街十字路口。谁知刚到达钟鼓楼，又遇到了伪军的抵抗。敌人居高临下，占了优势，沈宝林带领前头部队隐蔽在街道两旁的商店屋檐下，给予猛烈还击。打着打着，忽然从身后一条街里又冲出一队伪军，向他们奔过来。沈宝林有点慌张，即刻过命令一支小队迎上去堵住他们。李兆麟一看，过来的伪军一个个右臂上都系有红布条，忙叫：“别打！别

打！”他借着街道旁商店前的门垛的掩护，急忙跑过去，伸出头去大声问道：“来的是哪一部分？”回答是：“靖安军！”

“是吴连长吗？”

“不，王连长！”

“啊，王忠义！我是李烈生！”“啊，李先生，一家人！”说着，那边走出一个戴大盖帽，背武装带，穿着带有红袖头的伪军军官来。

李兆麟一看，果然是靖安军的王连长，便跑过去和他紧紧地握着手。

“吴连长他们呢？”李兆麟问。

“给截住了！”王连长说，“我们一大早听到枪声四起，又接到上面出击的命令，就知道你们已经攻城，没等大部队出动，我们将计就计，便把队伍带了出来。等到吴连长要把队伍往外拉时，日本人发觉不对头，就把他们给截住了。很快，日本人就带着大部队出动了，吴连长他们已经出不来了。日本人还调来了坦克车……”

“啊，还有坦克车？”李兆麟听了心中一动，知道如果再耽搁下

去，就会遭到日军主力部队的反击。他赶忙命令紧跟在他身边的警卫卫江山，去把沈宝林和平日队的队长赵俊峰叫过来，三人一商量，决定绕过钟鼓楼，迅速打到十字街和林子升部队会合。

这时，林子升的部队在攻进大小南关后，攻占了敌人的仓库，缴获了不少的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还有大批的粮食，当即装上带进城来的几十辆大车往城外搬运。马车队装满了，又组织队员扛运，扛运不了的，就发动老百姓来扛来搬。把几座仓库，搬了一空，然后放大火烧起来。沈阳城大火烛空，全城老百姓欢欣鼓舞。

当燕子队到达十字街口时，林子升部队也到了，两支部队在敌人的心脏里会合了，几千战士高兴得举枪欢呼，欢声震动了整个沈阳城。

这时，李兆麟和沈宝林、林子升以及刚才起义的王忠义连长聚在一起商量下一步的行动。有人主张，既然是打进了奉天城，那就要不顾一切的固守。有的则认为现在的军力单薄，敌人又有坦克车，不宜固守，更不宜久留，应该立即撤出。争执不下时，林子升特地征求李兆麟的意见：“烈生兄，有何高见？”

李兆麟沉吟了一下说：“我觉得，第一，我们现在是孤军深入，西面北面的友军都没有进来，力量是单薄的；第二，敌人配备了坦克，实力远远超过我们；第三，我军没有后勤供应，而且城内地形我们不熟悉，又无险可守，要跟他们硬拼肯定是要吃亏的，咱们打的是游击战，应该马上撤走……”李兆麟的这一意见，完全吸收了上次在全家洼血战的教训：装备差，又无良好训练的义勇军，绝不可与装备现代化、训练有素的日、伪正规军进行

正规作战。

正说之间，派出去侦察的几个小分队已经回来，报告说义勇军西北两个方向的攻城部队都受到了阻碍，未能如期到达，有的已经撤退。敌人凭借他们的电讯和机械化的先进作战工具，大量援军已经从安东、大连、长春几个方面开过来了。最紧迫的就是敌人从外围调来的援军从柳条湖、莲花池等地纷纷向沈阳靠拢，企图全面包围我军。

根据这样的情况，刻不容缓，李兆麟立即建议各部队迅速做一些宣传工作，把带来的宣传品——传单、标语等散发给群众，把缴获的枪支弹药分给各部队，立即分头撤出沈阳，仍在浑河堡集合，然后再决定下一步行动。撤退时由燕子队负责掩护。说话之间，敌军的前哨部队已经出现，坦克也远远地开过来了。

队伍刚一后撤，敌人依仗他们的雄厚实力迅速追击。沈宝林、李兆麟率领燕子队且战且走，十分紧张。

敌人凭借机械化来得很快，义勇军人多队伍杂，撤退来不及，终于在过浑河时让敌人尾追上了。义勇军便在浑河桥头，和日伪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义勇军终因火

力比较弱，遭受到较大的伤亡，死伤在二百人以上，不得不仓皇地撤过浑河。

敌人也因情况不明，不敢继续追击。这样义勇军才得以安全地撤走。但是四面都有敌人的援军，义勇军撤向何处呢？经过几个头头的商量，决定取道抚顺、清原，撤到长白山里去，与活动在那里的杨靖宇领导的游击队会合。

浩浩荡荡的义勇军队伍，在李兆麟、林子升等人的率领下，攻下了抚顺、清原，但是却在海龙一带遇上了伪军东边司令于芷山部队的拦截，又遭到一些伤亡，不得不又退了回来，可是后面归路又叫日军堵住了，只好经由新宾、凤凰城，撤到岫岩、摩天岭一带山地。许多定义义勇军又回到他们原来活动的地区，林子升的部队仍回歪头山一带，李兆麟和燕子队、平日队又回到辽阳东部高家堡子和刘家堡子一带。

这次打沈阳。战果影响很大。几天之内，消息像长上了翅膀一样传遍了东北各地，震惊了日本侵略军，使广大人民得到了很大的鼓舞。

（责任编辑：刘文）



在森林中的抗联战士们

他曾和朱德相依为命，红四方面军来到川北，张国焘竟把他处以极刑……

朱德的大哥 朱代历之死

● 陈兆平

1960年3月10日，阳雀啼唤春光的时节。朱德元帅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四川仪陇。在视察药铺垭小学时，他向身边的侄儿问道：“那‘犀牛望月’还在不？陈家湾是哪个方向？”随着侄儿手指的方向，他久久地凝望着……

他想起了童年的时光，想起了他的大哥——

那天，大哥又来学校接他回家了，先生还在上课，大哥独自一人站在窗外雨地里，等候着他。放学了，大哥将斗篷戴在他的头上，自己淋着雨，一身衣衫全部湿透，母亲心疼得直数落大哥不多戴个斗篷，大哥却一边解衣衫一边哈哈地笑。大哥每天都要接送他，因为从家里到学校要走一条小路。小路藏在密密的森林中，林中常有野狼出没，大哥常背着他走，这时，他便像一只松枝上的红松鼠，在大哥背上又唱又动，逗得大哥直乐。

1895年除夕的夜晚，是他家欲哭无泪的日子。地主要在他家租种的土地上加租子，不然就要退佃、搬家。父母和长辈们都急得没有了主意。最后，争来争去，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分家。就在这个家家户户快快乐乐吃团年饭的夜晚，好端端的一家人，便活活地给拆散了。他拉着大哥的衣衫，哭着说：“大哥，我要跟你一起走。”初谙世事的大哥拍了拍他的头说：“三弟，听话，我和爹娘会来看你，你也要常来陈家湾呵！”他跟着伯父朱世连走了，住进了大湾（今朱德旧居），大哥便随父母迁到陈家湾（今周河乡斑竹林村）居住。

到了大湾，他便被养父送到席聘三先生家念书去了。他常常想念着大哥和生身父母，陈家湾那地方好耍不？每到逢场，大哥便会出现在他的面前。他便领着大哥，到席家土碓转上一圈。到了僻静处，大哥从衣兜里拿出几个鸡蛋，悄悄地塞给他，说是娘为他煮的。他高兴得又蹦又跳，双手吊着大哥的脖子不肯下地。为了见到父母和大哥，他抽空闲时间跑到陈家湾，一家人又团圆了。大哥见了儿回席聘三先生，很是崇拜，常对他说：“席先生可真是好人呢！”是的，席先生很有骨气，学识也很渊博，只因官府腐败、社会黑暗不肯报考，连一个

秀才都不是。他经常在讲课的时候，当着学生的面大骂贪官污吏，是一个受学生尊敬的老师。

1906年，他进了顺庆（今南充市）高等小学堂和四川高等学堂（今四川大学）念书，此间大哥还常写信给他，嘱咐他要刻苦攻读，为家里争口气，并将自己节省下来的钱寄给他作生活费用……

唉，大哥的心地真是太好了！只是，大哥那年来泸州期间。因军务繁忙，没能好好地照顾。大哥生性憨厚，做事认真，在旅部作军需时，从没有出过什么差错，官兵对他的评价就是一个字：好！

朱德元帅站在故乡的风中，一直沉浸在往事的回忆……最后，他动情地对身边的侄儿说：

“大哥一生太苦，他死得太早了一点。”

朱家的祖先是广东韶关迁徙来的，在这里落户的已是第8代了。朱家座落在琳琅山下的李家湾，这是一处单家独院。由瓦顶的正房和茅草盖的耳房所组成。屋周围的风光十分秀丽，后山和两侧包拢着葱葱的树林，屋后有翠绿的竹林，屋前是一片水田。

1887年春，代历被父亲送到了家私塾上学。年幼的代历聪明伶俐，诗文出众，只因家境贫寒，买纸不易，常常用火纸和一些废纸练习写字。朱家出了个秀才，闻名于村中。1910年正月初二，村里的朱罗氏请他撰写碑文，要求以他家3个儿子团结和睦、亲如一家为主题。代历思考片刻，挥笔疾书，作出对联一付，上联是：“罗宿生辉永立三房嗣绪”，下联是：“朱门迪吉长存一线渊源”，横批是：“龙钟桥顶”。众乡亲读后，拍手叫好。石碑上的大字是朱代历亲笔书写的，笔力遒劲，至今依稀可辨。从此以后，凡村里乡亲每遇红白大事，都少不了要代历为他们书写喜联和挽联。

1917年9月，朱德担任了第2军第13旅（后改为第13混成旅）旅长，成了一名威震敌胆的战将。

朱代历决心跟三弟去从军，便与四弟代炳、五弟代均、妹夫刘兴海、许昌品等人于1917年夏天踏上了去泸州的路。透过苍茫的泸州风云，他朦胧地看到了生活

的出路。

1920年冬天，朱德奉命回师云南。他多么想同三弟一道奔赴云南，作一名真正的军人。

临行前夕，兄弟俩彻夜长谈。

“大哥，你就不要去云南了，老父老母就托付给你了，你还有家小，要好好地照顾他们。回老家去吧，那里才是落脚的地方……”

于是他告别三弟，离别泸州，携一家大小返回家乡。乡亲们仍然痛苦地挣扎在饥饿线上，他时常将节省下来的粮食用来救济贫苦农民，多则5升，少则3升。民国17年4月，久旱下雨，许明超家里已无米下锅，父亲又卧床不起。明超两次走进代历的家门不好意思开口，而代历却看出了他的来意，主动问他：“超娃子，又没粮啦！”他低着头说：“嗯。”代历说：“没来头，给你4升米。”许家5口人的性命就这样被救了下来。

1931年5月，朱代历一家移居大风场河泥坝（今大风乡同盟村），成为当地的一个佃田户。他身着粗布长衣，叼着烟锅出了东家进西家，和这一坝的农民打得火热，常同他们在一起摆龙门阵，抽自己种的叶子烟。坝东头衔燕石山上的猫头鹰“咕咕咕”地叫了好几遍了，他们才噙出了烟锅里的烟锅巴，依依不舍地离去。都是一群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还有啥事能有个照应呢？

1932年8月，莲花河发水把仅有的一座木桥给冲毁了。两岸的乡亲们只有望水叹息。大水稍退，朱代历立即雇工打石，并动员邻里乡亲及亲友一齐动手，把这桥修葺了一新。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后，身为革命军第9军副军长的朱德，给大哥代历等亲友从南昌寄回喜信和进步书刊。代历珍藏着这些书刊，夜间就着油灯反复地阅读和思考。他看见三弟真的出息了，恨不得一下子跑到南昌，再跟着三弟真的闹革命去。

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的消息传到了仪陇境内。

1933年8月23日（农历7月初3），红军攻克了仪陇城，仪陇人民欢天喜地迎接自己的军队，到处是笑声、歌声。

没过几天，红九军27师81团高科长到了大风场，组织群众，宣传红军的政策。农历8月，在刘柏林院内，河泥坝村苏维埃正式宣告成立了。朱代历被村民们推选为苏维埃主席。

这一年，朱代历已满55岁了。

也就是这一年，厄运的迷雾笼罩在河泥坝，降临在他的头上。他哪里知道，在张国焘左倾错误路线下，川



药铺小学

陕苏维埃主席熊国炳、独一师师长伍伟章、独二师师长马骏，均莫须有遭到杀害，只要有人举报，一般干部也将招至杀身之祸。

那是1933年10月的一天。代历正带领家人在地里干活。村里一游击队员匆匆跑来报告，说：“福临场的游击队跑到阮家打粮（即筹集粮食）来了，哪个办？”他想：我们并没得到上级的通知，他们哪个能随便到我们村里打粮呢？不行！他将手中的锄头往地上一摔，便随队员走进村里，阻止了来打粮的人。

哪知道，3天过后，忽然从衔燕石山下来了3个人，声称是福临场红军特务连派来的。他们走进村里，召集着河泥坝村人，说要开会。朱代历不知是啥事，也和村人们三三两两来到刘柏林院内，想看个水落石出。会上有人说朱代历包庇富人，抗拒红军打粮，他被带走了。

村民们望着朱代历被带走的那条山路，一边哭一边跺着脚说：“唉，可惜了一个好人呀！”

当天夜晚，纯朴善良的乡亲们凑了70多个银元，交给朱代历的儿子去找回他们的村主席。

朱益书找遍了福临场的每个院落，每一道山岭，都不见父亲的踪影。他一声声地哭喊着爹爹的名字，然而，回答他的却只有鸣应的山谷……

朱代历死了，他成了张国焘“左”倾错误路线下的冤魂。1957年仪陇人民政府追认朱代历为革命烈士。多少年来，故乡的人们一直在缅怀他。当年家人向朱德元帅讲了大哥朱代历的死因后，他只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有说，便默默地走开了。如今，尽管朱代历的冤案被平的昭雪，却没有一片属于他的墓地，只有在他遇害的衔包石山，每年秋天都开满金灿灿的野菊，在昭示着苦难与幸福……

（责任编辑：刘文）

一位理性的哲人

——1994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

● 王基高

大江的作品，大多是通过描绘他那一代人经历的黑暗、失落、徬徨，来鞭挞日本发动二战给人民带来的恶果。像他这样倾力关注那场惨无人道的战争的作家，在日本几乎绝无仅有。他说：“我们罪孽深重，尤其是对亚洲人民……”在日本军国主义时时想抬头的今天，他的直言不讳，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敬重。

日本小说家兼散文家大江健三郎，引人注目地成为了 1994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日本全国的书店对大江健三郎的著作，在几小时之内都销售一空。一家大发行公司东京贩卖公司说，它原有大江的 50 多部、大约 1 万册的著作，半天功夫就被抢购一空。一家出版大江著作的新潮书社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重印它出版过的 12 卷全集。

大江是获得诺贝尔奖的第八个日本人。7 年前，利根川进曾获得医学和生理学诺贝尔奖。

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在一项声明中说，现年 59 岁的大江之所以获奖，是他的作品中的“展现诗的力量，创造了一个想像的世界，并在这个想像的世界中将生命和神话凝聚一起，形成今天人类困境中一幅令人不安的图像”。

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以其特有的形象和文体，描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青年人的虚无心情，和处于核战威胁的世界。他鞭挞了日本二战的侵略行径，也为日本时下前途

担忧。

大江健三郎 1935 年 1 月 31 日出生。青少年时期，他喜读巴尔扎克和加缪的作品。1954 年考入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学习法国文学。1957 年，他给《东京大学新闻》投稿的小说《奇妙的工作》，被日本文学评论家荒正入选为五月奖的获奖作品。这部小说，被日本著名文学评论家平野谦在东京《每日新闻》的《文艺时评》专栏加以赞扬后，引起日本文坛注意。同年八月，他又在东京《文学界》、《新潮》杂志发表了短篇小说《死者的奢华》和《他人的脚》，刻画了“当代最年轻一代人略微虚无的心情。”从此他便作为学生作家，登上日本文坛。

1960 年 5 月，在全日本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高潮中，大江与开高健等人访问中国，在上海会见了毛泽东，并在北京电台发表了支持反对日美安全条约运动的讲话。

1963 年，他的长子大江光出生，但头盖骨出现异常，经治疗，仍留下弱智后遗症。同年夏，大江健

三郎参与了原子弹爆炸的有关调查。这两件事，对大江健三郎文学创作活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成名作是发表在《文学界》上的《饲养》。作品描写在太平洋战争后期，一个黑人士兵因为飞机坠毁而降落到日本一个小山村，村里的人把他看成是一个怪物，既然是生物，就要“饲养”他。慢慢地村里的人跟他平安相处，特别是那些孩子们，因为黑人的出现而获得了非常奇异的感情。该短篇小说在 1958 年 1 月获得最高奖芥川奖。那年，他才 23 岁。

与此同时，大江健三郎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新芽的冲击》，内容描写被困在一个可能发生瘟疫的村子里的孩子们，在孤独和恐怖中结成团结友爱的集体，但是，他们却受到村民的侮辱和迫害。在《在看之前便跳》中，以深刻的社会主题、出色的艺术感染力和非凡的现实主义锋芒，受到日本文坛的瞩目，成为战后崛起的新一代民主主义的代表作家。被人们誉“大江文学”。

大江健三郎的作品有着鲜明的主题，那就是表现社会、政治与人的生存状态，反映人类的困境。可以说，大江先生是受到战后民主和存在主义的洗礼后开始文学创作的。关于他的获奖理由，瑞典皇家文学院指出，他的创作深受但丁、巴尔扎克、萨特等人所代表的西欧文化的影响。在这一背景下，“遭原子弹轰炸、日本投降，以及长期被神化了的天皇的‘人间宣言’，给年轻的大江以冲击。那种耻辱催他奋起，并规定了其作品的特征。”

大江在1959年出版了长篇小说《我们的时代》。这部作品写了性欲得不到满足的颓废青年与中年娼妇的性关系，以及青年被禁锢在城市里的状况。这部作品中赤裸裸的性描写，没有得到日本社会的理解，遭到了几乎所有日本文学评论家的批评。

1960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集《孤独青年的休息》和长篇小说《青年污名》。1961年他以右翼少年刺杀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事件为素材，创作了《17岁》和《政治少年之死》两部小说。这两部作品通过对17岁少年变成暗杀凶手的描写，揭露了日本天皇制的政治制度。大江健三郎因为写了这两部小说，遭到了日本右派势力的威胁。

1964年大江出版了获得新潮文学奖的小说《个人的体验》。该作以社会政治与人性为主题，描写了一个残疾儿童的年轻父亲的心理。这是一部纪实体小说。它写了一个叫鸟的人刚做父亲，医生说的他的孩子患先天性脑疝，即使手术成功也只能维持像植物那样的生命，于是鸟想杀死孩子并与女同学私奔，但手术的结果却皆大欢喜，鸟的孩子只不过得了一般的肿瘤而已。读者从这部小说可以看出，他的畸形

儿——长子大江光对他的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他克服了在其本人和儿子身上发生的不幸，娓娓讲述了大江作为父亲的内心世界，深入地探讨了残废者如何生存，残废子女的双亲如何过生活的问题，表现出作者的人道主义襟怀。光今年31岁，由于自幼对音乐有着敏锐的感觉，他15岁就开始作曲，已出版了两张镭射唱片，一个脑障碍患者经过数十年的努力，而成为作曲家，也无疑是一个奇迹。大江认为，人类也许不可救药，而只有像他儿子这样智能失常的人才可能是最纯洁的。

六十年代，大江健三郎参加过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运动。在这期间，他有两本随笔被人广为传诵。一本是《广岛笔记》，一本是《冲绳笔记》，尤其是前者，表现了他反对核武器、核战争的坚定立场。值得一提的是，1970年，国际笔会在韩国汉城举行大会，为了抗议大会在这个言论自由受到压制的地方举行，他退出了日本笔会。1975年，诗人金芝河受到镇压，大江也为此参加绝食抗议。这次诺贝尔奖的授奖虽着眼于重视对家庭和村庄这种“小世界”的描写，但是，却再次使人认识到大江先生的目光是一直盯着核和地球环保等人类当前面临的“大课题”的。

大江健三郎还有两部比较能代表他的创作思想的重要作品《万延元年的足球》(1969)和展示现代人精神危机的《M/T和森林的不可思议的故事》(1986年)，其中《万延元年的足球》是大江健三郎的创作顶峰之作，他声称是连自己都“无法跨越的作品”。这部作品是在作者沉默了二年四个月之后发表的，终于以其厚积薄发而震动日本文坛。该作以四国的山谷、森林为舞台，描写两对矛盾——即都市

的与乡村的，欧洲的与亚洲的文化在这个“舞台”上的拼杀。作品描写在沉浮不定的生活中人们怎样寻找生存道路，集知识、热情、梦、野心于一炉，深刻地反映了在混乱世界中人与人的关系。这部作品获得谷润一郎奖，日本文学评论界对这部小说毁誉参半。1973年，他出版了描写幻想中的世界末日的长篇小说《洪水淹没我的灵魂》(上、下)获得野间文学奖。

在获得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日本政府决定授予大江“文化勋章”，但是，大江拒绝接受这项象征天皇制的政府最高荣誉，理由是“文化勋章”与战后的日本民主主义并不吻合。这位日本战后最不循规蹈矩的作家说：“我之所以辞退文化勋章，是因为我不承认还有胜过民主主义的权威和价值观。”同时他批判了日本对于战争的反省趋于淡漠的倾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快五十周年了，我希望这是重新反省对于广岛和原子弹爆炸的观点的机会，可是今天的日本不存在这样的态度。”

大江的部分作品，十年前便已被译介到我国。大江获诺贝尔文学奖后，记者采访他，他在几乎没有上下文背景的情况下说了一句出人意料的话：中国文学是非常了不起的文学。

(责任编辑：仲文)





孔林，是两千多年来安葬我们孔氏家族列祖列宗的墓地。五十多年前，日本一家商团竟想从它底下挖煤，于是打了一场鲜为人知的官司。当时的孔林之争，竟还与汶上县孔氏嫡族有着直接的关系。

汶上县，距曲阜一百余里，春秋时称“中都邑”，属鲁国。是孔子当年宰中都教化有方之地，为纪念孔子宰中都，汶上自古有孔庙、讲习堂、宗鲁堂、钓鱼台、爱仁坊、思圣堂等多处建筑。尤其汶上孔庙（称文庙）始建于唐玄宗开元十三年，比曲阜孔庙还早建二百余年。庙内设有纪念孔子上五代的“五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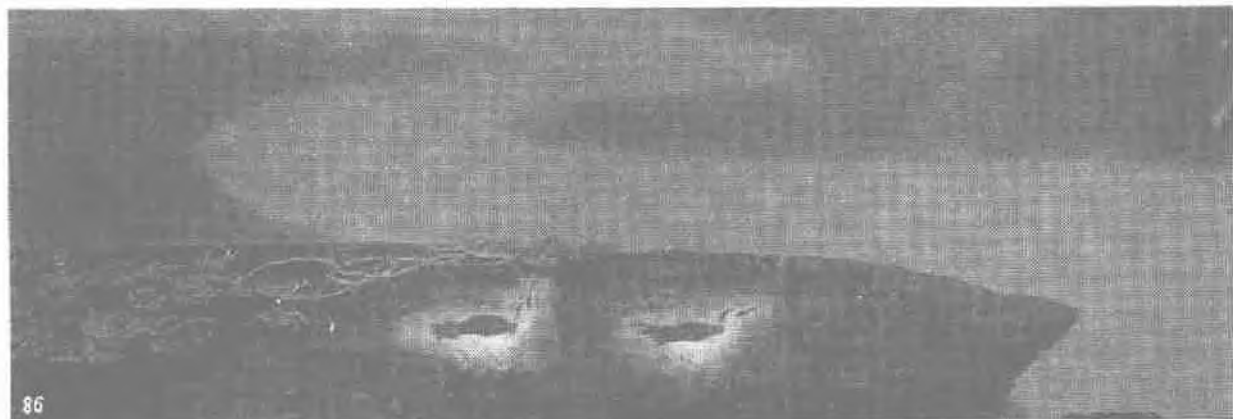
祠”（后改为崇圣祠），为汶上所独有。直到抗战前，城门上还存有昭示孔子政绩的“夫子履”（大概是后人为纪念孔子而托伪）。

在明代以前，汶上有一大批孔府的“祭祀田”，到了嘉靖年间，第六十三代衍圣公孔贞干之子尚贤娶严嵩之子世蕃之女为妻，其弟孔贞宁以严嵩父子奸权误国、丑闻素著，与孔氏联姻有损圣门清誉，力争不懈，愤而举家由曲阜迁至汶上。孔氏家族一嫡支从此在汶上扎了根，但每有丧事，都要吹吹打打发丧埋在曲阜孔林。每到清明节时，老老少少出动都要去曲阜烧纸

祭奠，因此孔林内还单辟有“汶上林”。贞宁繁衍了几大支系，至今汶上孔族很旺，仅叫孔楼的村庄就不少，还有孔村、孔庄等。

贞宁有六个儿子，明朝天启元年（1621年）长子孔尚坦之子孔衍植过继给贞干之子孔尚贤做了第六十五代衍圣公。天启四年，衍植公于汶上建了孔氏家祠。为族人祭奠祖先和族中大事聚议的地方。

长支尚坦的其他弟兄与孔府的亲缘数代不断，我是老五支孔尚睿的长子长孙之后代，下面要说的“孔林官司”就发生在第七十五代孙——我的曾祖父孔瑞唐身上。



我曾祖父孔祥冀，字瑞唐，曾任汶上县农民协会会长，至圣庙七品执事官、汶上思圣宗鲁讲习三堂奉祀官。孔瑞唐善于“说理”，在族中有一定的声望。他常去孔府走动“求帮”。

1940年秋，天气渐凉，曲阜孔庭族长孔传瑛（《孔府内宅轶事》），派人来请瑞唐到曲阜商大事：族中告急。

原来，日本某商团老板宫田真吾在曲阜房山一带孔林开矿采煤，直接威胁孔林和这一地区的其他古迹之保存，人们都认为这是保护国家文物圣迹的大事，捍卫我中华民族光辉历史文化的遗迹，人人有责。因现在正值战乱，且衍圣公不在家，又在日本人控制之下，日本商人要开矿，此事棘手非常！他们几经交涉均不奏效，最后决定悄悄上告。都知道汶上嫡根旺，大宗户（天下孔姓分20派，60大户，以大宗户为嫡裔）比曲阜还多，经举荐，瑞唐被族中推为出面打官司的人选。

曲阜地下有煤，在历史上世人皆知，但历代尊孔，为了保护“圣迹”，严禁开采，有不少当地人在自己庭院中挖个小井，常常浅挖即见煤，但要绝对保密，如被查出是要杀头的。

经过商量，决定由瑞唐执笔向南京汪伪“政府”和日本天皇同时

投书起诉。当然，这两封信的口气是不一样的，给汪精卫的信口气硬些，内容大体是责以民族大义，捍卫我中华民族文化历史遗产，义不容辞，请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不要背叛祖宗，要站在中国人一边，制止日本人开矿。汪精卫很快回了信，表示将尽快“函照日本大使馆”，但由于汪“政府”是傀儡政权，所谓照会没起任何作用。

给日本天皇裕仁的信比较策略，从中日文化角度赞扬孔子是东亚文化之鼻祖，日本既倡言与中国同文同种，而中国之民族文化遗产，日本亦有保护之责任。历述各代保护圣迹禁止开矿之事，声言“开矿毁林”是为蝇头小利而害大义，并说“日商宫田真吾，只知唯利是图，日本政府和天皇陛下如察之，定不允准……”“请求明令禁止……”

裕仁天皇数月后回了信，并责令兖州区并出司令官处理此事，禁止宫田开矿，这在当时无疑触怒了日方势力，在天皇回信前，一切活动都是秘密的，宫田因并出撑腰什么也不顾忌，积极筹备开矿。汪照会日使馆，并出毫不理睬，但见到天皇的手谕后他却不敢违命了，可他们并不甘心，想采用软磨硬泡的办法，决定把孔瑞唐幽禁起来，一方面切断他与外界的联系，以防其再活动，另一方面逼他签字同意开

矿。

1941年夏，并出下令，由汶上县日本顾问龟井（音译）出面，押解孔瑞唐到兖州训练所，并专房专人看守。此所在兖州城内山子园街，是关押思想犯的地方，审讯期间，日本人软硬兼施，多次对他进行身心折磨。

他被关押了年余，终未妥协签字，并出迫于舆论压力及天皇命令的威慑；又有县长及不少族人多次作保营救，直到次年春节后才释放了孔瑞唐。这期间，其夫人董三莉多次去探望，据她说一个姓姜的翻译（口音是东北人）及一个老和尚（当时的佛教协会会长，叫释心一）给通融，花了不少钱财总算才保住性命。在这场官司中，孔瑞唐一家倍受煎熬，他差点丧了命，家境也因此衰落了。

孔瑞唐不顾身家性命，保住了孔林，同时也为中国争了口气，很受尊重，不少族人、地方绅士以及亲邻等前来慰问。

（孔维克：孔子第78代孙，现为山东美协秘书长，他的巨制《孔子周游列国》获国际金奖。）

（责任编辑：刘家驹）

《孔子周游列国》图



读者的希冀

要“抢救”活资料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离休干部王文同志近日来信并采访，说他读了《炎黄春秋》一些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文章很受教育，并为编者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精神和勇气所鼓舞。他说有位长期在中央部门工作的老同志，“年逾九旬，来日无多”，有很多活资料，需要整理发表，希望杂志社重视抢救这些活资料。

注意对历史上有成就的帝王的评价

中国艺术研究院办公室主任王培元同志两次向本刊编者建议，《炎黄春秋》的“古镜台”一栏要发表一些有分析地介绍帝王的文章，不要因为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排斥对历史上有成就的帝王的介绍。《炎黄春秋》1994年第4期发表的《拒绝尊号的康熙皇帝》就是一篇好文章。康熙借撰修《明史》之机，在其《御制文》中检讨即位以来的治政得失说：“清夜自问，移风

易俗，未能也；躬行实践，未能也；知人安民，未能也；家给人足，未能也；柔远能迩，未能也；治臻上理，未能也；言行相顾，未能也，自觉愧汗。”这连珠般的七个“未能也”，应该说反映了康熙永不满足已有成就的积极进取精神。这对我们当今从政的各级领导干部能说没有借鉴的意义吗！

再扩大报道面

铁道部柳州机车车辆厂子弟中学黄桂荣来信说，他们学校的几位老师就认为《炎黄春秋》办得有胆识，有特色。他建议对历史人物、当代人物的介绍再扩大报道面。他还为本刊开列了许多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改革家的名字。

(洛松整理)

欢迎为《炎黄春秋》杂志踊跃投稿

《炎黄春秋》杂志，是以周谷城为会长、萧克为执行会长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所主办，是历史纪实为主的综合性月刊。本刊坚持以展示炎黄文化成果，讴歌中华历代英杰，回顾民族发展历程，描绘神州人文风貌，歌颂改革开放大潮，宣扬海外华人爱国奉献精神为主旨。高举爱国主义大旗，遵循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倡讲实话，讲真话，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力求真实地反映其本来面貌。防止主观性和片面性，不任意褒贬，不容无中生有地虚构。

本刊创刊三年半以来，以其思想性、真实性、知识性、可读性和史料价值，深受广大读者所喜爱，来信来稿不断增多，许多佳作被国内外数十家报刊转载。为了更好地办好刊物，提高质量，拓宽刊物内容，欢迎学者、作家及热爱本刊的作者和读者，根据刊物的宗旨、内容和风格，踊跃投稿。现提出以下几点要求：

一、为保证内容的真实性，要深入采访，反复核实，掌握可靠的、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如根据有关资料加以整理，请注明资料来源和参考书目。

二、文字力求简明、通畅。来稿一般不要超过15000字，欢迎两三千字的短稿。最好配有清晰的图片，并写清说明。

三、文字要规范，不要潦草。特别是人名、地名、年月、数字、引文、古文、生僻字、外文等，一定要写清楚。

四、请自留底稿。来稿如不采用，一般不退。如必须退回，请予注明。三个月内未收到采用通知者，可自行处理。

五、请勿一稿两投或多投。如发现其它报刊已经采用，本刊恕不再付稿酬。

本刊编辑部

炎黄春秋



吴桂显先生在横滨欢迎叶选平省长(右2)



在森林中的抗联战士

侨领吴桂显倾资办学

义勇军攻打沈阳城

塑料大王王永庆的创业道路

丁玲和沈从文的恩恩怨怨

43 届世乒赛中国队如何拼搏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

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3.20 元